

炎黄春秋



延安谜案·王实味平反
三失兵权·毛泽东受屈
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首次披露 汪东兴日记
许世友选将·林彪「三怕」

中国「百灵」飞进白宫·画家范曾赴台挨打
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字内幕



1992/1/11
总第四期



毛泽东的子、媳、孙生活

——剪影——

(孙振宇 摄影)



他们的儿子毛新宇(后)
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前左)、儿媳邵华(前右)与



毛新宇，他现在是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毛岸青看望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新宇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前左)、陶铸夫人曾志(前右)在一起



新春寄语

有人问，本刊封面上为什么用红、黄、蓝、绿四个色块？

我们说，红色是太阳与火焰，黄色是黄土大地，蓝色是青天与碧水，绿色则是承受光与热，植根黄土地，饱汲长流水的生命万物。生活于这顶蓝天下与这片黄土上的中华民族，正由此才得以生生不息和繁衍发展。亿万炎黄子孙正是在辉煌灿烂的民族之光照耀下，才得以如绿色生命似的历经千秋万代，永远欣欣向荣。世间万物又从来不是单色调或清一色的，总是色彩缤纷、斑斓繁盛，却又万变不离其宗，任何丰富复杂、争奇斗艳的光与色，都离不开红、黄、蓝等原色。从自然界到人世間，都接受并遵循着这一原理或定律。

《炎黄春秋》杂志，正是本着这一原理与定律，立志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自强精神，团结中外炎黄子孙，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与精神文明建设。为此，本刊将着力记颂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反映人民生活斗争，描绘神州人文风貌，展示炎黄文化成果，交流中外文史信息。其基本内容既反映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人物、史实和轶事，也反映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海内外各方面名人、要人的事迹和历史往事；既反映我国古代、近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及事件，也反映我国现代、当代的各种人物及其社会生活。介绍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伟大创造、重大发现与名胜古迹、风尚习俗等等，更是本刊的经常主题。

我们这样做，基于这样的认识：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后代不能忘记前辈，当今不能忘记过去。凡我炎黄子孙，都应该从中华民族的兴衰历程和沧桑变化中，尤其是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民族英雄和杰出人物身上，汲取智慧力量与启发教益，以求在前人业绩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光辉灿烂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所有根在中华大地，源自炎黄始祖的男女老少，应该四海一心，五洲同声，齐讲民族大义，高举爱国大旗，正如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西安事变 55 周年纪念会上所说：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全民族的事业，每一个中国人，不论其主张、信仰如何，都应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杨尚昆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还说：

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全民族的事业，是十一亿人民的共同责任。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什么阶层，不论什么党派，不论什么信仰，只要真心支持和从事国家现代化建设，都可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殚精竭虑，奋斗不息。只有把中华民族的所有力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

我们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和杨尚昆主席的话，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方针，更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中华民族的一致心声。相信本刊读者、作者以及编者，都将按照这一精神，齐心协力，使《炎黄春秋》成为亿万炎黄子孙的知交好友。

谨祝广大读者、作者及中华同胞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顾问: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饒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本期执行副总编辑:刘家驹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 5 号
邮编:100037
石油物探局制图印刷厂印刷
封面设计:小雁 版式设计:张楠

专 稿

4 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未来

/[英]韩素音

英杰谱

14 百岁青年马相伯/朱亮

马相伯活了 104 岁,先后给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当过高级幕僚。本文记叙了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百年和传奇一生。

6 薄一波一家和我们一家/水静

42 设计火箭的女八路/李鸣生

殒星篇

48 许世友喝酒选将/权延赤

1979 年,中越开战,中央军委任命许世友上将为我军东线前敌指挥。为选副将,许世友拿出三瓶茅台和一位将军对饮,酒尽龙、两位将军握手结盟……

66 翻译家汝龙的辉煌与苍凉/晓未

春秋笔

22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温济泽

50 年前,著名青年作家王实味写了篇《野百合花》,被定为反革命,关押数年后被悄然处决。一声枪响震动了中外,冤魂飘荡了几十年。1991 年由公安部正式昭雪,本文以翔实沉重的笔触,为广大读者披露了这一层难近半个世纪之冤情平反经过。

60 汪东兴日记

汪东兴任党的副主席卸职后,已销声 10 年,现在他为我们拂出了自己的部分日记……

30 三失兵权:毛泽东受屈/张素华

1935 年以前,毛泽东曾几次丢权下台,不断挨批,吃尽了苦头,但他却打而不倒,终于成为中共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的这段曲折历程将给后人许多启示。

人海浪

56 幸存者的故事/楼适夷

轶闻录

57 征途偷婚记/陈先义

86 江青施“恩”小记/权延赤

84 林彪三怕之谜/权延赤

神州光

44 三秦大地文物荟萃/王兆麟

90 苏松源和苏氏拱桥/陈玉
杨国民

88 徽墨·竹笔/刘宏伟

68 刘海粟台湾之旅/叶雷

九州景

29 花桥·凉亭·石板路
侗山·侗水·侗乡情/陶立璠

93 天安门的设计者是谁/朱诺

访谈录

36 郑超麟和中国
“托派”/叶永烈

他已92高龄,曾被关押了三十多年,当年他是陈独秀的忠实助手,中国“托派”的创始人,作者通过他坎坷曲折的一生,真实客观地叙述了中国“托派”的兴起,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让读者评说历史是非。

94 话说陈佩斯他爹

/郑晋 王恂

时代风

72 魂系鲁迅的裘沙夫妇

/张楠

78 中国“百灵”飞进白宫

/启帆·阎连科

天下事

75 西方头号“中国通”

——费正清/宁先绪

59 画家范曾赴台遭打/竹繁

82 同盟军胜利大游行

中的中国军队/高光祚

古镜台

50 奇耻大辱/王森

52 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

签字内幕/乔还田

文荟园

71 叶公超护国宝/刘作忠

96 于右任标准草书/刘作忠

5 萧克题词

21 周谷城题词

21 宋任穷题词

83 诗:古长征回眸记/陈靖

21“蒋纬国之子”

——程英嘉先生致本刊信

封面人物:韩文君



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未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编 问 [英] 韩素音

《炎黄春秋》约我写篇文章，谈谈我的某些想法，我感到很荣幸。在当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版物——在这政治和历史正发生巨变的时刻，许多人迷惑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想起那些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国的独立、安全和昌盛而奉献出自己的事业、聪明才智和生命的英雄儿女们，我便觉得《炎黄春秋》的创办特别适应了当前的需要。现在年轻的一代，为潮水般的“新闻传播媒介”所影响，没有意识到某些传播模糊了现实，引错了方向，起了反作用。

我的父亲生于1885年，出自四川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在他16岁时考上了“秀才”。就是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变，出现了“新学”的学堂。我的父亲于1904年被派往欧洲，学习为中国人民修铁道的技术。他于1913年同我的母亲一起回国，直到1958年他在北京去世时止，他作为一个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中国铁路上工作了一生。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种极深的感情：即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一直是我的心和我的灵魂所在的国家。这并不是说我拒绝了其他的文化和其他的国家。这只不过意味着我整个一生所关注的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他们的福祉和幸福。

在过去的35年中我很幸运：我每年有一次、有时是

两次回到中国。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展。我多次被我所尊敬和爱戴的总理周恩来所接见。他一生致力于发挥自己的科学家和专家的才智。他说过，“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现代化。”他懂得知识的重要，以及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来应用知识，比任何“权力”都要重要得多。

中国的进步——特别是最近11年的进步——是极为突出的。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但同时也要归功于英雄的中国工人、农民，归功于他们异乎寻常的勤奋劳动和智慧；同时也必须归功于爱国的有奉献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

在今天的世界上，良好的愿望并不就能够给每个国家注入生气。相反，贪婪、邪欲、彻头彻尾地丢掉任何伦理和道德的价值观、对真正的人权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忽视态度——这一切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法国、瑞士和美国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也都具有同感。他们在许多报刊上——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的报刊——表达了这种看法。“国际基金组织”也指责过，一些富有的“西方”国家只愿为自己的市场推行保护主义，而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施加种种压力，要求他们对残酷无情的“自由企业”开放市场——

这是剥削的一个别名。

最近有人在宣扬新的“国际秩序”。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翻了一下西方的历史文献，看这个名词过去用过多少次。它在1919年用过，也就是在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的希特勒也用过，日本人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宣布“东亚共荣圈”时也用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又被人提出来用过。

但是使人惊奇的是，在1991年的九、十两个月间，西方又出现了许多文章，说现时是一个“国际大混乱”的时代。

欧洲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内战的兴起和种族的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偏见和仇恨心理的复活，它复苏了老式的独裁统治，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事实上，我有些来自莫斯科的朋友，已经在谈论俄罗斯的“新沙皇主义”了。

有的记者还要编出，一些在苏联崩溃的基础上掌握了权的“民主要人”及知识分子，正在用极不民主的方式来维护他们所取得的权力。

当柏林墙在1989年被拆除的时候，我的丈夫——印度的一个上校和工程师——对我说：“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我曾经认为，他的这句话说得过份，但是，现在的事态发展说明他的话有道理，从长远看，各地所爆发的内战，有可能真的导致大规模的冲突。

一个法国作家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帝国和新的野蛮人》(THE EMPIRE AND THE NEW BARBARIANS)。书中说，紧接着到来的两个十年，真正的对抗是“北南”之间，富有的发达国家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对抗。

这是否即意味着用新的经济形式，以“国际主义”和“经济相互依存”等高调伪装起来的殖民地统治的还魂？有些专家似乎觉得事情正是如此。

人们正在公开地阐述和谈论许多独立国家的解体。不久以前，英国一个有名的星期天报纸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断言：“50个印度”要比一个大印度好得多。

最近出现了一些文章，预言中国将会“很快”要分裂成碎片，各省将会加速变得“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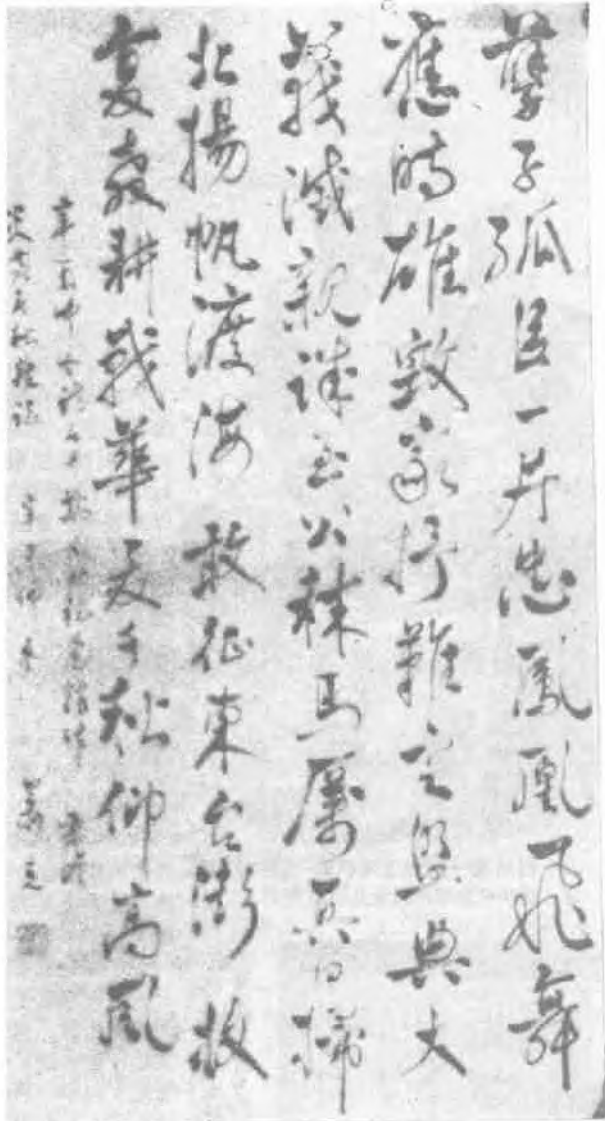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忘记，过去某些西方列强的目标就是要中国分裂。他们不会忘记数十年的内战、混乱和苦难，只有到了1949年才告结束。

中国知识界的传统，一贯是对中国人民的福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们所追求的是中国的独立和进步。我想，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此为他们的使命。

不管是什么制度和历史的变革，这种传统是不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得以在许多世纪中永存的因素。这就是中国伟大力量的所在。

我相信民主，但这必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语言游戏中的民主。它必须以增进普通老百姓的福祉为目的，保证他们的生存权、有房屋住和有饭吃的权、受教育和得到医疗保护的权……

一位法国的律师最近来看过我。他说：“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欧洲所有的帝王认为它是一场瘟疫，一阵恐怖。”“当拿破仑在1816年被打败以后，其他的许多国家



都兴高采烈，说法国大革命完了，死亡了。法国的一个皇帝重新回到巴黎来行使他的统治，曾经参加过革命的人都被处决。但是20年以后，法国又成为一个共和国。现在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法国大革命在全世界受到了赞扬。”

我相信，每个国家应该建立自己的制度。中国的制度已经在改革，而且无疑地还要做比现在更多的改革、调整，有更多的人参与政策的制定。但是，这一切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武断地、专横地赋予自己权利来决定别的国家的制度。这种行径根本谈不上“民主”。

对于中国的未来，中国知识分子将会扮演一个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只有在以中国伟大文化的传统为背景的情况下，坚持一种伦理价值观，一种道德观，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进步”的名义下，失去了这种价值观，失去了自己的理想，最终只等于是自杀。今天，某些貌似强大有力的国家可能发现，贪婪、傲慢，完全不顾国与国之间的民主关系，将会导致它们自己的灭亡。

薄一波



△ 杨尚奎一家在上海和薄一波夫妇偶遇，胡明怀抱水静女儿小莉

薄一波和他的夫人胡明要来南昌了，尚奎和我也非常兴奋。一波作为国务院副总理是来视察工作的，胡明则是来了解江西的轻工业，而他俩同时访赣，则显然有与我们一聚之意。所以尚奎在忙着组织党政部门汇报江西的工业、交通、运输工作的同时，也让我好好安排一下他们的业余生活，使他们尽可能过得愉快一些。

笑结 “亲家”

我们两家已经交往多年，友谊很深。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尚奎和他们早就熟悉了。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尚奎就认识了胡明，而且是上下窑洞的邻居。未见胡明之前，尚奎就跟我说过，她懂文艺，善书法，是个富于才华而又热情的女同志。所以，我早已对她产生好感了，人未识，神交久矣。见面之后，我们便亲如姊妹，好像很久以前就结识了。写信时，她称我“静妹”，我称她为“明姐”，亲热极了。尽管她比我大几岁，且不喜欢跳舞、游泳，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寄情山水，欣赏书画，参观展览会，访问艺术家，以及浏览商场，挑选工艺品等等。因为工作的关系，她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还先后给我介绍了吴作人、黄胄、肖淑芳等国画大师，使我有幸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和最新佳作。他们也曾赠我以书画。黄胄来南昌时，还给我捎来了他给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的一张很有影响的插图——《春兰》。我很喜欢这张画，喜欢它的格调和韵味。他还在我家当场作了一幅《海岛女民兵》送给我。画完之后，我的4岁小女儿小莉又缠着

他，要给她画张画。黄胄笑嘻嘻潇洒挥毫，画了个新疆老人骑在毛驴上，后面还坐了个小姑娘。一直扒在沙发上看绘画的小莉，指着小姑娘说：“给她戴朵花好吗？”黄胄笑着，立刻给小姑娘头上加上一朵花。小莉连连向黄叔致谢……

看到这幅画，我就会想起胡明。

聪明伶俐的小莉，也为我们两家的友谊增加了新的色彩。小莉天赋聪颖，俊美可爱，是我和尚奎的掌上明珠；胡明也非常喜欢她。胡明和一波生了6个孩子，最小的男孩比小莉大两岁，活泼天真，资质喜人，是他们两口子的宝贝疙瘩，我也很喜欢。去年，胡明被小莉逗得大笑不已，说道：“水静，我们两家这么好，为什么不结个亲家呢？把小莉给我做个小儿媳妇吧！”

我笑道：“有我们这样的情谊，那还用说吗？”

尚奎和一波在旁边只是笑。

胡明说：“你们在笑，说明也是同意的。我们就说定了，一起‘包办’了这桩婚姻——小莉快叫我婆婆呀！”

当然，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干涉儿女婚姻的，更不用说什么“包办”了。不过，后来胡明经常提起这桩事，送给小莉小玩具、小首饰罗，就说：“这是给我小儿媳妇的。”她还要我把小莉的嫩黄柔软的胎发剃了，“得让我儿媳妇长一头又黑又亮的漂亮的头发。”她说。谁知3岁的小丫头就懂得爱美了，开始怎么也不愿意剃，剃了之后就一直闹情绪。当时，正赶上我们带她到无锡，太湖风光美不胜收，自然拍了不少照片。可是一照像，她就赶紧躲起来，生怕照着了她的像男孩的小光头。尚奎一路直乐，说这孩子点点大就如此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当我把这些告诉胡明的时候，她眼泪都笑出来了，抱着小莉亲了又亲，说：“小莉呀，是婆婆不好，害得你几



1987年，水静和儿子笃力在北戴河看海时合影

水静



一家和我们一家

水静

个月不开心……”

胡明对这桩“婚事”似乎是很“认真”的。谁也无法预测20年之后的事，反正我们已经成为“亲家”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上一代人友谊深厚，总希望下一代继续下去，成为“世交”。这种良好的愿望，看来是无可非议的。

我觉得，一波也有这个想法。

布鞋史话

我早就知道了薄一波的名字，尚奎和来自山西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常常谈到他的功劳和业绩。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在敌人监狱中从未被威胁利诱、残酷折磨所动摇的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位在国民党顽固派面前“好插野鸡翎”（有气势，敢斗争，压倒敌方而不被对方所压倒）的性格倔强的猛士。

第一次见到一波时，他的高大魁梧的形象，是在我的想象之中的，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一个知名度那么高的人物，竟是如此敦厚，如此谦和，像一位心地慈善又有个好脾气的大哥。

然而，使我完全不曾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那次我随尚奎回访一波夫妇，行前没有打招呼，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宾馆，不会上别处去，又是头天约好了的。当我们走进会客室时，只见一波一手扶着洗手间的门框，两眼盯着地下，不知在干什么。循着他的视线寻去，更使我大惑不解了：他穿着一双青布帮、千层底崭新的圆口布鞋，在泼了一层浅水的水磨石地面上反复地踏着踏着，随着他双脚踩动的节奏，不断发出鞋与水离合时的“叭叭、叭叭”的声音。

奇怪，好好的一双新鞋，干嘛一

个劲地往水里踩呢？

后来，当我单独与胡明呆在一起时，便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嘻嘻，你问这个呀？”她笑道，“这是他薄家祖传的艰苦节俭的‘基本功’呢。”

胡明告诉我，一波自幼家境清寒，主要靠父母劳动所得维持生计，供他读书。这是极不容易的。穿件新衣，着双新鞋，自然特别爱惜，尽量使它能多用一些时间。他母亲告诉他，鞋底是细麻绳纳的，鞋子做好后麻绳也干透了，脆得很；新鞋初穿，脚一使劲，麻绳就容易断，鞋就不禁穿。所以穿新鞋时先在水里踩踩，让麻绳吸点水，就韧得多了，耐穿多了。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如今当上了副总理，仍像当年在母亲身边一样。当然，他现在这样做，其意义已不在防止鞋绳的脆断，而是为着一种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的宝贵传统和优秀品德的不断延续。

“原来是这样。”我说，“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一波虽然是个大知识分子，可出身也是很苦的。”

“正因为家庭穷困，才和马克思主义结缘了。”胡明说。她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感对我说，一波自幼天分很高，学习又勤奋，是个有名的高材生。大革命时期，他才十几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工作。二十年代末，即在顺直省委（中共北方局前身）从事秘密军运，是个崭露头角的人物。1931年到1936年头尾6年的铁窗生涯，又充分显示他的高尚的人品和坚贞的气节。当时阎锡山之所以对一波敬重有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品德与才华深孚众望。当他一跨出监狱大门，阎锡山便派人拿着自己的电报请他回山西“共谋保晋大业”。

一波当然不会随便接受一个军阀的聘请，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决

定任命他为公开的山西工委会书记，派他去山西做统战工作，这才立即回到山西。他根据党的决策，与具有联共、反共、抗日、降日两面性的阎老西巧于周旋，成功地拽着这个老军阀一道抗日。他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身份，作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务秘书而主持该会的工作，而且，很快掌握了以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的领导权，把它改造成了我党领导下的深入山西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又利用阎锡山扩大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心理，创建了相当于50个团的建制的新军，用阎锡山的枪支把它们武装起来，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在1939年晋西事变后，这些部队都分别纳入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的战斗行列。

这是一大奇功。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三十年代中期，红军长征结束不久，刚刚在陕北立足，力量还很小。一波等同志在山西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而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就，为我们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就成了陕北的一个有力屏障，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对于捍卫陕北、坚持和推动华北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光辉的作用。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和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对一波和牺盟会的工作极为满意。1943年春，毛主席曾和一波连续谈了8个小时，当面称赞一波“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创造性地实行了党的统战政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评价。

一双布鞋，便牵出了一串历史，真使我获益匪浅。我忽然觉得他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封面平常而却十分丰富、十分精彩的力作。只是还没有结尾，还在继续写下去。

我几乎立刻就肯定，我会是个热心的读者。后来证明，我的确从中所

得颇多。这也是我高兴地期待他们夫妇到来的一个原因。

烹调比赛

当我和尚奎一切准备就绪，一波、胡明也如期到达了。在尚奎的陪同下，一波到处参观工厂、召集会议、研究工作，很忙了一阵。他在实地调查了江西的经济状况之后，解决了不少问题，对江西工交运输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我所知，仅钢材就先后批给了好几千吨。原来从南昌到赣州要过几次渡，对工农业生产影响极大；涨水和枯水季节尤为麻烦。一波首先解决了兴建赣州西河大桥的问题，后来又连续建了几座公路桥，才使贯穿南北的昌赣公路畅通无阻。

我也陪着胡明办完了她要办的公事。业余时间呢，就一切听我们安排了。南昌地方不大，名胜古迹不多，用不了两天就全看完了。第二天是星期日，得把一波和尚奎从工作中拽出来，松一松大脑。还是胡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明天我们进行一次烹调比赛，我们4个人，每人做一个自己认为是最拿手的菜肴，吃完后再评出名次，怎么样？”

“行，我来个安徽名菜：蒜子烧子鸡。”我首先响应说。

“我选生炒肚尖。”胡明接着报了菜名。

一波想了一下说：“我就来个酱爆牛肉吧！”

尚奎从来就没有做过菜，他笑了笑说：“我来做个嫩豆腐，行吗？”

次日早上一起来，尚奎便对我说：“你先陪一波、胡明玩玩，我今天上午安排了一个会，会很快就开完的。”

我说：“可别忘了，你还得做个菜呢！”

他说：“我晓得，我昨天不是选了个烧豆腐吗？豆腐一烧就烂，快得很的。”

我点着他的鼻子说：“好哇！你不声不响的，原来早就计算好了的！”

他微微一笑，便径自开会去了。

用过早餐，我和一波、胡明都忙起来了，都想“露”一手，评个“第一”。要数我那个菜最难做了，一只斤

把重的小鸡，要配上一大碗大蒜子。这大蒜子要粒粒完整光滑，不能拍烂，也不能弄破，所以得一粒一粒地剥，得花不少时间。

快吃午饭时，我们3个人的菜都做好了，可尚奎的会还没有开完，左等右等，等得我们不耐烦了，他才不慌不忙，姗姗而来。

我说：“算了算了，不要你那个什么烧豆腐了，快吃饭吧！”

胡明不饶他：“不行不行，要罚他做三个菜。”

尚奎说：“是该罚。你们等着，我去做。”说着就要转身。

我把他一把拉住，对胡明说：“他干什么都不着急，动作又慢，等他做完三个菜，那干脆吃晚饭得了。”

“看在水静的份上，饶了你这一回。”胡明笑着对尚奎说，“不过，我说老杨呀，你老实讲，是不是你不会做菜，才故意在星期天安排一个会，好躲过这份差事？”

于是大家笑了一阵。

这时，我们3人做的菜都已端上了桌。品尝的结果，我的蒜子烧子鸡受到普遍的欢迎，尤其是很对一波这个北方人的味。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说：“不错！这是怎么做的，水静？”胡明也挺爱吃，又见一波那么喜欢，便说：“快告诉我这道菜的做法，下回我一定要试试。”

“这可是祖传绝技呀！”我开玩笑说，“不过，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我也只好把它无偿地贡献出来罗。”接着我告诉他们，关键是掌握好两条：一是选好料，鸡要嫩，个儿要合适；大蒜的粒儿大小也不能相差太远。二是要掌握好火候，要等鸡烧得差不多了，再放大蒜子，大蒜子既要烂，个儿又要完整，如果变成一锅蒜泥那就砸锅了。这样，一只烧得红里透黄的嫩鸡，配上许多雪白均匀的蒜子，不但香味扑鼻，鲜嫩可口，而且看起来色彩很美，添人食欲。色、香、味俱全了，能不受欢迎？

胡明说：“没想到我们水静还有这一手！”

一波说：“她讲得很有道理。”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绝密，那是谁也不能传的。”我装作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就是对你们，我也不能讲。”

他们看我一副正经的样子，都停

下筷子盯着我。胡明说：“怎么？还留了一手呀？”

“那是当然。”我说，“要不然，这世界上天天要发生徒弟打倒师傅的悲剧。”我偷眼瞧这几个人也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哈哈，这坏丫头在骗我们哩！”胡明擦着我的胳膊威吓说：“你要不说出个道道，我可饶不了你！”

一波也笑道：“对，非说不可。”

尚奎也嘿嘿地笑着。我笑得前俯后仰，半天才停。

“要说呢，还真有一条，不过是属于心理学上的就是了。”我说：“我们四个人吃饭，尚奎的口味我是知道的，主要的要对你俩的口味。胡明和一波生活这么久，肯定是习惯于北方的菜肴。可是我是南方人，尚奎也是南方人，不会做北方菜，怎么办呢？我掌握了北方人的一个嗜好，就是好吃大蒜。那么，我得做一个有大蒜的菜，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蒜子烧子鸡就最能突出大蒜的特点。所以你们一吃起来，就赞不绝口罗！”

一波连连点头，尚奎一直微笑着，胡明却叹了一口气说：“水静呀水静，我早跟你说了，别给老杨当秘书。你要是做领导工作呀，至少要比那些糊涂官儿强十倍！”

我说：“你别发感慨了，胡明，我老实交待了吧，我也就是这一两个菜烧得好点。”

大家又大笑了起来。

评比的结果，我的蒜子烧子鸡公认为第一；经胡明提名，一波的酱爆牛肉名列第二，这显然有照顾一波“情绪”的意思；胡明的生炒肚尖只好屈居第三了。

胡明说：“老杨，这回你可是名落孙山，榜上无份罗！”

尚奎笑道：“贡献总还是有嘛。”

我说：“你一个菜没有做，还有贡献呀？”

尚奎说：“要是我的烧嫩豆腐拿出来，你还能拿第一吗？”

我们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一波“求饶”

一波和胡明是一对理想的恩爱夫

妻。一波喜欢重工业，看到钢、铁、煤、炭就流连忘返；胡明搞轻工业，只要谈起工艺美术就会废寝忘餐。我常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一重一轻，中国的工业在你们家算是全了。胡明多次跟我说，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主管文化艺术的副部长李定坤，曾根据我的资历和经历，要我去当文艺处长，但我考虑尚奎担子重，身体差，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胡明对于我所作的事业上的牺牲很理解，也很尊重。我们成了人生难得的知己，可谓是无话不说的。她尽管有自己的事业，但对一波的照顾还是无微不至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想着法子让各自的丈夫从紧张的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一波和尚奎也很乐意听我们的“摆布”，所以我们两家在一起时，总是过得那么和谐愉快，趣味盎然。在北京，我们一起到香山看红叶；在北戴河，我们一块儿早起看海上日出；在庐山，同赏奇峰异景，飞瀑流泉；在上海，共乘舰艇，出吴淞、观沧海……我们还常常逗他们开心，要他们做一些他不大愿做的事情，以抑制一下经常处于兴奋状态的那一边大脑。

在两家交往中，经常会有这种愉快的节目。

有年秋天，我陪尚奎到上海检查身体，恰好一波和胡明也在那里，不期而遇，自然高兴非凡。我们约了一个星期天，到虹桥俱乐部去玩玩。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个大花园，里面树木成荫，空气如洗；奇花异卉，常年不断；其中还有个大草坪，显得空寂而幽静。在这儿散散步，聊聊天，是最好的休息了。我们和胡明到处走了走之后，便坐在俱乐部门前的台阶上，请工作人员摄影留念。这时一波正好从里面出来，看到我们亲热的样子，便蹑手蹑脚地走到我们背后，把我们两人的头突然往拢一靠。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咔嚓”一声，这张照片已经拍下了。待冲洗出来呀，大家可乐坏了。拍照的时候，我和胡明没有防备一波的“偷袭”，吓了一跳，那样子自然好看不；一波呢，因为要“害”人，装作一副龇牙咧嘴的神态，尤其难看。于是他一再求饶，要我们别把这张照片给别人看。胡明说：“不行，这叫自食其果。”我也笑道：“堂

堂的副总理，搞得这副模样，看你这么交待得了。”最后经过“谈判”，我们作出“让步”，就是用废弃这张照片来换取一个承诺。

“你说什么条件吧，我答应。”一波说。

我说：“陪我们去逛一次商店，去买东西！”

我们知道，这是一波最不愿做的事。但有言在先，他皱皱眉头，只好答应了。

于是我们抚掌大笑。我们当然不会真的要他陪我们上街，不过开开心笑罢了。

直到1965年初夏，尚奎到友谊医院治病，在北京住了40多天，又多次与一波、胡明聚会。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就在我们两家的欢笑声中，悄悄地朝我们头顶压来。

祸从天降

“文革”开始后，尚奎和我都遭到残酷迫害。我被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我很担心胡明和一波，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情。不久之后，二轻工业部和国家经委的造反派多次到江西来找我，要我交待和“大叛徒薄一波夫妇”的关系，揭发他们的“问题”。任造反派们怎么威吓利诱、软硬兼施，我一字也不写，气得那些人暴跳如雷。后来又来了一伙人，知道我态度强硬，便企图在精神上击垮我。他们对我吼叫着：“老实告诉我，薄一波是个大叛徒，中央已经定成铁案了，他也被抓起来了，永世别想翻身！他的老婆胡明，早死了，畏罪自杀了！你还不交待揭发，难道要为他们殉葬吗？”

一听说胡明已不在人世，有如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昏地转，坐椅倾斜，心头猛烈地一阵抽搐，接着失声痛哭起来。哭了好大一阵子，当我突然意识到有造反派在面前时，便强忍眼泪，一语未发，甩手便走。造反派把我拦截回来，对我狠批狠斗了一顿，还狂喊打倒一波、尚奎、胡明、水静的口号。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开口，心里想：到头来还不知道谁会被打倒哩！

这个坏消息，使我很长一段时间

处在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睁开眼睛就想着，一波虽说经过多年监狱生活的磨练，但现在终不是20多岁的青年时期，他如何能忍受那种折磨呢？胡明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思想敏锐，精明强干，又有这么好的丈夫，那么多可爱的孩子和那么好的家，怎么会自杀呢？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一波和胡明，看到他们往日的欢欣和今日的痛苦，听到他们昨天的笑声和眼下的呻吟……于是一惊而醒，暗暗垂泪，继而又想到尚奎和孩子们，不知他们怎么样了，经常是彻夜不得安枕。

我常常想，要是这一切都是假的，是造反派造谣才好哩。可理智告诫我，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1969年，我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有了一些自由，便到处打听，寻找材料，希望能证明一波不曾被抓，胡明仍然健在。而事实却是那么残酷，我找到几份有关的小报，尽管上面一派假话，满纸谣言，但它们足以证明，早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悲剧便已发生了。我哀伤已极，那颗惯于装载欢乐的心，无法承纳如此之多的悲愤，它要碎裂了。1969年，当我赶到北京探望几年不见的尚奎时，便突然病倒。尽管如此，即使在住院期间，我也极力打听一波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下落。不等我得到任何结果，我便被迫返回江西，因为我没有更多一点自由。

不过，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通过种种途径，我终于了解到他们一些情况。原来，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大奸臣康生就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61个叛徒集团案”，并且和陈伯达、江青之流一道，指使和支持不了解历史的红卫兵们，到处揪斗这批久经考验、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薄一波位列这61人之首，是那班家伙追猎的主要目标。当时，适逢一波患梅尼尔氏综合症，在盥洗室摔了一跤，导致尾椎骨移位，秘书便代他写了一张请病假的条子，直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作了“拟同意薄休养6个月”的批示，显然，了解一波的历史又洞察了康生之流阴谋的周总理，是要将一波保护起来。因为，这时61人之中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已经被当作叛徒揪斗。于是，一波便同胡明一道去了广州。可是，他们并没有躲过这场灾难。

破碎的家

1967年元旦，一伙红卫兵和造反派冲进一波的房间，把他揪回北京，关了起来。尽管周总理多次出面说话，告诉那些红卫兵造反派，薄一波等61位同志的出狱问题是组织决定的，中央是知道的；叫他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可是，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那伙人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赤膊上阵，将这个问题抛向社会，制造混乱。戚本禹、关锋多次在公开讲话中，点一波等同志的名，诬陷他们是“叛徒”。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盗用中共中央名义，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变节材料》，以欺骗群众，定成死案。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呢？说穿了，完全是康生、江青那班贼子制造的大骗局、大阴谋、大冤狱。他们想以此把一批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老干部置于死地，同时又可以给刘少奇同志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因为这事和少奇同志有直接的关系。原来，在1931年4月和6月，由于叛徒告密，顺直省委连续两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一波和几百名领导干部、党团员一道被捕。除了少数获释外，后来也有不少人因为自愿或家属动员，以发表“反共启事”换取自由。一波同其他大批党的优秀分子，坚持不在敌人搞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提出要“红旗出狱”，因而许多人满了刑期也未获释放。他们还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和敌人进行了形式多样、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次竟绝食七天七夜，以至敌人在文件中称他们“是以宁死狱中亦不愿反省”的最坚强的共产党人。1935年4月间，控制监狱的特务头目以所谓“带头煽动闹监”为名，向南京的主子写了一份报告，要判处12名共产党人死刑。其中对薄一波的指控是：在狱中秘密组织共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一直领导“犯人”抵制“反省”政策，指挥“犯人”闹监，应予枪决，等等。后因形势急骤变化而作罢。一波他们在狱中还建立了党校，经常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研究局势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旺盛的革命意志。对于这一切，狱外的党组织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5年底，少奇同志受党中央的指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由于

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干部被捕，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于是柯庆施建议，让尚在监狱坚持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履行个手续出狱，以解决干部问题。少奇觉得很有道理，同意这个意见，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很快批准了少奇的报告，准许那些同志履行手续出狱。这样，柯庆施便通过徐冰找到曾担任过反省院支书的孔祥祯，让他把这一精神告诉狱中支部。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他又将中央决定抄送狱中。狱中支部和一波等同志不信，因而拒绝执行。3个月后，少奇再次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写信，并强调是中央指示，主要的内容是：你们过去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是完全正确的，但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争取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必须履行出狱手续。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向你们保证，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不歧视，不以叛徒论。如果是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等等。狱中支部对这封信进行了反复研究，又根据其它渠道送的消息一并分析，经过全体党员讨论，一致认定是中央的指示，这才决定执行。

这批出狱的同志一共有61个，一波是其中之一。组织上及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历史已经证明这批同志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组织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尔后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对党对人民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一波的功绩，是毛主席在和他8小时谈话中充分肯定了的，同时还赞扬他的狱中斗争。这一切，当时的中央领导都一清二楚，怎么事过30年又成了问题呢？在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竟然出现这种怪事，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一波被送进我们“自己”的监狱时，已年近花甲了，他的身体状况如何？能够承受那种疯狂的迫害吗？这是尚奎和我所十分焦虑的事。

至于胡明，除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她不在人世之外，谁也说不清她是怎么死的。这使我连夜噩梦不断，梦见她的惨死情景，梦见她含泪的诉说……醒来后，往往泪湿衾枕。

为死者哀，为生者忧，我和尚奎经常提到这些事，每次都是以长叹告终。

1972年，让我出来做点工作了，我立即找到一个出差机会前往北京。尚奎一再叮嘱，这次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大难不死的老朋友，看看那些不幸逝世的朋友的遗属和遗孤。又特别交待，一定要打听一波的下落和他的孩子的情况。其实他知道，他不说我也要做的，他是在强烈地表示他对朋友们的思念。

到了北京，我三下五除二地把工作干完了，随即先后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这时，我已知道一波还在监狱里，便去找他的孩子们。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波和明姐的大女儿安安。安安告诉我，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在工厂当工人，有的到外省插队，小七则下放在大西北……听着听着，我的心都碎了。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被“四人帮”搞得家破人亡；孩子们星流云散，无家可归。

我强忍眼泪，又问一波的情况：“这些年你去看过你的爸爸没有？”

安安摇摇头说：“自从他被关起来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他们不准我去呀。”

“你去找过他们没有？”我又说，“你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国民党的大狱还允许家人去探监哩！”

安安愁苦地对我说：“水静阿姨，前些时他们找过我一回，把爸爸的手表给了我。”安安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爸爸被他们害死了？也没办法去打听。”

“不会的。”我说，“如果你爸爸不在了，一定要注销户口的。”

安安说：“你不知道，阿姨，爸爸从坐牢那天起，户口就没了。”

她这么一说，我也有点着急了。可仔细一想呢，又不像。因为一波真不幸，造反派会幸灾乐祸；而且还要交遗物，也不光是一只手表呀，总还有点衣服什么的。一波是个富于智慧的政治上极为机敏的人，他肯定知道了林彪“拆戟沉沙”的消息，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势上的变化。他送出一块表，是让孩子们放心，他出狱有望了。我把这些想法说了，又对她说：“你现在要千方百

计和你爸爸联系上。去找上面那些人，写报告，天天去缠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见爸爸，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有从牢里放出的叔叔阿姨，也要去打听，好知道爸爸的下落。”

可怜的孩子，一直在温暖幸福中生活成长，何曾经历过如此劫难？碰到这种变异，自然束手无策了。听了我的话，总算是得到一点安慰，有了一些主意。我回来对尚奎讲了上述情况，他很感叹！但和我一样坚信一波还活着。

水牢春秋

自从林彪摔死之后，老干部的艰难处境有了一些好转。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和尚奎对一波的担心，稍稍缓解了一点，可是仍然为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而不安。

1975年的春天，我再次出差到北京，很快就打听到一波已经出狱，住在国务院西直门外第一招待所。于是我立即和安安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和刘勇（原炮兵司令员邱创成的夫人，是胡明那个局的一位处长）马上去看她。

“爸爸虽然放出来了，但还在受监视。”安安说，“去看他的人都要详细登记，不知搞的什么名堂。”

“登记就登记好了，我不怕！”我说，“死都死过了，生个病也就是那么大的事！”

“还是少点麻烦好，水静阿姨。”安安这孩子成熟多了，她说，“我看你们不要去‘一招’，明天上午我把爸爸接到我们单位上来，你和刘勇阿姨9点钟来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事，时间我可以定。”

我觉得安安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她的安排。次日上午，刘勇带上火腿，我提上水果，准时赶到安安工作的首都医院，找到她那间小得可怜的房子。才坐下谈了一会儿话，一波那魁梧的身形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劫后余生，恍若隔世，我和刘勇一人抓住他一只大手，泪眼汪汪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刹那间，眼前浮现着他在狱中所受的磨难，胡明的被害，以及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别夫离子，十几个“女犯人”

住一张通铺，失眠之夜的种种回忆……我已经无法控制积在眼眶中的热泪了。

还是一波心胸开阔，意志坚强，他微笑着，让我和刘勇坐下，慢慢说话。看着他的笑容，我的心像被刺了一刀似地流着血，在他的微笑里，含着多少悲愤，多少哀伤啊！他失去了一生中最珍贵的、不可取代的生命之侣——他钟情的夫人，我最亲密的明姐。

“这么些年了，你们都好吗？家里人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道。

我和刘勇都简要地说了一下各自的遭遇，我还代尚奎问候了他。

“活下来了，算是幸运的。”我说，“你可受罪了，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也活下来了，不过活得很艰难。”他苦笑说。

我说：“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开头是些红卫兵娃娃对我搞逼供，那还好对付。”他说，“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当‘叛徒’，我说娃娃们，我做白区工作时你们还没出娘胎，怎么会知道那时的事呢？我没有当叛徒，倒是杀过叛徒。于是我给他们讲故事，上政治课，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告诉他们，我的历史毛主席最清楚，问问他就行。”

我说：“是呀，真要去问毛主席倒好了。”

“后来换了些年纪大的造反派头头来，可把我整惨了。”他叹口气说，“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那套办法，就像历史上一班残忍的酷吏折磨屈打成招的老百姓一样。”

一波说，那些人成天要他写所谓的“交待材料”，他当然不会去写，没事就在房里来回踱步，锻炼身体，或者倒在床上睡会儿觉。他们火了，把他关到一间一个多平方的小杂物间里，床撤了，只有一桌一凳，供他写“交待”用。他有什么可写的？困了，伏在桌上一样可以睡大觉。他们咬牙切齿，把凳子也拿走了，要他站着“写”，他更不会写了。白天，他在原地踏步，活动筋骨，地方小，也不能捆住他的胳膊腿呀！累了，他就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呼呼大睡。造反派暴跳如雷，大骂他“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挖空心思来计算他。那些家伙把小桌放在房子中间，四边不靠墙，而地上又放了一尺多深的水。

使他既不能下地踏步，又不能倚墙而睡。但他还可以坐在上面闭目养神，或者打个瞌睡。不过，这的确把他搞得疲惫不堪。有一回累极了，身子失控，竟从小桌上摔了下来，倒在水中。他那么大的块头，摔得青一块，紫一块，造反派们便哈哈大笑。这事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指示：不准变相刑讯，必须改善被关押者的生活环境。

“这以后，我的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了。”一波苦笑一下说，“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我写‘交待’，我还是老办法：一字不写。他们变着花样审讯我，我就是一句话，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你们问他去！他们没招儿了，狠狠地说：‘好吧，你就坐牢吧！’我想，坐就坐吧，坐牢我还有点经验。”

其实，哪像他说的那么轻松！他遭到的无止无休的批斗、殴打、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在二七车辆厂，他被用橡皮包着的铁条、木棍打坏脊椎骨，腰都伸不起来。有一回，因为理直词严驳斥了造反派的诬陷，被康生派去的20多个打手拳来脚往，打得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拖回牢房。他还曾被四条彪形大汉分别抓住四肢，用力向上抛去，然后落在水泥地上，当即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冰凉的冷水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东揪西斗，一天被整数次；有时“疲劳”轰炸，几十个小时不得合眼……

这只是我零零碎碎听人说的一星半点，谁知道他受了几多苦难，咽下几多悲愤呀！然而，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坚毅倔强，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正气凛然！

他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其他60名战友的政治生命，为着马列主义真理，为着共产党人的信念而活着！

他不是简单地活着，他还在作殊死的斗争。他在每天看过的报纸上，都要记上所受的批斗和遭到的折磨。他知道，专案组会把这些收集起来，作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证据，但总有一天，它们会成为那些历史罪人的犯罪铁证！如果说这是他的准确的预见，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还把对他的批斗会，当作一个揭露林彪、“四人帮”可耻阴谋

的讲坛。专案组在一份向康生的报告中说：“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而且“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显然这使他饱受了皮开肉绽、筋断骨折之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真理并非俯拾即是。草芥，它之所以珍贵，就在于代价的高昂！他还忍着残酷的折磨给他带来的痛苦，写了一份近3万言的材料，详细描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61位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一斗争的肯定与赞赏。这就给“四人帮”一伙一记响亮的耳光，揭穿了他们制造这一旷古奇冤的阴谋，并宣告了这一阴谋的彻底破产！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由悲伤而气愤，由气愤而慨叹。什么铮铮铁骨呀，什么忠心赤胆呀，这些赞誉之词在一波面前显得如此平淡无奇，是远远不足以形容一波风骨与肝胆的。

“真没有想到，你坐了国民党的牢，又坐林彪、‘四人帮’的牢。”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吃足了苦，受够了罪了。”

“坐牢嘛，还能舒服得了？”他嘿嘿一笑说，“不过嘛，坐国民党的牢，每天还可以放一次风，他们也允许亲友探监，送点吃的、用的。我们在狱中还办学校，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学习，开展讨论；还进行支部选举，定期改选，过组织生活，作自我批评和帮助同志，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可是，这次坐牢，全都没了。起初还能通过接受批斗了解一些形势，后来这点‘享受’也不给。几年不见见亲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的身体被他们搞得衰弱不堪，要不是周总理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保护，我早就被那些人迫害死了。”

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意犹未尽。积了好几年的话，一个上午哪能说呢？不过这回我总算放心了，他虽然比过去苍老多了，但精神很好，调养一段时间，会很快恢复的。只是我不敢提胡明的事，免得几年不见，一见面就要伤心。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即1978年12月16日，薄一波等61位同志才得以彻底平反。在随后的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重新肯定了一波对党对人民的贡献，纠正了“四人帮”强加的错误结论。

1979年，一波恢复了工作。

爱的伟人

这年秋天，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一到北京，我们就带着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孩子去看望一波。这时他已搬到万寿园居住了。据说张学良将军曾在这里住过。园子不大，但布局很好，收拾得也很干净，几栋古色古香的房子，坐落在花木浓荫之中。还有一口较大的鱼塘，水清见底，游鱼可数，显得恬适而静谧。尚奎和一波是文革后头次见面，激动兴奋，自不必说。一波见了小莉，更是高兴，他把孩子拉到身边，说：“这就是小莉呀？”你看，十多年不见，长得越发漂亮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该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现在小七已经结婚，你就做我的女儿吧！”说得悲怆凄凉，我心都酸了。

小莉看在眼里，赶紧调节情绪，她对一波说：“伯伯，我以后就是你的小女儿了。”

大家这才开心地笑了。

可是我的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胡明不在了，少了大半热闹。一波的孤寂，又显而易见的，我也觉得知音已逝，落寞空虚，不是滋味。当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抑制心底的悲伤，以免引起一波对明姐的思念。

我们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天，才乘车离去。当我回头看到形只影单的一波为我们挥手送行时，鼻子又是一酸，在他旁边，原是有个喜笑颜开的胡明的，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小莉，你看薄伯伯多么寂寞呀！”我对女儿说，“我和你爸爸难得上一次北京，你在这里工作，要常常去看看他。”

小莉很喜欢薄伯伯的热情幽默，也知道胡明阿姨生前对她的疼爱，所以常去看望一波，为他驱赶一些寂寞。有一回，小莉被一个新来的警卫人员挡在门外，说：“首长不在家。”其实他就在隔壁看电影。小莉留下张条子，转身走了。一波回来看了那条子，把警卫员好训了一顿：“你知道我和杨家的友谊吗？你为什么不把她送过来看电影？她就是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吗？”下回小莉再去时，警卫员赶快过来道歉，说：“上次首长对我发一顿脾气。很对不

起，小公主！”小莉说：“不认识嘛，哪能怪你呢？我要事先打个电话来就好了。”

当然，任何其他安慰都无法阻止一波对胡明的思念。尽管他口里不说什么，但胡明死得那么蹊跷，他心里怎能安宁呢？而且孩子们也大了，他们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弄清母亲的死因。上级机关也多次派人调查，最后只能确认胡明是被害而死，但谁害的？怎么害的？却没有具体结果。再查也查不出个明白来，薄家只好同意单位意见，给胡明平反昭雪，了却这桩惨案。

1979年4月，我们接到为胡明开追悼会的通知。本来尚奎也要去京的，正赶上省委召开会议，他无法离开，只好由我全权代表了。于是我乘飞机直达北京。薄家的六儿贝贝前来机场接我，在机场到市内的汽车上，我问贝贝，你妈妈究竟怎么去世的，现在查清楚了吗？贝贝告诉我，那年一波在广州被抓走之后，胡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幸免，迟早是要被揪的。不但思想上有了准备，而且还将换洗衣服、盥洗用具和常用药物放进一个提包里，以便随时提着进“牛棚”。没过几天，几个貌似谦恭客气的干部模样的人，开了一部面包车，到广州小岛招待所来找胡明，说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请她去一趟，胡明信以为真，连那个准备好的提包都没有带，便随来人走了。孩子们还以为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没有在意。谁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胡明一上汽车，便被那几个人拉往火车站，架上从广州直开北京的火车。还没到株洲，她就已奄奄一息。造反派在株洲车站把胡明拖下火车，说是送去抢救，可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就含恨而逝了。医院对胡明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说是发现了她食道里有几片安眠药。于是造反派们便给她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而草草火葬。真是荒唐透顶！胡明何罪之有？干吗要自杀？她是被骗走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哪来的安眠药？这显然是被谋杀而死的，为什么不查出凶手？如此草菅人命，着实骇人听闻，国何以堪，民何以堪啊！

他还谈到自己和兄弟姐妹们这些年的悲惨遭遇，桩桩伤心事，催人阵阵泪下。

4月25日上午开追悼会的那天，我和林佳楣、余叔坐一辆车同去八宝

山公墓。胡明的灵堂布置得很好，四面摆满了花圈。正面墙上，挂着为胡明平反昭雪暨追悼大会的横幅；横幅之下、墙的正中，是胡明的大幅遗照。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副总理、部长和他们的夫人，有胡明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挤了满满一礼堂。其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可是我顾不上和他们打招呼了，因为我一看到明姐的照片，就想到她活着时坦率、乐观，笑口常开的样子，想到我们在一起亲亲热热，窃窃私语的情景，我的眼泪便从心头一涌而出。待主持者宣布开会、乐声起，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不知道谁在致悼词，更不知道悼词里说些什么，只觉得明姐从那照片里走出来，走到我跟前，流着泪说：“永别了，静妹，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于是我痛哭失声。一条手帕被泪水湿透了，拧干了再擦，又湿透了。旁边有人塞给我一条手帕，我也没抬头看看是谁，接过来使用，一会儿又能拧出泪水来。十多年了，积在心的对明姐的情感、哀伤，在一波和他们的孩子们面前强压下来的悲痛与追念，今日全化作泪水，一下迸发而出。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竟有这么多眼泪。

追悼会开完了，我仍止不住抽泣。抬头看看给我手帕的人，原来是王光美同志。

我疲乏极了，虚弱极了，不得不在北京休息几天。

这日上午，一位我和胡明的共同朋友来看我，我们从胡明谈到一波，发了不少感慨。

“哎，水静，我有个想法。”她说，“胡明去世十几年了，你去问问一波，看他要不要找个老伴。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们帮他物色一个怎么样？”

“我这几天还是总想着胡明，感情还没转过来。我不忍心。”我说，“恐怕一波也还处在对逝者的思念中没有清醒，现在去问他这些事，他会不高兴的。”

她想了想，也就罢了。

又过了一年多，我同尚奎因事去京时，那位朋友又旧事重提。我了解一波对胡姐的感情，了解他情操的高尚和爱情的专一，估计他是不会再娶的。不过，“少年夫妻老来伴”，年纪大了，有个老伴照顾生活的确是一种需要。因为孩子们再好，也不会像老伴那么

体贴入微，他们不懂老年人的心理与身体的变化；何况他们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有一堆家务事，工作又忙，能有多少时间花在老人身上？所以，许多丧偶的老人重找老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支持的。

于是，有一次与一波闲谈时，我便趁机说：“有人要我来打听一下，问你需不需要再找个老伴……”

不等我说完，他就摇摇头。“我出来工作之后，别人介绍的也有，毛遂自荐的也有，信件和照片都一大堆哩，我全都拒绝了。”他很坦诚地说，“这倒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这么年纪了，还这么挑剔。不是的。我只是想，老来找伴，为的是彼此照顾，相濡以沫，这首先就需要感情。我看找上门来的，谁对我有感情呢？看上的是我的头衔，而不是薄一波。再说，任怎么找，也找不到胡明呀！”

我又追问一句：“那你真的不再结婚了？”

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地回答说：“当然！”

我敬重他的纯正的、始终不渝的情感，钦佩他的明智的选择。他家有7个孩子，男孩子都结了婚，有妻子儿女，这么大的一个家，除了明姐，谁能操持？我看到过一些重新组合的家，因为子女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闹得矛盾重重、鸡犬不宁，老人不但不能安享晚年，反而整日陷于烦恼之中，结果懊悔不已。所以我点点头说：“那也好。”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苦笑了一下。

此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这件事。我知道，他的不再续弦，主要是出于对明姐不变的爱。有一次，他出访欧美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尚奎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为他道乏，并询问他的身体如何。

他回答说：“一切都好，就是身边少了一个胡明……”

身边少了一个胡明，那是因为他心里永远藏着一个胡明，一个永远不亵渎这种感情、永远珍重这种感情的人，无疑是个高尚的人。

我更加敬重一波了，我也更为明姐而庆幸，有了这样一位丈夫，有了这么一份情感，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可以含笑瞑目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上接 41 页）

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另外，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他再也无法补写 40 年前的旧作，便新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的亲身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他的《玉尹残集》已出版，楼适夷为他作序。序文已先行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他的不少关于中共早期党史回忆文章在最近几年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篇末，录郑超麟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狱中所写的《绛都春》，略见他的心态一斑：

“生涯何似？似生圻砌就，盘旋圻里。一息尚存，渴饮饥餐离人世。此身本有千丝系，剑斩断血淋，心碎。有情翻羨，山中块石，不知年岁。

“憔悴，鬓皤腰瘦。幸方寸未乱，是非能理。两耳尚堪，透过重墙闻歌戏。寂寥尚有心园憩，任采撷愁花恨蕊，词成付与秋愤，赚谁落泪！”

（责任编辑：仲文）

百岁青年



马相伯活了104岁，曾是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的高级幕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风云百年、传奇一生。

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语

“学问社会，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

马相伯出生那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国耻史的开始。动荡的逃难生活，疾病和磨难生活，疾病和磨难，使马相伯从小就懂得了国家强盛的重要，他发奋读书，23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神学院当修士。

马相伯31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授职司铎（神甫），结束了20多年的读书生涯。

在接受神学博士学位和神甫职位时，神甫冕德荏问马相伯有何感想。马相伯说：“学问社会，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与世界同此社会，即与世界同尽其能。故西人学社名位可爱，西国官爵富贵不可受。谄西人而挾本国之富贵，更为可耻。前有洋奴，今有汉奸，君子不为。”

法国教士妒忌马相伯的才能，派他到徐州一个小镇的教堂管理教务。1871年徐州水灾，马相伯向长兄马建勋要了2000两白银救济灾民。这事被法国耶稣会教士知道后，认为未经教会同意，擅自使用银两，犯了教规，将马相伯幽禁在上海耶稣会内“省过”。

长兄马建勋参赞李鸿章营募戎机，因防御太平军有功，在淮军办理粮台，得知相伯弟被幽禁消息后大怒，带了几十名兵卒，向教会问罪：“我用自己的钱救中国灾民与你们外国人有什么相干？”教会从没见过这阵势，吓落了魂，只好放了马相伯。

翌年，教会调马相伯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马相伯虽是神甫，但对学生的讲授中国经、史、子、集诸文却很深入。他亲自送学生去应童子试，在任期间，学生考中秀才的有60

多人。教会认为，这样下去会把学生变成异教徒（孔教），便调派他兼任耶稣会编撰，研究教学。马相伯原来很喜欢数学，虽然早年写的《数度大全》笔记已经散失。但他们花了一年多心血，译著数理化学籍百余卷，名为《数理大全》。因无人能鉴别译著的好坏，教会将译著束之高阁，不予付印，使译稿逐渐霉坏。教会对他很不放心。1875年，不要他做校长，调去专门研究天文。1876年，又调他到南京，专任编撰，翻译数理诸书。马相伯越想越气，便不辞而别，独自跑到上海，退出了耶稣会，从此不再做神甫，但仍信仰天主教。

“一个身当大任的人，只要有一点短处，左右就要乘隙而入。”

马建勋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信任，而山东藩司余紫垣又是马建勋的挚友。经长兄介绍，1876年马相伯前往山东学习作官。余紫垣对马相伯十分信任，把自己的官章交给马相伯，除十分必要的公文须请示余紫垣外，其余均由马相伯代为画行。

他在余紫垣处担任幕僚一年，余紫垣对他说：“你已经脱离了耶稣会，不做神甫，我代你介绍一个妻子，也好成个家。”

经余紫垣作媒，马相伯在山东和一位书香门第的王氏结了婚。婚后，接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差事。

马相伯接任前，机械局每10天出一支枪，造子弹火药，都是用土法。马相伯接任后，大胆改用西法，制造火药成本合三钱五分一斤，但呈报部，却被批驳：“照例火药每斤只要成本七厘，为何现在已要三钱五分一斤，不予批准。”从前土法造火药，成本虽

馬相伯

朱亮

低，但产量很低，质量又差。而用西法造出来的火药，产量高，质量好。马相伯一肚子委屈，无理可讲，只好写信给在户部供职的朋友杨谷山，请求帮忙。杨谷山回信道：“这事容易办，只要将斤改为磅，重新呈报上来，定可批准。”

马相伯接信后，就照杨谷山的话去重新呈报。不久，户部回文：“准如所请，实报实销。”果真是一班糊涂虫！马相伯啼笑皆非。

杨谷山在李鸿章处很久，深知李的为人，他告诉马相伯：“你日后如上公事给李伯相，到公文的末尾，要故意弄出一二句似通非通的话来。”

“这为什么？”

“李伯相虽日理万机，但遇到僚属呈文中有不通之处，他定要拿笔批改。改过后，便立刻发下施行。要是公文做得一点瑕疵都没有，他看过了便朝旁一放，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把它批下来。我屡试屡验。”

马相伯暗下感慨：“一个身当大任的人，只要有一点短处，左右就要乘隙而入，无论如何明察的人，都无求以自勉。”

“人类尽人道，可达到世界大同。”

1881年3月，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马相伯为使馆参赞，后又改任驻神户领事，与日本维新要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交往，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的认识。

马相伯口才极好，从来不预备稿子。一天，大隈重信请马相伯参加维新派召开的盛大国际性大会，再三要求他讲几句。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谴责虚伪的侵略口实，倡导真实的人道主义。语惊四座。又一次中国公使举

行宴会，宴请各国使节和日本朝野名流，大家请马相伯说几句话。

“不多时，我在欧洲游历，西方政治的确比东方清明；西方社会的的确比东方进步。我看到这种情形，不胜赞叹。”马相伯肚里转念，这种应酬外交辞令，不能开罪任何人，于是又说起来：“现在到东方来，看到东方政治舞台有面大镜子，竟将西方政治舞台的东西，一模一样映照出来。我很惊奇，好比学生效法先生，青出于蓝。先生好，学生也好。我恭维先生好呢还是恭维学生好呢？我实在觉得有点进退两难。”

全场掌声如雷，四座外宾，纷纷到马相伯的座位前，和他握手致意，称他是天才的雄辩家。

这年10月，因长兄马建勋病重去世，马相伯回国奔丧后，到天津见李鸿章后，随他帮办洋务。

1882年，高丽大院君当国，倡“锁国攘夷”之说，新旧两派政客互争，争夺政权，日本又从旁煽动，阴谋高丽独立。清廷得知此消息，遣派提督吴长庆率兵到汉城坐镇。李鸿章命马相伯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吴长庆向高丽王李熙推荐后，聘马相伯为高丽政治顾问，请他拟定针对高丽政治进行改进的计划。马相伯首先请高丽政府编练新军，接着整理高丽的外交，同时向高丽国王李熙提出全面改革内政的条陈，主要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才、恤奴婢、求富庶、慎疾疠、兴工业、兴学校和正经界等9条建议，大多为日本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政策。但高丽政府封建积习太深，国王延缓不办。6月，高丽发生政变，清廷派马相伯弟弟马建忠和丁汝昌、吴长庆等前往协助“平乱”。马相伯在政变平息后，仍留在高丽，又建议闵妃派太子去欧美留学，以便回国后担当重任，但又被采纳，他见高丽局势没法挽回，

马相伯百龄纪念邮戳

马相伯百岁诞辰和孙女马玉童在一起

马相伯百岁时赠书于右任



于次年回国述职。

马相伯从高丽政府的腐败，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在向李鸿章报告高丽问题时说：“高丽社会等级制度太严，全社会分贵族、士大夫、平民三等，平民不得与贵族相等，就是做了将相，见了贵族和士大夫，还必定要磕头行礼。此情形和中国一样，中国是放大之高丽，高丽即具体而微的中国。”

马相伯没有注意李鸿章的不快，只管说：“对高丽应及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与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大员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才有挽救的希望。”

“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它有20年的寿命，何况高丽？”李鸿章不冷不热地说。

“袁世凯把我戏谑之言，奉为做人的科律，而民国竟以此人为开国总统，国事又安可问耶？”

袁世凯原是中国驻高丽总督吴长庆手下的一名小分统，对比他大19岁的马相伯十分恭敬，一次，他请教说：“马顾问，有什么捷径可以飞黄腾达？”

马相伯深知宦海孽深，戏谑道：“只有厚贿宦官，由宦官结纳亲贵，便可越级而升，做抚督也不难。”

袁世凯欣喜异常，如法炮制，居然有效，几天后见到马相伯十分高兴地说：“您的办法真灵，你见事如此透澈，代我筹划，又如此奇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马相伯感到好笑：“我这个人只会讲，不会做，所以终生是穷书生嘛。”

有一次，袁世凯将一份重礼送给马相伯，请马相伯在吴总督处通通路子，提携他。

马相伯办事是一板一眼的人，回绝道：“这事万万通融不得，你对国事应多忠诚，做官切忌心切。”

他指着案上的礼品：“这礼品你带回去，我不能接受。”

“马顾问，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不妨留着。”袁世凯急忙走出门外。

马相伯拎着礼品，喉咙高了一倍：“你再不拿走，我就掷出门外。”

袁世凯无奈，只好接回礼品，悻悻离开。他到吴长庆面前挟嫌诬告说：“吴总督，马顾问这人，官仪不检。”

吴长庆皱着眉头：“你怎能诬陷马顾问。”

“马顾问在公署狎妓女饮酒睡觉。”

“此话当真？”

“是我手下人亲眼所见。”

后来，马相伯得知袁世凯打的小报告，一笑了之。

马相伯回国后，李鸿章询问他：“马公，有什么人合适做驻朝鲜的商务委员？”

马相伯不记前嫌说：“袁世凯这人有点本事，对朝鲜情况比较熟悉，李伯相就派袁世凯担任如何？”

李鸿章一时没有适当的人选，又是马相伯举荐，就派袁世凯为清廷驻朝鲜的商务委员。可袁世凯做了驻朝商务委员后，任意侮辱高丽君臣，促使高丽倾向日本。

袁世凯在1912年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出于感恩和推崇，礼聘马相伯为最高顾问。马相伯反对袁世凯改共和为帝制。一次闲谈时袁世凯问：“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

马相伯说：“你所指的就是一种磕头请安才能表现出敬事长上吗？如果这样便能安邦定国，平治天下，那么老夫愿意从今天开始，朝叩一头，晚参一拜，日日不懈，为天下倡。”袁世凯只好尴尬一笑。

之后袁世凯命长子袁克定设宴邀请马相伯和严复，征求意见。马相伯坦率地说：“袁总统定要称帝，也得不到国民的拥护，一定会遭到反对。就是这点暂不考虑，可是外交方面，也会遭到强邻藉口，百端要挟，以遂其大欲。这样连锁反应，势必引起国内全体国民的声讨，弄得不可收拾。以我看还是打消这种想法吧！”

袁克定点头称是。第二次又设宴，席间，袁克定欣然相告，外交已无问题，日本方面表示赞成。马相伯看到已到了口舌所不能争辩的地步，拟辞官南下。

1915年7月，马相伯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袁世凯亲自祭天祭孔，提倡“尊孔读经”，袁氏党徒欲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为复辟帝制造舆论。

马相伯大力反对，疾书《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等文，并为各区教会代拟5篇请愿书，以信仰自由为理由，驳斥定孔教为国教和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

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做了“中华帝国”皇帝。临朝时，文武百官齐叩首。只有马相伯站立不拜，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搬张椅子给马相伯坐下。

马相伯为反对袁氏帝制，辞职准备南归。可袁世凯却不放过他，在马相伯的住宅四周布下密探。马相伯气愤之极，化装成买菜的老家人，只身逃出北京城，到上海隐居起来。他发表《国民照心镜》一文2万余言，痛斥袁世凯称帝之罪，表达他主张共和政治的卓见。他对朋友说：“袁世凯把我戏谑之言，奉为做人的科律，而民国竟以此人为开国总统，国事又安可问耶？百复辟，百自亡。”

当袁世凯身败名裂、一命呜呼时，马相伯叹道：“袁世凯对国事本无忠诚，做官心切，皆私字一念害之。当初我推荐他当朝鲜商务委员，也不能咎其咎呢！”

“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国宝，为他人所攘夺。”

马相伯在广州，眼看香港为英国人占去后，商业发达，就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张总督，老夫以为把香港对过的九龙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到那里贸易，修一条铁路直达广州，这样可把香港的生意夺过来。”

张之洞点头道：“满好！”可并未采纳。

这年冬天，马相伯乘轮北返，触礁遇险，滞留厦门。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得知后电邀他来台湾。马相伯劝刘铭传借外款开发台湾经济。刘铭传怕担向外人借款的责任，不敢接受。马相伯看刘铭传不是真心留他做事，就离开台湾，回天津交差。

李鸿章见了马相伯，十分关切地询问：“马公，各地招商局究竟有多少财产？”

马相伯直叹气：“都是一笔烂帐

呵，招商局亏空有1200余万两银。”

李鸿章有点吃惊：“有这么多？”

“商局情弊，非改弦更张，难期振兴。”马相伯将自己花了几天整理写成的《改革招商局建议》呈上，“喏，这是老夫的报告，请你过目。”

李鸿章粗略翻览一遍：“好，好，等总理衙门定夺。”但总理衙门对招商局兴革抱观望态度，未予理会。

马相伯又说起辟九龙为商埠，修铁路直通广州的建议。

李鸿章听了频频点头：“这是个好主意，但两广是张之洞所辖，我不好直接出面上报。此事还需张总督具奏。”这皮球被李鸿章踢得无影无踪。几年后，九龙又被英国割据为商埠。

李鸿章曾对马相伯发牢骚说：“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只给500万两银子，怎能办得好？”

当时，美国旗昌洋行，正联合美法德意荷各国，组成对华商业团体。马相伯和这团体组织者美国人熟识，就说：“李中堂，现在有美国资本家可以借钱给我们，对华商业团体愿意借款给中国振兴实业。”

李鸿章听了，高兴起来：“可借多少呢？”

马相伯笑道：“至少有5000万才有发展的希望。”

李鸿章听了数字这么大，吃了一惊：“有个2000万就行了。”

马相伯连连摇头：“不够，不够，至少要有2500万。”

李鸿章点头道：“那就2500万。”

马相伯和住天津的美国商人接洽后商定，决定中美合资组织官办银行，资本4000万。以2亿两为开发中国，统一币制，发行纸币，整理中央及地方金融，建设铁路，安置电话等企业投资。中国方面以李鸿章为代表，美国方面以钢铁大王范德比为代表。总行设在天津，上海和各省设分行，各项新政经费都由此行出纳。查帐权，由中美双方分别负责。

议定后，李鸿章派马相伯赴美国和美国银行家洽谈。马相伯提醒道：“李大人，老夫看还得奏明朝廷吧。”

李鸿章有点不悦：“难道我一个北洋大臣兼通商大臣，连和洋人商订借款的权都没有么？你去好了，我会发电报给美国大总统的。”

马相伯到达纽约时，美国总统特

派侍从武官迎接。

马相伯精通数国语言，英语纯熟，且谈吐不凡，折服了高傲的洋人。银行界各巨子，都纷纷和马相伯会见。马相伯将大家商订的数字合起来一算，高达5亿两，晓得李鸿章无这样魄力答应，而美国人感情难却，就同美方商定，以5000万两作为正式供款，以3亿为美方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视中国对于财政缓急以应用。消息传出，其他各国争相想加入。马相伯兴致勃勃将商谈结果电告李鸿章。

一时清廷沸腾，顽固派群起弹劾，百端攻击，慈禧谕军机大臣：“李鸿章与美商订约合股开华美银行，此事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文章弹劾，众议沸腾。该督如果有与美商订约之事，著即行罢议，迅速复奏，毋再迁延干咎。”

李鸿章只好复电马相伯：“办法正当，朝廷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

马相伯接到电报，像兜头一盆冷水，筹办银行事只好作罢，他悄然离美赴欧，游览英法，考察商务。

马相伯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了赴美借款的事，心里有气：“蛮好的一桩事，全给搅掉了。”

李鸿章直叹气：“朝廷不想好，有什么办法？”

“予创震旦，故欲诸生习实学而转授国人，为学干禄者戒。”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马相伯为丧权辱国而痛心，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想开办一所新式中西大学，教授欧美各国新知识，使学生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来强国，兴国。这时，胞弟马建忠已病故，他怕自己花甲之人，不能实现办学愿望，就将名下的祖遗产——松江、青浦良田3000亩捐给天主教会。但教会接受了他的财产，却不办学。

马相伯居住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此时，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两地有5公里之遥。一天清晨，蔡元培专程来到徐家汇天主教会，拜访马相伯。

蔡元培很诚恳地说：“我意识到拉

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的来源，大都出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如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

马相伯点头道：“你的看法是对的。”

蔡元培知道1896年梁启超来沪办《时务报》，曾向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学习了一年半时间的拉丁文，于是就说：“梁启超跟先生学过拉丁文，我也冒昧地要求先生教我拉丁文，请不吝赐教。”

马相伯同情维新运动，对梁启超十分器重，曾劝他学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也就对蔡元培劝道：“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以外，各学校都不大注意。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况且大家都是中年人了，还有繁重的职务在身。学习外国语，如指望更实用，则非较长的时间不可。我看还是不要动这个脑筋，能懂英语就行了。”

蔡元培求知心切，再三要求，每天步行而来，步行而去。马相伯为他诚心所感动，就接受了蔡元培的要求，开始教拉丁文。后来蔡元培又选派24名优秀学生到马相伯处一同学习。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退学学生请求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于是爱国学社成立了。

此时，马相伯教授拉丁文很有成绩，风声所播，云南、陕西、山西等各省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来沪求学。人数增加，也有扩大之必要，马相伯就创办学院，定名“震旦”，“震”为“秦”字的谐音，系古代外国对中国的称呼。“旦”即早晨。“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无校舍，无师资，马相伯就凭其社会关系，借天主教徐家汇天文台余厘为校舍，聘耶稣会教士为义务教师，自任监院（院长）。因担心个人势单力薄，不能持久，便请托耶稣会团体主办，以期长远。

由于耶稣会在两年前已接受过马相伯的捐献，同时想借他所办学校，传播教理，就同意出面支持。马相伯除将松江、青浦两县良田3000亩作为学校基金外，在卢家湾购地和建校舍，又捐献现洋4万元，英法租界地8处，共

计款项130多万元。震旦终于诞生了，并明显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四大特点：一是尚自治。院内各部事务，实行学生自治制度。二是导门经。马相伯注重开导门经，养成学者自由研究的风气。三是重演讲。每星期日，马相伯都召集学生进行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他本善于演说，高谈阔论，风趣横生。学生继承他衣钵，出校门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四是习兵操。学院规定人人必习兵式体操，并请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有时学生荷枪实弹，到法国兵营打靶。震旦以独特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学生。马相伯还继承中国书院传统，吸取外国研究院优点，采用名儒师徒传授办法，以60多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循循诱导。他虽世奉天主教，但在院章中规定：“教师上课，不谈宗教，学生在院，不谈政治。”要学生专心学业。

陕西青年举人于右任，1904年赶赴河南开封参加会试，这时他的洋溢着反清激情的诗篇《半哭半笑楼诗钞》问世，引起清廷的惊恐，遭到通缉。马相伯从《申报》上看见关于于右任的通缉令，很担心。当打听于右任正困处在上海的同乡吴仲旗家中时，便叫雷祝三招于右任到震旦。并决定免除他的一切学膳杂费。

于右任入学震旦时，马相伯为避当局找麻烦，嘱他改名“刘学裕”（留学子的谐音）登记注册。从此，于右任列马相伯门下，并很快成了马家常客。当时革命学生中还有张鼎丞、李育崖、徐朗西、叶仲裕等。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听到震旦学院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写了《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吾闻有震旦学院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该学院总教学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美、法、意文字者也。”“吾祝震旦学院万岁！”

“中华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

法国天主教中的一些人，创办震



马相伯铜像（1840—1939）

旦时，对中国学生学拉丁文加以讥笑：“中国人如何学得好拉丁文？”可马相伯没有理睬，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用西塞罗演说为拉丁文课本。在教了4个月后，经过考试，学生们居然写得出，说得出口。讥笑的人也不得不暗暗佩服。学校办出了名，教会想夺取学院领导权，改变学校的性质，便处处和马相伯为难。清廷和法租界捕房联系，准备抓一部分反清学生。马相伯坚决反对，要求社会不要助纣为虐。教会乘机提出要马相伯让出一部分学校管理权，作为保全学生的交换条件。马相伯出于无奈，只好让步。教会马上派了南从周神父来震旦主持教务，之后，完全控制了学校领导权。

学生们见此情形，极为愤慨，推定沈步洲同学为会议主席，开会声援马相伯，并以集体退学的方式与教会斗争。

学生们将退学签名簿送给马相伯看。马伯老泪纵横，饮泣吞声，悲痛至极，缓缓说道：“我是天主教徒，为教会所控制，不能自由；我同意你们退学，并将学生所交学费退还你们。”一所声誉日著的震旦学院就此停办。

震旦学院歇学后，由沪学会推马相伯为会长，召集离校学生，商议复校。学生们推定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秩欧等7人为干事，协助马相伯先生共同办理复校事宜，便租定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某宅为临时联系地点。对震旦的

歇学，社会各界人士深表同情，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其时，马相伯的旧交周馥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他除拨镇台公署为临时校址外，又拨出一万两银子为学校开办临时经费，拨交吴淞营地70亩为校舍基地。马相伯还聘请社会名流28人为校董，更名为复旦公学。并发表《复旦公学募捐公启》，向社会广集基金。

1905年8月中秋节，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熊季廉、袁观澜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为校长，李登辉主持校务，并由同学叶仲裕、邵力子、于右任等分管学校行政，乃和震旦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马相伯以68岁高龄，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口讲指划，不以为苦。并设演说学，作为文科的必修课，由他拟定演讲题目，命学生轮流练习演说。以后复旦毕业生不少成为政治家、演说家，这和马相伯提倡演说有关。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复旦大学。

1913年，马相伯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复旦校长，由李登辉继任。

“当年天京内讧的往事大家比我清楚，我们能做太平天国第二吗？”

1918年6月，马相伯在震旦预科毕业典礼上作了精彩的讲话：“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教会和军政府全是强盗，一天到晚抢。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多少春光被他们抢去啦！教会抢春光，政府抢钱……”在台上的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外交特派员杨小川、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等军政界人士听了脸都红了。院长十分尴尬，又不敢不让马相伯讲。

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时，各路军队进入南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各路军队的头领只得把马相伯推出来做江宁府尹，准备定都南京，黄兴也到了南京。这时诸将争功，都想做江苏都督，大有互相残杀之势，形势非常险恶。在三牌楼大戏院内召集的各路将军会议上，马相伯语重心长地说：“……此地就是当年的天京，对于当年天京内讧的往事大家比我清楚。目前，冯国璋几十

万大军就在江北。假如江对岸的清军打进城来：我是没活命的，在座诸位又会怎样？我们能做太平天国第二吗？”

一场内讧在马相伯的真情和循循善诱之下土崩瓦解了。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马相伯又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代理都督。在首次纪念黄花岗烈士大会上，一些自居革命功臣的人，带着功高费薄的怨气，惹事生非，会场空气显得紧张。马相伯看到场下的情景感触万分，当孙中山请马相伯向大家讲话时，他站起来就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我们在座诸位同胞，尤其是诸位革命军人的一面镜子，请大家对着这个镜子，看一看你的原形，是不是真正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而来革命，是不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幸福与生命而革命？是不是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反过来说是不是为了都督、总司令或大富大贵而来革命？诸位试将脖子上一些东西，都赤裸裸地拿出来照一照，是不是有什么自己觉得惭愧的地方？”

大家听了拍掌欢呼。孙中山先生也很动容，大加赞赏。马相伯这两次动人而重要的演说，对稳定南京大局，免遭自相残杀的浩劫起了相当作用。

“顾我河山，念我同胞，真令人欲哭无泪。”

马相伯反袁南归后，隐居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他的家常常是爱国学生和救国会的聚会点。

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此时马相伯已92岁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救国有责。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号召团体抗日，奋力呼吁人民自救，被尊称为爱国老人，达到他一生的光辉顶点。

“9·18”事变不久，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提出全国人民“自赎自救”、“自息内争，共御外侮”、“对内绝对不多任费一枪弹，对外不要吝惜一枪弹”的著名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为支援东北义勇军，他不辞辛劳，亲自书写“寿”字和对联义卖。短短

几天内便义卖得10万元，全部运往前线，支援抗日军队。此时马相伯已90多岁高龄，左脚瘫痪，行动不便，家人怕他整天不停地写字太劳累，但又不敢劝他休息。因为马相伯最喜欢孙女马玉章，就让她做劝说工作。马玉章说：“爷爷，我手脚磨得手酸呐，能不能休息一下。”

马相伯一听就来火了：“前方将士为了抗日，连命都不要，你磨这点墨，喊什么酸阿酸阿。”

直到93岁，他仍能楼上楼下地跑，后来不慎跌了一跤，才不能上下自如了。蔡元培、于右任等集资为他装了一座小电梯，于是马相伯又恢复了活跃。

1932年“1·28”淞沪抗战时，上山湾地处华界，亲友请他迁居租界，以保安全。马相伯谢绝，独居危楼。楼前广场，曾落炸弹，他处之泰然。

淞沪战役后，日酋松井中将开庆祝会时，被朝鲜志士金某炸断了一条腿，日寇疯狂地上海四处追捕。金某处境很危险。马相伯叫邱任我赠送盘缠，并设法救他逃出上海。

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马相伯非常不满，曾经说：“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

蒋介石50岁时，曾托很多人求马相伯给他写个“寿”字以讨吉利；马相伯不肯。他的学生林翰劝道：“先生给他一点面子罢！”

马相伯以“吉一时”三字合成一繁体“寿”字，旁注“笼罩一切时期，无往不利。”

蒋介石得到后大喜，如获珍宝，派人向马相伯道谢。人走后，马相伯哈哈大笑，邱任我感到奇怪，便对女儿马玉章说：“你爷爷平时大骂蒋介石，今天蒋派人来道谢，看你爷爷高兴劲儿！”

马相伯听了脸拉长：“你胡说什么了，我笑的是我叫这小子只‘吉一时’，旁注的‘无往不利’，是说不论什么时候都无‘望’不利了。可他还是很高兴，这不可笑么？”从此，“这小子”三字成了马相伯称呼蒋介石的别号。

1932年，马相伯参加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4年，马相伯95岁生日，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前来祝寿的26人合起来共1470岁，大家称之为“千龄雅集”。马相伯首制一词，调寄《千秋岁》，词曰：

“江山破碎，望眼空垂泪，吾老矣，言何忌！推难沙浪博，笔任锋头出，伤心也，史册已死春秋也。”

“国难无时已，有酒今朝醉，少长集，群贤萃，老髦耆耄艾，醱成千岁，君知否？掀髯一笑昭光逝。”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由于马相伯的社会地位和救国热情，被公认救国领袖，一切通告、文件均由他领衔。1936年7月，他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抗日统一政权。全国各界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是在马相伯家乐善堂开的。马相伯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的对联，送给出席的各委员。是年11月，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时，他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表宣言呼吁“爱国无罪”，还打电报给冯玉祥，其中有“老夫愿以头颅作保”。



“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在南京合影

蒋介石对于右任说：“你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

于右任不得不叫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出面，请马相伯到南京襄理教务。

马相伯听说江南教区有了中国主教，很高兴地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归向中国自主的教区去！”他不顾众人的劝阻，决定去南京。

1936年11月24日，马相伯离开上海时，清晨6时，宋庆龄特来送行，并对马相伯的秘书万国华和马家人说：“你们要千万照顾好老先生身体，老先生是国宝呀！”

12月12日，西安事变。于右任急忙向马相伯报告，马相伯说只要这小子肯抗日，就放了他，亲笔拟了电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

马相伯自从迁南京后，法教士背信，停付生活费，造成他家窘困，于右任闻知，和冯玉祥将军相商后，冯玉祥把国民政府委员一职让给马相伯，以便他有丰厚的薪俸。

1937年夏，张治中和朱培德来看马相伯，高谈抗日道理。马相伯很高兴，当场挥毫各送一副对联。两人问马相伯对蒋介石有什么要求。在西安事变中，马相伯曾为呼吁释放蒋介石拟过电稿，蒋介石想谢他一下。马相伯听后摇摇头。

数日后，蒋介石又派人来问有什么要求，马相伯就叫秘书万国华写了“释放政治犯”五个字。

7月31日，“七君子”从苏州监狱得到释放，8月3日即来南京大方巷12号向马相伯道谢。同来的还有杜重远，9人在门前合影留念。照片上由沈钧儒题了“唯公马首是瞻”六个字。马相伯被称为爱国老人，受到人民的尊敬。

“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到南京不到半年，复旦同学会在南京国际联合社庆祝马相伯98寿辰，群贤毕至，盛况空前。香港名人何东爵士特地从香港来南京参加祝寿。马相伯童颜鹤发，笑逐颜开。马相伯置一手推车代步。冯玉祥身穿将军服，亲自为马相伯推车，登上主席台。当马相伯致答词时，讲了一半忘掉了，他风趣地说：“老机器不灵了。”架上老花镜，看了一下稿子继续讲下去。认为抗日救亡比祝寿重要，盼座诸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与李宗仁请马相伯移居广西桂林叠采山。李烈钧特备汽车，

派其公子李贻驹专程陪同护送到风洞山。这时他已99岁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为他祝寿。马相伯亲自撰文，呼吁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1938年广州沦陷，危及广西，于右任请马相伯移居重庆，在赴昆明途中，马相伯因体力不支，留居越南凉山。

1939年4月6日，是马相伯百龄大庆的日子。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举行遥祝大会。国民政府明令“褒奖”，称为“民族之荣，国家之瑞”。《新华日报》发了《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的短评。各大报纸都有专论祝寿。

当时在陪都重庆银行工会举行庆典遥祝，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参加，于右任挥毫题词曰：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

自新教育发萌而后，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同时，于右任又祝撰寿联：“大邦人瑞，民族导师。”还写了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来颂扬老师一生奋斗精神。祝寿每人发“寿”字纪念章一枚。

孤岛上海，复旦同学会为庆祝马相伯百岁寿辰举行招待会。金通尹宣读了马相伯由凉山寄上海的亲笔信：“国无宁士，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反映了他身处异域，目睹大好河山沦陷，激起无穷愤怒。在凉山有人去看望马相伯时，他总是问，“蒋介石打了没有？他会打吗？现在打到哪里了？”

马相伯又给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去谢电：“年齿徒增，愧无济世之术；嘉惠灾黎，益增荣衰之感。拜领高情，特电驰谢。”悲天悯人的怀抱，爱国思乡的感慨，全从字里行间跃出。

马相伯去世前数天，他突然对孙女马玉章说：“爷爷没留给你什么，我连累了你，我死后，你回国去参加抗日。”

胡愈之去凉山访问，马相伯对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他一生为国为民为真理，奔走呼号的劳苦精神，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

1939年10月29日，马相伯得知

湖北大捷，异常兴奋，夜不能寐，病情加剧。11月4日6时（河内时间），马相伯弥留时，静静微笑，犹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争取抗日胜利，声音微弱地连呼：“消息，消息”不已。

马相伯逝世的噩耗传遍中国后，举国一致深表哀悼，国民政府明令哀悼，并发给治丧费三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以表示国家笃念勋耆至意，各方纷纷函电交驰，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联名电唁马相伯家属：

河内总领事馆署转马相伯先生礼鉴：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4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遮之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国民党中央执委唁电曰：“相伯先生，天下元老，一代大师，方期召伯修龄，永为人瑞；兹闻溘逝，震悼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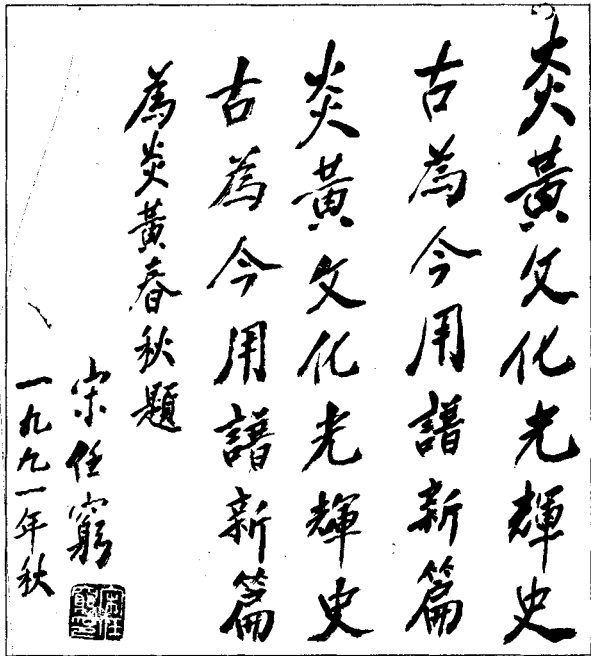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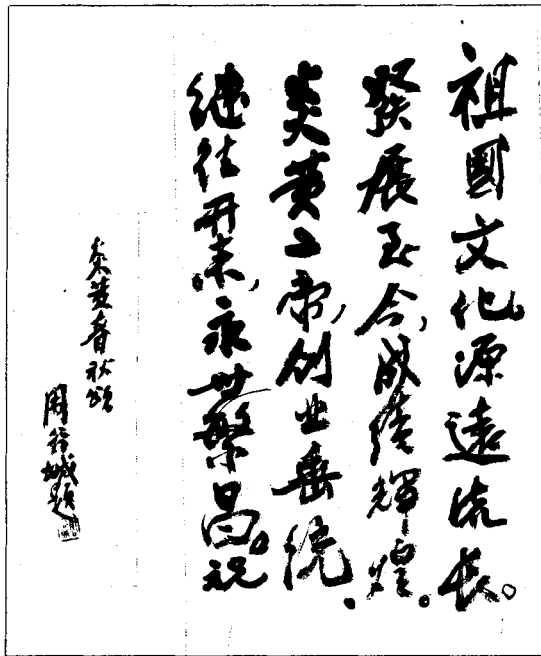
全国各报刊都发悼文。中央日报称：马老为百年来之伟大人物，也是近百年世界伟大人物。重庆《新华日报》短评《悼马相伯先生》，号召学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于右任挽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在重庆各界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于右任代表重庆各界宣读祭文，一字一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邵力子在《新华日报》发表《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一文，称“我们此时此地哀此救国老人，举世应效此救国老人的言行。纪念救国老人，就是救国的大端。”

全国各地都纷纷举行追悼马相伯大会，孤岛上海顶着日寇军部警告和制止，各方奔走，一直到1940年1月27日，才为马相伯举行追悼仪式。

1952年，上海陈毅市长即派蒋子和科长陪同邱任我和马百龄去越南凉山将灵柩迎归，胡志明主席也派人在凉山专程招待，并将灵柩送进睦南关。灵柩运到上海后，安葬在息然公墓。

1984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协将马相伯坟墓迁入宋庆龄陵园，以垂永久。（责任编辑：张蕾）

（本文照片由刘久钧、朱学文提供）



〔来函照登〕

“蒋纬国和施利聆之子”

——程英嘉先生致本刊信

社长先生大鉴：
总编

您们好。近日偶阅贵刊创刊号上汪兆骞先生大作《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觉有舛误，现不揣冒昧，坦率陈言，以正视听。

1. 家母施利聆，浙江海宁人，幼失怙恃但从未出国，哪来的“在她父亲的催促下……便被飞机载往加拿大，永远地和蒋纬国失去了联系”?! 而且据我所知，台湾家大人并不是卅年代在姑苏和家慈失去联系的，而是到1949年大陆解放时才茫茫音信两不知的。他率队撤往台湾时还有一书给她催其速去。

2. 我就是汪文中所谓“几十年后一位自称是蒋纬国和施利聆之子的中年人”。但记忆所及，我似乎从未“表示要到台湾寻父”。汪先生这样写不知有何根据? 事实是1978年家母及我曾上书邓小平同志，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曾几次来人和她谈话(其时我们母子均在南京)。1979年夏，我们由宁只身北上进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在京期间只去过旧簾子胡同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梅家妈)寓所。和

她及许姬传先生(梅兰芳

先生的秘书)谈过话，也见到葆玖等人(我们是几十年世交)，但并没有“戏剧性地找到一位曾和蒋家打过多年交道的老人表示要到台湾寻父”，所以也不存在什么“经老人劝阻，中年人默然地回去了。”我只表示过希望通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能和台湾家大人早日取得联系。

贵刊名流云集，声望和地位非同一般，且面向国内外发行，影响殊大，不管出于什么需要和理由，在纪实之作且为创刊号上出现如此失真，我感到很遗憾。如以讹传讹，将贻笑大方。

家母和我现住一起。今年春节她曾去合肥和金定国先生会面。如有需要，我们可虚席候教。

顺颂

撰安

程英嘉 12/2 于吴中

(程英嘉先生现为苏州某公司技术服务部经理)

王实味冤案平反



王实味夫人刘莹仅存的一张照片

50年前，在延安，发生过一桩冤案——王实味案，曾经轰动一时，震动了延安和一些根据地，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人的注视。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后，知道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了，大为震怒，曾厉声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人仍对此案颇为关心。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王实味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

平反决定

王实味被强加过3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这3顶帽子都是在1942年戴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近10年来，终于逐个得到了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82年2月作出决定，否定了所谓“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

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在有关“王实味”的一个注释中，公开宣布：“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个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是在几个月以前，由公安部作出决定予以纠正的。公安部在1991年2月7日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

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被错定为“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结论，原来是1942年10月2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常委会作出的。王实味坚决不承认。同年底，他被中央社会部康生下令逮捕。拘押期间，对他与托派关系问题继续审查。他反反复复，有时被迫承认参加了托派组织，有时又翻供否认。公安部决定中说的“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是指中央社会部在拘押审讯王实味期间再次作出的决定。现在事实证明，这两次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实味在被错误处理49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完全平反昭雪。终于恢复了对他的“同志”相称。不幸的是，他被错误处决，离开人世，已有44年了。

冤案是怎样造成的？

王实味的冤案是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发生的。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临走时委托李维汉代他照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张闻天离职期间，李维汉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最高

纪实

温济泽



负责人。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他的笔名。河南潢川人。1906年生。1923年中学毕业后，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读过1年书，因此英文的底子比较好。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他写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法国作家都德的《萨芙》等。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开头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不久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翻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其中两卷半。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那时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级，王实味由于在文学和翻译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当时中国文艺研究室的主任是欧阳山。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整风开始后，王实味于2月17日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4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3月13日和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冷嘲热

讽的语言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说什么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王实味的这些错误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引起了思想混乱。

中央研究院在3月18日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讲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几点意见：讨论整风和检查工作分开进行；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这是针对许多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说的）；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等等。王实味对李维汉的意见带头反对。他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反对指定一部分人为当然委员，主张全体委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还写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出“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

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还提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王实味这些错误言论，在中央研究院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有很多青年研究人员表示同情。《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啼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召开全院的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从会议开始，康生就插手了。更准确地说，是抓了领导权。康生原是王明的副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7年从苏联回国，193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整风开始，担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受中直机关总学委领导的，康生就当然成为上级直接的领导人，他说的话就成为代表总学委的“指示”。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会。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有些同志还是把王实味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过了4天，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说他“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到第6天，有几个同志发言，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

清晨（陈其昌）有过来往，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由于这些揭发，反王实味斗争迅速升了级，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把王实味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了。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李维汉发言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说：“支配着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仍抱着“挽救”的态度，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可是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在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就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会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帮”，常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过：“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反王实味斗争结束之后，他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他用“打迂回”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琪）夫妇与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他们一起到中央研究院来看望过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和宗铮隔壁的窑洞，他们又一起看望过王实味（王里曾与王实味在河南相识）。此后，他们有过几次来往，在一起吃过饭。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5人的关系说成“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派人分几处去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

有些异状”。他要求把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视“托匪和敌特、国特为一体”，至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

康生对李维汉是不满的。1942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在此以前，中央研究院反王实味斗争是他领导的（虽然上面还要由康生决定）；在此以后，他就再没有过问了。

复查是怎样提出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持抓紧完成。”

中央组织部也明确提出：“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哪一级定的；也不管是什么时期、哪一次运动定的，都要统统甄别、平反。”这里说的第一个“不管”，是指那些曾经由毛主席等定案的案件；第二个“不管”，是指不仅“文革”中的错误要纠正，而且“文革”以前“四清”、“反右”以及解放前历次斗争中整错的，也都要纠正。这就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打开了大门。

为王实味进行复查，是李维汉在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来的。李老此时已届85岁的高龄，在“文革”中惨遭“四人帮”和康生的迫害，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才恢复自由。他在狱中身罹重病，此时尚未痊愈。他在完成当时党中央委托给他的任务之外，倾注极大的心力于整理和撰写回忆录。他要把自己的一生的重要革命经历作一番回顾，写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交给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为党作的最后努力。”

李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与周恩来一起

在欧洲参加过建党活动，与瞿秋白一起在八七会议后的革命危急关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之一。他写的回忆文章，记述了他从1918年到1964年46年的主要革命经历，以写集体的活动为主，适当地联系自己，在写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时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些回忆文章，在李老生前，只零星地发表过几篇，没有来得及全部问世，在李老去世后，由专门成立的编辑组编成一部《回忆与研究》，分上、下两册，在李老诞辰90周年的那一年——1986年，才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这是供后人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一部珍贵资料。

在李老的回忆录中，有一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讲到反王实味斗争的经过和教训。文章的最后一节：“一个悬案”，提出了王实味错案的复查问题。此文是李老在1981年定稿的。在1984年7月出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在1986年4月出版的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都收入了这篇回忆文章，但因为当时王实味问题尚未平反，都把最后一节删去了。现将这一节全文照录如下：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近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组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来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在写此文的同时，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的报告。

李老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征求过李言的意见。

李言，在1942年斗争王实味的时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机关党委书记。此时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他回忆说，早在1942年4月间，康生就派人找他，要他写一份关于王实味日常表现的材料。来人要得很急，要马上写好带走。李言顾不上中午休息，赶写了这个材料。他当时认为王实味发表了一些有错误的文章，说了一些错话，是思想问题。为了想说明未发现王实味有什么政治背景，就在最后写了一句：“王实味的这些言论是在没有什么外界诱逼的情况下自然流露的。”因为写得非常匆忙，把“自然流露”写成了“热情流露”。过几天，康生叫李言参加中央社会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他说：“什么‘热情’？是反革命的‘热情’！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哪里去了？”李言回忆了这件事情之后说，康生在这次会上已肯定王实味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他不知道当时给王实味定的罪名有什么根据；因此很同意李老向中组部的建议。

李老还就这个问题征询过我的意见，同我商量过。我此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研究生院的工作。1942年，我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室主任是艾思奇。整风开始后，临时调到院党委帮助做宣

王实味和夫人孩子



教工作。我到院党委工作的第一天，就在全院研究人员中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对王实味错误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95%。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小视的问题。应当做细致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开座谈会的前一天，李言授意要我带头发言，指出有极端民主化偏向的人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他的错误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我说：“我看不能这样提。”反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总学委”。我理解是康生。我就说：“我刚来党委工作，如果这样发言，别人会误认为是党委的意见，会把方向引偏的。”李言接受了我的意见，他找了另一个同志发言。在第一次大会上，这位同志按照授意发了言。当时许多同志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想法，有好几个同志发言表示同意。在第二次的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从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我觉得会议这样开下去不好，就找李言提意见，同时耐心找王实味谈话，希望他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家对立、僵持。经过三四次谈话，王实味哭着对我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于是在开会的第四五天，我就找李言谈，对王实味问题，应该明确作为思想问题来讨论，耐心地开导他，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李言听得很认真，神情很严肃，一言未发，未置可否，看来他是在考虑我的意见。隔了一天，李言找我，严峻地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他说，王实味是双料的，不仅是托派分子，还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在对敌斗争中，绝不能丧失警惕。”我问：“有什么证据吗？”李言沉思一下说：“有证据也是上面掌握的，不能告诉我们。”我想，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又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总不会凭空乱说吧。但是我又想，我在到延安以前，有过好几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坐过5年半，同特务、叛徒、托派斗争过，怎么我看王实味总不像是个坏人呢？最后我按服从组织的原则相信了康生的话。在“文革”中暴露出康生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刽子手以后，我痛心地感到这个家伙在党内不知做了多少坏事！因此，李老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现在应该到了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的时候了。

1981年7月，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创建40周

年。在京原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开了个座谈会。有好几个同志提出，应该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李老表示，他正在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为王实味复查的建议，他会负责协助中央组织部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曲折的过程

中央组织部在接到李老的建议以后，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中说：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王实味的“托派分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托派分子王凡西在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4年7、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复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1985年，王凡西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声称要“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乃至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王凡西说，他和王实味原是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后来，王实味与党失去了联络，同支部的几个人也都失散了。1930年春天，他在上海遇到了王实味，大约有1年时间，来往不到10次。同他们来往的还有陈其昌（陈清晨），也是北大同

学，还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此时王凡西和陈其昌都已加入托派。他们同王实味谈过托派的观点和主张，王实味同情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此时王实味已同刘莹（也是北大同学）结婚，生活十分困难，靠写作和翻译小说得来的稿费维持生活。王凡西正在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一本托洛茨基的《自传》，约王实味翻译了书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说“……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句话作了说明：“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着重点是原文有的）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王凡西文中还说：“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我是在1986年看到这篇文章的。我认为，王凡西在1985年写的这些话，与王实味在1941年向中央组织部的交代是符合的。这可以消除了对王实味平反的一个“障碍”。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两册）要出版。在下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个地方提到了“王实味”。编注者要加个注释，向我调查，与我研究。最后他们又反复查证，在该书“注释486”中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此书在1986年8月正式出版。我认为，这对于强加给王实味的“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这顶帽子，是个公开的摘除和平反。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一直想着，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李老临终的嘱托，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李老和李言都离开了人世，过去他们尚未做完的事，只能由我来完成了。因此，在我看了王凡西的文章以后，接着又

读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那条注释以后，就按捺不住的心情，在1986年11月，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个报告，再次提出为王实味“托派”问题平反的申请。在报告中，我还建议把从批判王实味，直到“文革”批判“三家村”的经验教训作个总结。可是报告送上去几个月以后，因故又被搁置起来。

1988年3月4日，我再次写了报告。5月13日，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报告已经批转到公安部，因为王实味的档案在他们那里，并说中央组织部将协助公安部做好复查工作。

6月30日，公安部派了两个青年同志找到我谈话。我们集中谈了对复查王实味“托派”问题的意见。我并把李老写有《一个悬案》的回忆文章的油印稿送给他们一份。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很积极，其中一位年龄稍大几岁的同志说，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实味，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看到我写的报告以后，又听了我的谈话，回去向上级汇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调查清楚。此后，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能够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的线索都调查到了，到年底写了一个复查报告初稿。此后又因故搁置了一段时间，到1991年2月7日，终于由公安部作出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个决定。

至此，王实味在蒙冤49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政策，也终于在王实味问题上得到了落实。

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之时，他的夫人刘莹同志已届85岁高龄。公安部派了两位同志前去看望她，把《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送给她，向她表示道歉和慰问，并送了慰问金1万元。她看到《决定》上对王实味恢复用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来她把慰问金捐赠给当地（湖北省十堰市）文联，作为对青年文学奖金基金的一部分，以此作为对王实味的一个纪念。

告慰关心此案的人们

王实味问题，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得到了不少人的关心。

也许因为我写过一篇题为《斗争日记》的文章吧？这是1942年5月27日到6月11日延安中央研究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日记，曾经在当年6月28日和29日两天的《解放日报》上连载，

后来流传到各根据地，流传到大后方，建国后又流传到国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近几年来，为王实味问题，采访我的人，询问我的人，写信给我的人，很多。

当年在延安参加过反王实味斗争的很多同志，都十分关心为王实味平反这件事。1987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医院里，见到了老作家刘雪苇同志，他也在住院。我们几次谈起王实味。他对我说：“在当年的斗争会上，我是第一个揭发王实味有托派思想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后来那样的结果，希望你一定要把为王实味平反的事促成。要不然，我死了也心里不安。”

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也有不少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人，问我这件事。我至今仍保存着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是1988年7月收到的，信中说：“最近阅读李维汉老的《回忆与研究》，……可感受到，李老是个非常正直诚实的人。不知给王实味平反工作为何还不能落实？但我想，在你们这些身历其事的老一辈的努力下，事情总有个正确的结果。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我在盼望着这一天。”

王实味的夫人刘莹和女儿、儿子，也都和我多次通过信，见过面。我深深理解他们“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刘莹在1988年写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已82岁高龄的人，身体日渐衰弱，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早日看到王实味得以平反昭雪。”

有些外国朋友也关心王实味的问题。1984年，我接到过一位中文名字叫刘慕实的美国朋友的来信，他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我在《斗争日记》里的一段话，为此征求我的意见。在1986年和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阿普特教授两次来我国访问，也都同我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

我还看到过一些报刊发表的论文或提及这个问题的文章。为什么王实味这样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件事，至今还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我认为，这不是只对一个人，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关心，是反映了人们对我国政治改革事业的关心。

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责任编辑：仲文）

花 凉 石 路 侗 侗 侗 情 桥 亭 板 路 山 水 乡

陶立璠

侗族大都聚居在崇山峻岭之中，千里侗乡，却是逢水必有桥，上山必有路，十字路口打着醒目的指路标，山腰和山顶上有凉亭供你歇息。花桥、凉亭、石板路，将侗家人崇尚公德，“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

侗族有一句俗语：“求神拜佛一世，不如修路一尺。”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侗族地区，无论你走到哪里，花桥、凉亭、石板路总是伴随着你。夏天，会有人把凉茶、泉水送到桥头，供你消暑解渴，还有人会把打好的草鞋挂在桥头或凉亭，供行人穿用；冬天，会有人在桥头和凉亭中生起炭火，供行人取暖。桥头的木凳、竹椅是各家各户做了主动送到这里的。侗家人还有一种风俗，每逢过节或过生日，人们总喜欢到花桥、凉亭等公共场所打扫卫生，或在寨子里修整道路，或在山涧小溪上架设木桥，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积阴德的事。

侗族风雨桥建造奇巧，规模宏伟。据不完全统计，较著名的风雨桥在侗族地区有100多座，最早的建于明代。桥形多种多样，大部为木桥，也有石拱桥、石板桥、竹筏桥等。风雨桥是一种楼廊式桥梁，远看就像一座美丽的长廊飞架于河面。桥底是两层合抱粗的杉木梁，架于青石砌筑的菱形桥墩之上。桥面铺设木板，旁边的栏杆，坐凳构成长长的甬道，称为长廊。长廊以瓦顶覆盖。廊的中段和两头，建有若干宝塔形的楼亭，飞檐重叠，并精心雕饰。这种风雨桥一般建在隔河相对的两个寨子之间；也有的建在远离寨子的田垌和山口中。桥的两头通常有葱郁苍劲的风水树，古桥与老树相映成趣，显得格外古朴和壮美。

侗族风雨桥中，最典型的是广西三江县的程阳桥。此桥建于1916年，石墩木面，全长64.4米，四孔五墩，每孔净跨14.2米，桥宽3.4

米，高10.8米的八根连排杉木，分上下两层组成，桥面上排板、竖柱、盖瓦，构成一条长廊式通道。桥上有五座桥亭，当中一座是五层四角形楼亭，两边两座是五层殿形楼亭。传说程阳桥是程阳、马安等八寨的50位老人领头建起来的。他们一边种田，一边走村串寨，发动千家万户捐木、捐钱、捐粮、捐工，请来最好的木匠、石匠，前后花12年工夫才建成。据说，当时为了建程阳桥，老人们从广西三江侗寨一下募捐到湖南通道的许多侗寨。凿石、备料、砌桥墩用了4年，拉木架梁用了3年，立亭、盖瓦、装饰用了5年，共12年。大桥修通那天，桥头桥尾演三台戏，前来祝贺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程阳八寨家家户户争相给大桥捐献糯米饭，酸鱼，招待各方来客。古时候有个名叫布卡的侗族后生，娶了个妻子，名叫培冠，培冠长得十分美丽，过桥时，河里的鱼儿也羡慕得跃出水面偷看她。不料有一天，一只螃蟹精将培冠卷河底岩洞中，并变成一个漂亮的后生逼她成亲。培冠不依，大哭大骂，这哭骂声传到河上游一条花龙耳朵里。那花龙潜入河底制服了螃蟹精，救出培冠，使恩爱的夫妻团圆。这件事十传百，百传千，传遍侗乡，大家修建了一座长廊式大木桥，还在大桥的四条中柱上刻上花龙。大桥建成后，侗家人奏芦笙，唱耶歌（民歌的一种）表示庆贺，这时天空飘来彩云，形似长龙，霞光万丈，众人细看，正是花龙回来看望大家，于是将这座桥起名为“回龙桥”。传说寄托了侗族人民美好的愿望和对风雨桥的纯厚感情。侗乡的风雨桥的确是和侗家人的爱情生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喜庆节日或繁星满天的夜晚，侗族青年男女最喜欢在桥上对歌谈情，这也许就是风雨桥又叫“花桥”的缘由。风雨桥的功用是多方面的，除方便交通，避暑御寒之外，它还是侗族人民娱乐交

际、迎送客人的场所，在侗寨举行祭祖活动时，这里成了防止陌生人出入的关卡。有一首拦路歌是这样唱的：

主方：
拦你路，
今天我们寨上祭“祖母”。
“祖母堂”中在敬茶，
陌生人不能进寨只能出。
为了全寨得安宁，
莫怪我们来拦路。
客方：
快开路，
我们背来“大祖母”。
我们来自弄堂客，
翻山越岭其无数。
请来“祖母”保安宁，
人畜平安村寨富，
谁再说我们是陌生人，
“祖母”会发怒。

在其他时日里，老人们在这里弹琵琶，讲故事，谈古论今。未婚的青年男女在这里对歌、赛芦笙。每逢节日，桥头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喜气洋洋。桥头供有“桥头土地”，桥中央的塔楼里，供奉侗族的民族神“萨”神。“萨”在侗语里是“老祖母、太祖母”的意思。供奉在风雨桥上的萨神，侗语叫“萨高乔”，是侗族的女神之一。侗族民间信仰中最崇拜的是女神“萨麻”。在侗寨村头，都有一石砌的圆丘，上栽黄杨树，树旁放一把半开半合的油纸伞，这红伞（或黑伞）护卫的便是萨麻的精灵。“萨高乔”是侗族的桥梁保护神，和“萨麻”一样，它具有驱除邪魔，保护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村寨安宁的神用。所以神寨上一年四季供有糯米饭，灯火不熄。每逢春节或初六、初八进行双日祭，这种习俗直传承到今天。明代以后，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有供奉关公作桥的保护神的。不过在侗族心目中，萨神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23年6月，广州。正是骄阳似火时。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他说自己在一年来的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各地的同志工作也没有做好。他的语气很沉重。后来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陈独秀表扬了湖南，毛泽东是湖南区委书记，实际上是表扬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独秀相识于1919年，那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已名扬四海，毛泽东仅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第一次相见，虽然地位悬殊，彼此却留下了深刻印象。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聪敏才干，毛泽东对陈独秀也非常敬仰，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此后两人经常有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共产党。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几乎全遭敌人镇压，唯湖南未受损失，蓬勃如前。因而陈独秀对毛泽东更另眼相看。由于陈独秀的青睐，也由于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绩，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秘书，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几乎仅次于陈独秀，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核心。

1927年，国共合作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老师”陈独秀感到力不从心，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学生”毛泽东却顶风而上，站在斗争的前线，迎着蒋介石的挑战，第一个站出来热烈赞颂湖南的农民革命，写出了语言铿锵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说，湖南的农民革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全中国都应该像湖南一样，发动农民起来，摧毁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言行大加反对。认为毛泽东年轻气盛，过于偏激，担心这样做会使本来就敏感的国共关系更加复杂化，提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后果要由毛泽东负责。毛泽东也就是从这时起与陈独秀产生了裂痕，并在后来的岁月中越走越相距越远。

1927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未能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圈，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党的领袖们痛苦地反思着。在这时有些同志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远见。

蔡和森说，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

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又为一切农民所欢迎。

李立三说，革命失败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意见，国民党已经“死”了，但当时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个意见。

瞿秋白说，党内唯一有独立思想的就是毛泽东。他们共同地感到，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表现了很强的预见性，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革命的要害，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由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又一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们还请他留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则要求，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该尽心听一听下级的报告，并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军事问题。

三 失 兵 权：

的确，当时的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力倡全党要重视农民问题，但却忽视了枪杆子的作用，这使他痛心疾首。湖南那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在他看来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扼杀不了。结果事情却完全相反，许克祥仅用一个团的兵力，一个夜晚的工夫，就把共产党全部打入地下。大好的革命形势荡然无存，这不能不引起忧虑和深思。毛泽东因此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夺取政权，没有武装力量的拥卫，那是自欺欺人。他感到掌握枪杆子非常重要，心里萌发着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决心。他不愿留在中央，要求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所以在会上，

他力争去湖南，去组织农民暴动。同志们为他的真情所动，批准了他的请求。

告别了娇妻幼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继南昌暴动之后，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的队伍除从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一个警卫团之外，其余全部由地方农民武装组成。他们缺少训练，毫无作战经验，但他们攻打的目标却是敌人的中心城市长沙，所面对的敌人数倍于己，所以起义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结果6000人的起义队伍尚离长沙很远，就被敌人打散。

打散的队伍很是难带。队伍向何处去？领导层中意见纷纷。毛泽东主张，敌人力量强大，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坚持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粤赣边境上去坚持农村斗争。工农革命

毛泽东 受屈

□ 张素华

“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几次失权下台。几经沉浮，多次抗争，才逐步从孤立的少数变为多数。当年这一段艰难曲折的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则坚决主张回攻长沙。一路上争争吵吵定不下来。那时人们对毛泽东尚缺乏信心，因为他从未带过兵。卢德铭是警卫团团长，他在起义队伍中很有地位，他表示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因此才千辛万苦地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以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炸了窝。当时中央的方针是发动群众，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因而派给毛泽东的任务是攻打长沙。长沙未克，毛泽东应该重整旗鼓，发动群众再攻才是。谁知毛泽东却把队伍撤向深山。所以在他们看来，那是畏敌逃跑，是右倾，是单纯军事投机的表现。于是有人指责毛泽东一向骄傲自大，喜欢自作主张。为了表明中央的政策不能动摇，1927年11

月，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被撤销，从中央政治局开除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再次下沉。毛泽东在井冈山，以为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自叹加自嘲地说自己已是“党外人士”。

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头的日子很是艰难。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包括毛泽东本人也不懂战争的规律，更无经验可谈，需要在战争中慢慢摸索、体验与总结。红军应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确定？红军和地方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党和军队应建立怎样的关系……，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无一定的原则。

探索中，红军的领导者之间常常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1929年春，有一个叫刘安恭的受中央派遣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到苏联留学，学了些马列主义本本，看到些苏联红军的作法和条条。他来四军后，不下工夫了解红军发展的历史和斗争情况，却对四军一些原则问题，轻率地大发议论，指手划脚，主张套用苏联的经验。刘安恭的主张，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刘安恭则认为：毛泽东只强调了一切都要从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而不按中央的决议和国际的指示办事。本来，四军党内就有同志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和作法不大理解，刘安恭的到来，很多人立刻被他的理论弄糊涂了。于是四军党内发生了争论。

很多天了，毛泽东辗转反侧，彻夜失眠，为解决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而焦急思虑。他激动地对人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的话，而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然而这些是非曲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分清。因此，在红四军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改选前委，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本来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地方代表大会无权改选，但毛泽东还是落选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军权，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前委，同贺子珍等一起到上杭县的蛟洋做地方工作。由龙岩出发，马也被扣留了。事隔60年之后，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毛泽东因为心情不畅，离开前委不久，就病倒了。

过了一段时间，红军打了败仗。陈毅到中央汇报工作，这时的中央是周恩来主持工作，他表示支持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7月离开前委，12月陈毅就根据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

在蛟洋期间，毛泽东对部队和党的建设进行了更深入更仔细的思考。他一回到部队，就把他的意见系统地起草归纳成文，拿到古田会议上，由大会讨论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共分八章，写得很细，极端具体，上至部队首脑应该遵循的原则，带兵的方法，下至伙夫的职责，都有详细的规定。从此以后，同志们的思想通了，心里也比较信服毛泽东了。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深受本本即教条主义之苦，感慨万千，因此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理论上说明和总结客观实际和本本的关系。他告诫人们，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只从本本出发，只从本本出发，必将置革命于败境无疑。

自此，毛泽东、朱德团结一致，领导红军转战于江西、湖南、福建交界地区，尽管有立三“右”倾错误的干扰，红军仍不断发展壮大。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第五军发展成一个方面军，人数达到3万多。蒋介石为除心腹之患，先后派10万、20万、30万兵力“围剿”这支红军。每次蒋介石都扬言很快能将这支红军“剿灭”，但每次都均以失败告终。

然而事情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931年夏，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从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这些曾到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提出了和毛泽东的见解根本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红军已十分强大，因此就应积极贯彻中央的进攻精神。在他们看来，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很快就要到来，红军没必要休整补充，要一直进攻，要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坚决反对，在他看来，这显然行不通，他认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正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第四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县城或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固守，我们这个多有步枪鞭炮，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绝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

“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中央代表团认为毛泽东右倾保守，有碍红军的发展壮大，有碍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

毛泽东心情沉重，认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他们不顾客观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失去了耐性，湖南人的辣椒脾气又上来了。

中央代表团提出第一个要打的大城市，就是赣州。

毛泽东说，赣州城内兵多将广，国民党视为重镇，必然增派援兵死守。且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既没有重炮，又没有攻城经验，盲目去打，等于自取灭亡。毛泽东反对得十分坚决。他还说：

1930年红军攻打过长沙，当时没有重炮，企图用挖坑道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接近敌人，结果红军晚上挖，敌人白天填，我挖敌填毫无进展。红军无法越过长沙城外的电网，就用古法“火牛阵”攻，把牛赶出来往电网上撞，然后人再跟上去。谁知那些牛一触电网就死，大家倒是吃上了牛肉，攻城却毫无结果。难道这些教训不该记取吗？

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然而中央代表团听不进去。他们缺乏实际战争的经验，却自以为有一肚子马列理论，学过苏联的革命经验，想照搬外国那一套，在苏区山沟推广奉行。他们以代表

毛泽东同警卫员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在瑞金



中央自居，自认为比毛泽东能干，也就不把毛泽东的话放在心上。在他们有些人的眼里，毛泽东无非是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而“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

这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把一大堆帽子甩在毛泽东的头上，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不久，他们果真采取了组织措施，取消了毛泽东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实质上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激愤之下，毛泽东病倒了。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兵权。

红军浩浩荡荡地去攻打赣州，围城33天，赣州不但没有打下来，红军一部反被敌人包围。

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东华山休养，发现有人上山来了。来人是苏区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他受周恩来之命，请毛泽东下山解赣州之围。项英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就想找些话说服对方，没料到毛泽东二话没说，抽身就走。贺子珍担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先到中央政府，发电报给前方，建议起用红五军团。然后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共商解围之策。

红五军团是董振堂、赵博生由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部队。这时他们正在整编训练，尚未投入战斗。接到命令，立刻开向前线，他们以大刀同敌人拼搏，很快使攻赣部队脱离危险。这以

后，毛泽东又说服一军团去攻打下漳州，缴获甚丰，取得一次巨大的胜利。

赣州之役使周恩来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打不下来。赣州的失败，漳州的胜利，他感到前线不能缺少毛泽东。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再任总政委。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毛泽东第二次恢复了军权。

重掌军权的毛泽东，立刻建议中央红军从赣江东岸上消灭乐安、永丰、宜黄之敌。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敌5000多，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抚州、南昌、樟树敌军受到极大震动，敌军连忙调整部署，在南城集中17个团的兵力，构筑工事固守。

本来红军想乘胜攻取南城，现在敌情有了变化，如果硬打硬拼，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张放弃攻取南城的计划，把部队撤向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

对此，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留守在后方的同志坚决不同意，催促部队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前线部队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那样会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前方后方在作战方针上意见对立，电报往来频繁。正在这时，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署名发布了部队工作、休整10天的训令，这使后方中央局更加恼火，蛮横地断言：“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1933年6月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讲话



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矛盾已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老账新账一起算，毛泽东首当其冲。

本来攻打赣州严重受挫，事实摆在那里，无容置疑，遗憾的是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却依然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战略上没有错。赣州没有打下来是因为轻敌，爆炸技术有缺点。这个结论表明，大多数人仍在坚持进攻路线。愤愤不平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强调进攻赣州是错误的。他的看法显然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相违背，因此他的意见没能说服在场的人们，反被认为是和中央“对着干”，而失去了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不仅如此，会议还批评他不主张继续出击的观点，是对革命胜利信心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观点。

对此，毛泽东难于接受，在会上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所谓的“一意孤行”，又被认为是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没有组织观点。这样的人如果让他留在前方继续主持军事，政治上就会发生问题。于是毛泽东被再一次撤销了总政委职务，交出兵权，召回后方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丢了大权靠边站。

毛泽东感到无限的烦恼。这些天来，人憔悴了许多，一双原来很大很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为不被同志们理解而难过，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有时根据战争的情况，也给周恩来写封信，提提自己的建议。

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搬到了中央苏区。以前他们用电报书信遥控红军与苏区，有些事情鞭长莫及，这下可以直接地真枪真刀地指挥了。

博古上台时才24岁，小伙子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他实践经验很少，根本不懂军事，只有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仅仅因为有着共产国际特别是王明的信任支持，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自以为有权，结果把王明“左”的一套全部倾泄到中央苏区。

这时还来了一个洋顾问李德。一个是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洋人，一个是不懂中国革命规律的年轻人，这两人凑在一起，于是来了一场自命不凡的瞎指挥。

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在军队和苏区仍有很高威望，他的名字还威震国民党上上下下的官僚、士兵。与红军为敌的蒋介石也一直视朱、毛为自己的敌手，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博古与李德。

但在博、李的眼中，毛泽东是贯彻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撤销其军内的职务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把毛泽东放在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这样毛泽东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实质上他在政府的权力被削弱，以至成了聋子耳朵——摆设，完全被架空了。

毛泽东在苏区的日子更难过了。李德、博古他们不能拿毛泽东开刀，就拿他手下的人开刀。抓出一个“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集团”，会上批，报纸上也批，找到一个事由就要批一通。从此没人敢去看毛泽东，也没人敢和他说话了。

“崽卖爷田心不疼。”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彭德怀气愤地骂李德的话。当时李德暴跳如雷，死不承认。然而苏区越来越小，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前，红军瞅准机会打敌人，让敌人挨揍。每当歼灭敌人的一个团，一个师，就缴获大批战利品，一群群的俘虏提着裤子在前面走，战士们端着枪后面押着，心里是多么痛快！而今天呢？只是在家门口守着，让敌人来打，就那么几杆破枪和用土堆起来的掩蔽体，敌人几发炮弹，辛辛苦苦几个月的“成果”就飞了，更别说飞机一到，阵地就垮了、丢了，哪一个不心疼！李德等又怎么能逃脱他们指挥错误的责任！

眼看着红军作战越来越被动，毛泽东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那是他和朱德等战友们和工农士兵们用血用汗打出来的一块地盘，是可以和蒋介石抗衡的地盘，可以由它向外扩展，进而夺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地盘。然而他没有兵权，没有指挥权。连发言权都没有。他很想挺身而出，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在很多同志还不觉悟的时候，在博古、李德还没有彻底被认识的时候，一味对着干，对党不利，甚至会导致分裂。而这违背他的初衷，是他不愿看到的，也是广大指战员不愿看到的结果。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默默地忍耐与等待着。因为心中愁苦，激愤，毛泽东再次病倒。这次他病得很厉害，高烧不退，直到长征开始还不能行走，是坐着担架同队伍离开苏区踏上了撤退的征程。

红军被迫长征，宣告了王明路线的破产。红

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8万人只剩下不足4万。博古走在路上，不再像原来那样雄心勃勃，谈笑风生了，他看到红军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但是他又无法改变被动的局面。他曾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比划着，以为可以一了百了。毛泽东则在想，不能让博古、李德再这样统治下去了，如果自己再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他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说明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先找到王稼祥。王稼祥是王明和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不少，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现在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王稼祥的心也不能再平静了。他几乎天天在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首先找他谈话了。当时毛泽东生病坐担架，王稼祥伤口未愈也坐担架，两副担架就同行同住。他们日夜交谈，一路探讨。毛泽东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详细地讲给王稼祥听，心平气和地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以及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设想。本来想不清的问题，经毛泽东这么一指点，王稼祥感觉心里亮堂了。他认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同时他还感到，他以前对毛泽东不够了解，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军事上不如李德，政治上不如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现在看来他错了，原来山沟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有理论有经验，是一个非凡的军事指挥家。以红军目前的处境，这副历史的重担，唯毛泽东莫属。于是王稼祥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博古轰下台去。毛泽东对此建议当然正中下怀。

为了使更多的人觉悟，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中央的错误，毛泽东又找中央书记处成员，也曾是博古留苏的同学张闻天谈，找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谈，找中央政治局、军委的同志谈。谈的结果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



古田会议旧址

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严重错误。听着毛泽东的话，看着与会者的表情，李德很生气，坐在门口只是抽烟，说不出一句话来。博古哑口无言，开头他还强调点失败的客观理由，后来尽管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地想，毛泽东讲的也不无道理。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建立了以他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其余二人为周恩来、王稼祥），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这是毛泽东在第3次恢复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重掌兵权的消息一传开，红军上下一片欢腾。杨成武回忆，他带的那个团，聚餐庆祝，大家认为这下红军有望了。而恢复了军权的毛泽东，心里也轻松了许多。他从此带领红军同蒋介石周旋。忽进忽退，忽南忽北，弄得蒋介石惶惑迷离，摸不着头脑。

2月19日，红军再克遵义，痛歼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当时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杀声震天，敌军到处逃窜。国民党军的前线总司令吴奇伟只带着几十个卫士逃到乌江边，听着背后的枪声，过也不是，不过也不是，左右为难。他痛哭流涕地叫道：“好！我就死在这里吧！”这一仗，红军消灭了敌人整整两个师，是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漂亮仗。

毛泽东信步登上娄山关，眼望着险关雄姿，心潮如海，兴奋异常，出口吟成一首词。这首词里有两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的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摆脱了困境，并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夺取了全国政权。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因此再没有发生动摇。

（责任编辑 晓梅）



郑超麟和 中国 “托派”

——郑超麟先生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读者自会评说。

叶永烈

“一个南腔北调人”

1979年11月，武汉鄱阳街（旧称三教街）上，出现一个矮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福建口音的78岁老人，在武汉市文物保管处人员陪同之下，正在那里慢慢踱着。他仔细地审视着眼前的建筑物，陷入往事的回忆。

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物。3个多月前，他刚在上海获释，如今便被请来武汉，踏勘当年的“八七会议”会址。“八七会议”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会议，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摒弃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这位老人，是“八七会议”的出席者。在现存的“八七会议”原始记录上，可以在出席者名单上查到一行字：“鄂代表：超。”亦即中共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

郑超麟在1922年就加入少年中国共产党，阅历颇为丰富。早年，当他留法勤工俭学时，和邓希贤（即邓小平）住在一起。那时，他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王若飞、张崧年（即张申府）、李维汉等等。后来，他跟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蔡和森、罗亦农、项英、潘汉年等都有许多交往……“八七会议”后，跟瞿秋白一起由武汉坐船回上海的便是他。只是他后来追随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解放后，他在上海监狱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获释后，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有着那样特殊的身份，毕竟他是中共早期革命活动的亲历者，何况他的记忆力又极好（虽然讲话有点口吃），我从1984年起，经有关部门同意，一次又一次访问了他。

初次见面时，他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他住在上海僻远的一幢楼房里。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仍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他已八旬高龄，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近年来白内障日重。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文汇报读书周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形，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忆陈独秀、忆瞿秋白、忆茅盾、记尹宽等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生

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24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

他每天夜里12点睡，上午8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吃过中饭外出散步。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客人不多，来访者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

他谈锋甚健，往往一口气跟我谈4个小时无倦色。只是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确是“一个南腔北调人”。我请他回忆他漫长而跌宕多变的人生道路，他颇为感慨。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下文中用双引号标明的话，即摘引于他的回忆文章，是他的原话。

他曾是中共早期活动家

1922年6月18日早晨，18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21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3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还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讨论党章、党纲时，“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在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应当好好学习。”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兴趣。到了法国以

后，他读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出席了“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郑超麟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城。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手里家运已衰落。父亲是秀才。兄弟4人，他为长兄。1914年小学毕业，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600大洋，官方给300）。他考取了，先到广州学法语，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丁山孙（Huchson）橡胶厂勤工俭学。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胎之类橡胶制品。那里，有20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一间木棚宿舍。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邓希贤即邓小平。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等。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周恩来为5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25，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开了4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8人赴苏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这年夏天，“旅莫支部发动同志写稿给《新青年》季刊，已经寄回一批了，我提议《新青年》应当出一期‘列宁号’，纪念年初逝世的伟大导师，提议被接受了，分配了应写的稿子，又派我负责催写。我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便去催讨，那些写稿的人看见我去，就说：‘债主又来了。’彭述之看中我这个本事，以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回国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要去占领《新青年》，便决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7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郑超麟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出席指导，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非德路的启迪中学。“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

“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委员”。特别委员会由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主编《布尔塞维克》杂志。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40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

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

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928年6月、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郑超麟是这样谈自己由中共党员转为托派思想过程的：“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右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这里提及的尹宽，在二十年代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与郑超麟一样成为中国托派骨干。

郑超麟谈及自己怎样读到托洛茨基那些文章的。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的文章，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出印刷费，

由王平等人送去排印的。”

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总书记，由于在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了“陈独秀派”。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

“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决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便敏锐地觉察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 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说：“我未曾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尹宽、彭述之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

他成为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

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通过郑超麟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一，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10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分裂出来之后，“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投机”来了，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

本文作者与郑超麟先生



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

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120人，“陈独秀派”100人，“十月派”50人，“战斗派”30人。四派托派总共300多人。这些托派，绝大多数原先都是中共党员。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7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不到3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7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5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他的妻子同时被捕。但是，她没有被引渡，只在租界关押了两个多月就被释放了。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

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政治犯。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日，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诸神复活》和《玉尹残集》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6岁，穿西装。我问及他的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是一个中学教员。她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与郑超麟结婚，她与他同时加入托派。结婚多年未育，直到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德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

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文字，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外国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50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49年重印的精装本。当时，他大约译了200万字的书，由商务印书馆印5部，在中华书局也出了几部。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1945年3月12日，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7岁！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多数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和妻子同时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妻子在1957年8月10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

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现在的新居。

在监狱关押期间，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监狱供应他笔、纸。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100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3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韵学著作，8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4部中、短篇小说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革’中，狱中也不安宁。一位‘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甚至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看过电影。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据告，由于上面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80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子内活动，不得出院门。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6月29日，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楼房才几个月，10月14日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77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泪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翻看他的诗词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剩蛋残糖对晚晴。终胜游魂墟墓上，祭盘徒羨足三牲。”

《郑超麟回忆录》“历险记”

我初次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

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1800元稿费，即可出版。1986年1月，《郑超麟回忆录》终于由北京现代史编刊社印行。我在北京买到了此书。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6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就的。这些40来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了一番“历险记”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主，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二十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已写了十章20万字，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中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1975年，当他恢复自由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

(下转13页)

1991年6月，郑超麟在黄浦江堤



设计火箭的女八路

李鸣生

我曾查阅了各有关航天资料，在世界航天这个圈子里，巾帼英雄虽不乏其例，但成为火箭专家的，特别是成为像“长征3号”这种大型火箭总设计师的，在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村”里，你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

我们初识在发射架下。那是大凉山峡谷一个奇冷的冬季。你穿一身灰布的工作服，粗糙的面容，花白的头发，岁月的牙齿早已在你的额前啃出道道沟壑。要不是有人向我介绍你就是“王总”，我肯定会把你看作是一位退休的女工。当我与你的手紧紧相握时，让我最先联想到的，是我那远在故乡的母亲！

在发射场那间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没有暖气的简易楼房里，你平静地向我讲述着那早被岁月遗忘的一切。我面对面地坐在你的跟前，听着，记着，想着，像儿时跪在母亲的膝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是一个孤女，你说，7岁失去了母亲，10岁没有了父亲。你的家乡在河北有名的晋察冀边区。抗战初期，你就是儿童团员，后来又当了小八路。1944年，你刚满16岁，便加入了共产党。

1945年3月，你拿着党组织介绍信自个跑到边区，见到兵工厂的厂长自我介绍说：“我叫王之任，今年16岁半，共产党员，我要参加工作。”厂长对你说，我们厂是搞炸药、枪弹、雷管的，你不怕吗？你大声回答说，不怕！于是，你便进了兵工厂。

你分在了硫酸班，一干就是3年。6小时一换，三班倒，棉军衣常被硫酸咬出洞眼，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还常呛得你吐血。我问，苦吗？你说，那时的人没尝过甜的滋味，所以也就不知道什么是苦。

后来，你找到厂长，要去学知识。于是，1948年5月，你进了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接着你又考上了大学预备班。1950年，你又考入了华北大学航空系。

你说当时知识对你来说，似乎比命还要重要。为了建设新中国，你拼命地学，连自己是个大姑娘都给忘了——还是一身农村的土褂子。



王之任

难怪今天还有人，说你满身土气，一点没有专家的风度。

或许，正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土八路”。

其实，你并不土，因为在当年那个世界第一航天大国，你毕竟喝了整整7年的洋墨水！

1951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宴会厅，灯火辉煌，人群沸腾。周恩来专门举行宴会，为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送行。

男同学们都在和周恩来总理频频碰杯，唯独有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学生，站在旁边，举着颤抖的酒杯，很想过去却不敢过去。

你说，那位举着酒杯的女学生就是你自己。你牢牢地记住了周总理的话：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又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那儿后，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回来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你的泪水落在了酒杯里。

你一去就是7年，你先在莫斯科工艺学院学习，第二年又转到喀山航空学院，三年毕业后又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50多门课程，直压得你连气都透不过来。很快，苏联同学几乎都知道了，有一位只要知识不要命的“中国大姐”。

暑假终于到了，学院组织了夏令营活动，你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因为你懂得，只有会休息的人才可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优美的伏尔加河畔，苏联男女同学都在河里尽情地游泳。你虽然不会游却也打湿了双脚，在河滩上奔跑、欢笑为大家助兴。

晚上，篝火舞会开始了。同学很快投入到热烈的气氛中，尽情地跳呀跳。你不会跳舞，却也敢拉上一位女同学，大胆地挤进人群。你有一颗年轻的心，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样。你更懂得应该怎样去生活。

你是女人，却偏偏选择了本该属于男人的事业——火箭发动机。你仿佛不是为爱繁衍后代才来人间，而是专门为了中国的火箭才降临这个世界。你是所有中国留学生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结过婚的一个。但你将青春与生命的热能都投入到了对火箭的学习中，整整7年，只回过一次祖国。直到你31岁时，才为人间奉献出第一个幼小的生命。

你很想自己的祖国。在南高加索的黑海疗养所度暑假时，你说你每天傍晚都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扯起一根草棍衔在嘴里，一边细细地咀嚼，一边久久地望着远方。这时，一种太阳西沉后的清冷，一种身处异国的孤独，便像海风般朝你阵阵袭来。你想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你想快快靠在爱人的身旁。但你不能。周总理在临行前说的话，每天至少要在你的心里复述三遍。你比谁都明白，你身上肩负着的，是整整一个急需腾飞的共和国。

1957年10月，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你得到信息后，自动和中国同学一起跑到机场迎接。站在使馆工作人员的身后。虽然你不能更近地看看主席。但你心中的激动却不亚于黑海的波涛。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中国的气息。使你想起家乡父老和亲人们的嘱托。

5天后，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你们，并发表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这段讲话你一直铭刻在心，但直到33年后的今天，你似乎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份量。

1958年“三·八”妇女节那天，你捧着“优加优”的成绩，终于回到祖国。在莫斯科临上火车时，你流泪了。出国时，你才23岁，眨眼间变成30岁——从青年一步跨进了中年。7年的青春，7年的生命，7年的心血，连同你的理想、追求，以及儿时的梦幻，全

都一起刻在了俄罗斯的土地上。

后来，当中国人发明了“文化大革命”时，你已是一名出色的火箭设计师了，却因此被扣上“苏联特务”、“假党员”的帽子。1970年那个雪花飘飘的冬天，你被送往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对你来说并算不了什么，插秧、割麦、喂猪、挑粪、盖房子、搬砖块、卸水泥、运粮食、你样样都能干。但最让你痛苦的是不能再搞火箭了。

你常常坐在田埂边，一边接着草绳，一边听着蛙叫，望着星空久久发愣。渐渐地，星空成了你迷恋的世界，你总也看不完也望不够。尽管你正背负着地球般的沉重，忍受着人类固有的苦难，但每当你抬头望天时，顿觉心胸开阔，目光辽远，人间的忧愁烦恼转瞬便跑得无影无踪。仿佛只有星空才是一块未被人血污染的净地，你竟产生了想逃离地球的念头。

或许正是这一思想，坚定了你一定要继续开拓空间的雄心壮志。因而即使干校的日子，你依然念念不忘运载火箭！

1976年，你被任命为“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主管氢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你说，氢氧发动机在上天前一共进行了130多次试车试验。前前后后，遇到了不少技术难关。

但在“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几天，当你向我叙述着氢氧发动机诞生的苦难历程时，却显得极为平静，仿佛你和你的同伴们创造的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早已化为历史淡淡的轻烟，不值得提起也无需提起。

当我问到你在这次发射的预测时，你依然显得很平静。你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問題。

就在我们说话间，我突然发现你的头发改变了颜色。为什么今天却青丝缕缕？

你笑了，告诉我，这是自己染的。还说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水，既省事又便宜。说着，还用手揉了揉耳际的头发，显出一种女性成熟的轻柔。青丝，白发，白发，青丝。这一细微的变化，或许意味着，当你迈进花甲之年时，你又一次更深刻地意识到你是一位女性？或许，从少到老，从生到死，人生的春夏秋冬，就是这般的轮

回无穷？

我更无法想象，你从一个农村的黄毛丫头，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火箭总设计师，完成了一个一般男人都无法完成的生命历程，究竟靠的是什么？

而你，却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并继续走向明天，把一位女性生命的太阳，发射到了最辉煌的顶点。

但你还是平静地说，我只不过是赶上了机会。这仅仅是机会吗？

望着你，我又一次想到了我的母亲。

一刹间，我似乎终于读懂了你脸上62岁的平静。

与苏联同学在一起



与外国朋友在一起



三秦大地文物荟萃

——陕西重大考古发现扫描

□王兆麟

据说山西人和陕西人逞强斗嘴，山西人自负地说：“咱山西挖地三尺就有煤炭。”陕西人把嘴一撇，说：“咱陕西挖地三尺就出文物！”

这两人所言均非虚妄，道出这两个省的特色和优势。位于黄河中游的陕西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中国5千年的文明史，陕西占有千余年最光辉的篇章，因此地埋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到目前，全省发现的各类文物点共有3.5万余处，定为国家级的文保护单位37处。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

陕西：中国历史的“天然博物馆”

1990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到陕西，着重对文博工作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他登上西安市中心的明代古建筑钟楼，看到大门两边有副对联：“八百里秦川文武盛地，五千年历史古今名城。”他连连点头，说这副对联对陕西和西安的地位、价值写得比较确实和贴切。

4月18日，他在听取陕西省委汇报后指出：“陕西特别是西安文物高度集中。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在全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曾是蓝田猿人和半坡人的故乡。这里，曾是封建时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秦、汉、隋、唐王朝的故都。毛主席在《沁园春·雪》词中肯定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个人中有三个在这里起家。这里古墓葬极多，包括老祖先黄帝陵在内，有规模庞大的帝王陵园70多座。这里，许多文物古迹是闻名世界的，其中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李瑞环同志接着指出：“拥有丰富而珍贵的文物，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陕西省的一大优势，同时也决定了陕西省人民和党政领导在保护文物方面具有特殊重大的责任。”

陕西省十分重视文博工作，经过广大考古、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建国40多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众所瞩目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文物古迹不断得到维修，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就让我们对这个素有中国历史“天然博物馆”之誉的三秦大地作一番扫描。

蓝田人：人类历史的童年

陕西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一百万年前的蓝田猿人。

1964年六、七月间，中国科学院派出一支考古分队，从西安西南的蓝田县城向东北部的原镇进发，走了20多公里，突然下起雨来。在避雨时，当地农民听说他们是找龙骨（古化石的土名）的，就把手一指：对面公王岭上龙骨多得很。队员一听十分惊喜，就在这里住下来勘查发掘，终于从许多化石中发现一个中年女性头骨化石，经测定距今100—80万年，是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比距今60万年的北京猿人还要早。这一重大发现奠定了陕西地区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摇篮的历史地位。

此外，考古、地质工作者还先后在大荔县发现了距今20万年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新石器时代的完整文化遗址，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国家在半坡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

黄帝陵：重新规划整修提上日程

轩辕黄帝是海内外10多亿华夏儿女的共同始祖，其衣冠冢位于西安北190多公里的黄陵县桥山之巅，其陵园包括黄帝陵冢和轩辕庙两部分。怀着对中华民族古文明缔造者的崇敬心情，历代黄帝子孙在陵区累计栽植了8万余株古柏，至今仍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成为黄土高原上罕见的独特景观。但是陵、庙的规模较小，与号称“天下第一陵”的地位不甚相称。

1990年春，国家把黄帝陵重新规划整修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决定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协助陕西省进行。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陕西省政府于同年5月组织全省有关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赴黄帝陵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勘测，提出一批初步设计方案，随后又3次邀请全国有关专家进行反复研讨，基本确定重修黄帝陵的指导思想。

一、要创造出“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气氛，使来此祭祀、瞻拜者有“圣地”感；二、规划设计要从大的空间环境着眼，使黄帝陵与周围的山川、农田和县城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三、要体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渊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根据以上指导思想和将来把祭祀规格提高到国家级的要求，陵冢和轩辕庙应予扩大；陵区的千年古柏，是活的文物，一定要保护好；陵园重修时，建筑可考虑采取秦汉时的风格，突出古朴典雅的格调，要选择适宜位置，用牌楼、华表、阙门、石碑、雕塑等形式，展现黄帝的功德和上下5千年对中华民族发展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

历史人物和事件，借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的繁衍昌盛，增强艺术感染力。

中国建筑学会受陕西省政府、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委托，在1991年第1期《建筑学报》杂志上公布了黄帝陵重修规划设计5个建议方案（本刊去年第3期封三转载），向海内外各界广泛征集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把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搞得更好。

兵马俑：“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

1974年春，在西安东37公里骊山下，秦始皇陵冢东1.5公里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旁，由于当地农民打井抗旱的偶然机缘，使沉睡了2100多年的兵马俑得以问世。这些与真人真马差不多大小的陶俑多达7000之巨，震惊了全世界，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国家在动乱年代的末期，仍拨出巨款，在藏有6000兵马俑的一号俑坑上建立了两个足球场大的展厅。1979年国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

1980年底，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冢西20米处7.8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这是按秦始皇御用车队的尺寸缩小1/2仿制的。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其结构之复杂，技艺之精落，是以往出土的任何铜器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它们经过修复，在秦俑博物馆北陈列室展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看后说：“这是辆神奇的马车。”

1989年建国40周年前夕，秦俑3

号坑展厅建成开放。这个俑坑的面积只有一号坑的二十七分之一，但你千万不能小瞧它，因为它是统帅这支7000多地下兵马俑的指挥部。同时它还提供了古代军事警卫制度和部署的现场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如果说已经展出12年的一号坑，是秦始皇地下御林军的步兵和车马联合编队的庞大阵容。那末，2号俑坑则是更为齐全的车马、骑兵、步兵集团军，其特点是车兵占总面积一半以上，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的宏伟展厅已完成主体工程，预计可在1992年建成开放。

秦俑三号坑向后人提供了秦代军队各兵种编队合成及装备完整实物，给后人研究2100多年前的秦代军事史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难怪有位军事学家一看到秦俑坑的军阵场面，高兴地说：“这真是个难得的地下博物馆，许多过去说不清楚的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答。

关于中国的雕塑艺术，过去流行的说法是，在距今一千四、五百年的南北朝时代，由于佛教的传入，受着印度佛像雕塑艺术的影响而逐渐成熟。现在大批秦俑的出土，充分证明了中国的雕塑艺术早在2100多年前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填补了秦代艺术史的空白，中国的艺术史也因之需要改写，从而否定了过去流行的中国雕塑艺术源于“外来”说。一个来自古代雕塑艺术著称的希腊代表团，对中国古代出现的如此形体高大、栩栩如生的艺术杰作感到震惊。他们对陶马尤为欣赏，认为具有惊人的写实能力，猜测陶马雕塑得这样生动、漂亮，是不是跟秦人祖先爱养马有关。

秦俑博物馆开放12年来，累计已有2000万中外观众慕名前来，年参观人数仅次于北京故宫而居全国各博物馆第二位。海外来访人士中包括英国女王、美国总统、日本首相、法国总理等1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法门寺：塔下再现唐代皇室珍宝

如果说中国近期最重大的考古发现70年代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那末80年代则有法门寺的唐代皇室大批珍宝。

位于西安西100公里的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桓灵时期，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又一最早的佛寺。1981年8月24日，明代重建的砖塔因地震、雷雨倒塌，1987年春为再次重建而清理塔基时，发现塔下有个面积为31.84平方米的地宫，内藏迄今所仅存的4枚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并有唐代皇帝懿宗、僖宗为迎送佛指舍利而供奉的大批珍宝，其中121件（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古代金银器中等级最高的。各种丝织品多达700余件，代表了中国古代丝绸织造技术和艺术创作的最高水

宋青釉开花团棋子盒



平。如织金锦上的金丝最细直径仅0.1毫米，而我国现今只能制出0.3毫米的捻金丝，国外最先进的也只能制出0.2毫米的捻金丝，都未达到唐代水平。此外还有迄今罕见的秘色瓷，来自中亚、西亚的玻璃、琉璃器等珍品。

对此，法门寺老僧十分欣慰地说：历来人们传说塔底有宝，1966年9月红卫兵“造反”时曾对塔底进行挖掘，这次清理时发现，如果红卫兵再向下面挖60厘米，就到了地宫顶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今清明盛世显宝，方可得以善加保护、珍藏。

这个意外发现震惊中外，被认为是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的一件大事。陕西省立即拨出巨款对法门寺和塔进行整修和重建；并在寺西新建了法门寺博物馆，于1988年冬开放，把这批宫廷珍宝公开展出，不仅世界亿万佛教徒纷纷前来瞻仰、朝觐，中外旅游者产生了浓厚兴趣。使国际旅游热点西安，继东线兵马俑之后，又在西

金玉簪





线增加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文物参观点。

骊山贵妃池： 湮没千年重见天日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到西安客人，都很想去临潼华清池看看白居易《长恨歌》描绘的地方。可是他们看到的却是现代人仿造的假古董，不禁败兴而返。

不过，这种大煞风景的憾事现在已成过去。1982年春，临潼县在华清池温泉水源北面兴修“贵妃亭”，在挖地基时从1.5至2.4米的地下发现了一组唐代浴池遗址。考古工作者根据历史文献和图录，对照考古遗址及出土文物进行考证，确认这5处遗址分别为御汤（又名莲花汤）、海棠汤（即贵妃池）、太子汤、星辰汤和尚食汤，其中御汤和海棠汤就是当年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沐浴之所。海棠汤是其中保存最好的一处，池东西长3.6米，南北宽2.9米，深1.2米，全用青石砌筑，雕刻精细，池的边缘呈弯曲的弧形，平面像朵盛开的海棠花，海棠汤因而得名。遗址保护陈列工程，于1990年9月20日完成，4组古朴典雅的唐风大屋顶建筑，将4处汤池遗址罩盖其中，唯有太子汤露天展示。

一些文物、旅游专家对这个保护陈列工程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样既可以妥善地把千年遗址传之后世，供专家、学者随时研究、考察，又可以让广大游人一睹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故事发生地的原貌，可谓雅俗共赏。

西安古城墙：独特的 环城立体公园

始建于明代洪武3年（公元1370年）的西安城墙，周长13.7公里，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垣。

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历经劫难，被破坏得遍体鳞伤。在中央的关怀支持下，西安市从1983年开始了全省迄今规模最大的古建筑整修工程。到1990年底，共投入870多万个工作日，完成工程工作量1.3亿元。

现在，包括城、河、林、路的全面维修整治已基本结束。城墙的几千处洞穴、塌方、残垣和被毁弃的女儿墙、垛口、海漫、马道已全部作了整修，同时修复了12座敌楼和一座魁星楼；过去蚊蝇孳生，被称为西安“龙须沟”的环城河拓宽加深，衬砌了岸坡，河上新修了14座形态各异的桥涵，蓄洪库容从40多万立方米扩大到70多万平方米；环城林地又新栽各种树木4万余株，种草皮30多万平方米，栽绿篱10多万株；同时还打通了环城路，新修了穿过火车站广场地下的环城北路隧道。在整修南城牆时发现了压在城牆下的唐代含光门遗址，现已采用大跨度框架结构，把遗址保护起来，可供参观考察。

目前，上从城牆，下到城林，下至城河的立体多层次的环境公园已初步形成。城牆突出历史文物风采，西城楼有反映古都3100年变迁的西安史迹文物展，南城楼为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北城楼展出中国古钱币，东城楼正在维修。还利用城牆上部平面举办古代兵器展，种种灯会，中秋赏月晚会、重阳登高、越野赛等别开生面的活动。环城林内逐步修建了老年文体中心公园，以及瓦舍、茅亭、回廊、茶肆，树立雕塑、诗碑，供市民和中外游人休息和开展文体活动。城牆作为封建社会的军事建筑，其防御功能早已丧失，但是西安在整治维修中，既注意保持古城的独特历史风貌，又注意在新时期发挥其新的功能，作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旅游、休息、文体活动的场所，从而赋予新的生命。

中外人士一致认为，这是文物保

护和利用的一个创造，成为环绕古都的一个美丽的“花环”。美国城市规划学会副主席玛尔库说：“这种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规划思想，是70年代以来世界上公认的先进规划思想。”

周秦汉唐各代：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陕西近年来考古发现不断传出，令人目不暇接，除上述外，比较重要的还不少。

70年代在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发现了早周的宫殿、宗庙等建筑遗址，被誉为中国微雕之始的甲骨文，以及数千件学术价值极高的西周青铜器。

在秦早期都城雍城（今凤翔县），70年代起进行了为期10多年的调查发掘，发现了都城、宗庙、宫殿等建筑遗址和占地21平方公里的秦公陵园，其中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我国最早的木椁墓。

汉、唐两座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发掘，80年代取得了丰硕成果。弄清了汉未央宫的总体布局 and 重要建筑方位、规模，发掘出西汉国家武库，在管理全国工官的官署遗址中出土了3万多片刻有文字的骨签，其字数比一部《汉书》还要多，在唐代皇帝起居理政230多年的官城——大明宫，80年代发掘出清思殿、三清殿基址，百官上朝的朝堂遗址以及李白等名士供职过的翰林院遗址。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官城遗址考古中，大明宫考古是对总体布局和建制最清楚和成果最多的一处。

90年代第一年，由于修建为咸阳

宋盛酒器





新机场配套的专用公路，在咸阳市东部西汉景帝陵园遗址，发现地下有24个俑坑，目前已出土数百个高约60多公分的男性裸体陶俑，就是继秦兵马俑之后中国雕塑史上又一重要发现。与此同时，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区的西北角，首次发掘出国家级的官窑遗址21座，出土60公分左右的裸体男性陶俑数千件。中国文物报评选1990年10大考古发现，它们双双入选。

位于铜川市南郊的耀州窑遗址，是中国古代6大陶瓷名窑之一。近年来先后发掘出密集成片的唐、五代、宋、金、元的制瓷作坊、窑炉、灰坑数十处，以及数千件完好瓷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善、窑炉发展序列最齐全的古瓷窑遗址。为此国家投资100多万元在宋代制瓷作坊和窑炉遗址修建了保护陈列大厅，耀州窑博物馆也正在建设中。

陕西历史博物馆：“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建国以来，由于有计划地科学发掘，配合工农业基建施工清理，以及日常征集和几次大规模文物普查，陕西各地馆藏文物达56万余件（组），但公开展出的文物只占百分之一、二。

1973年6月24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设在西安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参观，目睹狭小的展厅和简陋的设备，并得知还有10多万件文物堆放在阴暗的库房和走廊中长期无法与观众见面时，当即指示：“陕西文物很多，

展览狭小，在适当时候新建一个博物馆，地点可选在大雁塔附近。”

根据周总理的遗愿和实际需要，80年代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正式做出了在西安兴建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馆的决定，定名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陕西省博物馆撤销，改成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于1987年7月正式动工。

这个国家投资1.44亿元的“七五”期间的重点工程，占地104亩，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功能齐全，是当今全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博物馆，于今年6月20日正式开馆。展出的2000多件文物，是从馆藏的11.3万件文物中精选出来的，大部分是国家一、二级文物，不少是刚从全省各地征调来的精华，首次与观众见面，充分展示了陕西悠久的历史脉络和曾作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篇章。

李瑞环同志在开馆之日参观后说：“我们祖先留下这么多珍贵的文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对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均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现在财力有限，也要省吃俭用，挤出钱来，把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保护好。”

加强保护与利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显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光辉的历史，而且对今天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作用。许多来陕西进行社会实践的各地大学生在座谈中说，陕西的文物古迹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青年一代，应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以无愧于创业的炎黄祖先！陕西省劳教单位组

织一批劳教人员到秦俑博物馆参观，他们面对这批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珍宝，从讲解员那儿得知外国人对这些“世界奇迹”的赞美仰慕，心灵深处受到巨大的冲击。有些失足青年回去在决心书中道：今后一定要重新做人，再不干对不起祖先的事了！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专程来陕拜谒黄帝陵，深情地说：“凡我华裔，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凡回国的人，都应该到这里寻根问祖。”

外国有位“中国通”说过，人们要想具体、形象地了解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就必须到陕西去旅行。这些年陕西省会西安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旅游城市，在海外旅游者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不到西安，不算到过中国。”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三秦瑰宝吸引了五洲宾客，成为陕西对外开放的先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2年间，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万人次来陕西参观访问，其中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率领的贵宾就有600余批。这些海外客人通过参观访问，开始了解认识中国，感到中国的伟大，大大增强了中国、陕西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外商来陕投资110多项，协议金额10亿多美元，签订技术引进合同400多项。以文物古迹为特色的国际旅游业已成为陕西省的重要经济支柱，1987年统计，旅游业直接、间接收入达18.6亿元，仅次于机电、纺织工业总产值，成为全省第二创汇大户。

陕西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文物大省的地位和责任，十分珍视历史的馈赠，正在制订长远规划，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文博工作，为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做出更大的贡献。考古队长王学理（右）等在发现现场





许世友

喝酒选将

权延赤



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到了广州。

军区管理处陈良顺负责接待。他请许世友到当时广州最高级的东方宾馆用餐。

“妈的，”许世友开口就骂。先警告他的子女：“广州是个花花世界，你们不许上街乱跑，小心中毒！”

接待人员全愣住了。许世友已经瞪起眼睛，又给接待人员一点颜色：“我不管你东方宾馆、西方宾馆，高级宾馆我不进，资产阶级的一套！”

广州军区的接待人员第一次见这种首长。个子不高，膀阔腰圆，脸上肌厚肉重，两道浓眉像毛毛虫一样蠕动着，目光像机枪一样扫来扫去，看一眼就知道这人偏头脑袋，威风凛凛。不免都加倍小心。

陈良顺小心翼翼地走在许世友身后。他搞了20多年接待工作，观察事情很有经验，马上发现许世友是个“有头有脚”的人物。

他头上那顶军帽，油渍斑斑，还有一圈汗碱……

“你看许司令帽子脏成什么了？”他扯一下警卫员，“你们也不帮他清洗？”警卫员见惯不怪，随口说：“他不叫洗，嫌麻烦。”“你偷着帮他洗么。”警卫员翻一眼陈良顺，淡淡一句：“我也嫌麻烦。”

许世友脚穿一双“草鞋”，不是用草编的，是用布条和线绳编的。陈良顺又扯警卫员：“你编的草鞋？”警卫员不耐烦地甩下一句：“他自己编，你别那么多事好不？”

于是，陈良顺心里有了底：这位传奇式的将军喜欢简单，喜欢“自力更生”。这种首长好伺候也不好伺候：顺其自然，别没事找事。

许世友和军区干部见面，秘书准备了发言稿。他照着念过两句就显出不耐烦，把那几张纸扔到一边，自己

随意说。干脆明了，有啥说啥，没一句修饰或客气话，5分钟完事。以后，凡是开会，他总是这样：人越多，讲话时间越少。他说：“一人浪费一分钟，一千人就是一千分钟，一万个人就是一万分钟。所以人越多我话越短。”

司令员5分钟讲完，别人谁敢再多讲。深受文山会海之苦的干部们，这一条最欢迎许世友。

陈良顺跟随许世友日久，了解也不断加深。

许世友除了睡觉，平时只穿军装，在穿衣问题上无须任何人操心。

吃饭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难在餐桌上顿顿要有酒，而且只喝茅台和古井。他的工资大部分是买酒喝了。下酒菜最好是野味。

在南京军区当司令员，许世友经常开车跑出去几百里打猎，过枪瘾，过“杀生”瘾，过野味瘾。到了广州没地方打猎，就打老鼠。他枪法准，兔子大的鼠不等钻洞，就在跑动中一枪一只地打翻了。但他不吃鼠，打了就送老乡，老乡总是千恩万谢。

广东人爱吃鼠，许世友不好理解：老鼠肉怎么能跟豹子肉比？

社会的发展已经提出生态平衡和保护野生动物，许世友对此也难以接受。军区拟定下发禁止打猎杀生的文件，想到要让许司令认可才能真正起作用。文件到了许世友手中，他大笔一挥：批上个人意见：不许打猎，打鸟还是可以的吧。

文件批下来，军区的“秀才”们都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许世友的餐桌上没了野味，只好用麻雀凑数。对于服务人员来说，没有打野味的责任，只须保证有酒有辣椒就行。所以这工作也不难。陈良顺跟随许世友，多次受表扬。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时，感情已经很深。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来不曾误过许

司令员喝酒吃辣椒。

许世友出门从不进剧院、商店、宾馆；不是奔野外就是进兵营。花木与庄稼比较，他喜欢庄稼；舞场和操场比较，他喜欢操场。

摸清情况后，陈良顺“投其所好”，许世友便更加喜欢这位年轻人。

许世友在少林寺当过8年和尚，练有一身武功。这身功夫多次助他在战场上逢凶化吉，助他七次参加敢死队，八次负重伤而终于活到今天。

但他到广州时，毕竟年岁已大，不是当年舞大刀冲锋陷阵那股子劲了。这是旁观者清，许世友本人却难免“当局者迷”。因为人的心理衰老往往迟于身体衰老。

陈良顺常年搞接待，常年和老年人打交道，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喜欢你惊讶他们还年轻，喜欢炫耀身体强健。陈良顺便顺其心理说顺耳顺心的话，在不出事的前提下，尽量为他们提供显示宝刀不老的机会。

许世友盛年之时，喜欢与战士比武，一条木枪神出鬼没。练对刺，常把战士的木枪磕上天去。来到广州后，他还喜欢同战士较量。拼刺时，他确实余威犹在，普通战士不是对手，他喜欢与强者比试，盛名之下，那些剽悍的“尖子”也不免有点心虚，何况他又是司令员，动手之前战士先失了锐气，所以比试的结果仍是他胜利。实在说，许世友手里确实有些“绝活儿”，比如对刺时撞飞对方手中枪，那是类似关云长的“拖刀计”，岳飞的“回马枪”一样的“绝活儿”。但是时至今日，在他70多岁之际，仍然把战士的枪一条条打飞，其中也有战士相让的因素在里面。每当许世友撞飞战士手中木枪时，便开心地哈哈大笑，操场上，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诚心诚意希望他多开心多大笑。毕竟，他是军人喜爱和尊敬的老将军。

“哈哈，怎么样，宝刀不老吧？”许世友横枪大笑，指战员们便齐声喝彩：“许司令不减当年！”

不减当年的许司令，满怀激烈地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在广西前线，他是司令，还须选个副司令。

许世友捏着下巴踱步，回想他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个一个在脑子里过筛，终于点出一个名字。

“刘昌毅现在怎么样？”

“可能快退下来了，听说已经半休……”

“妈拉个×的，这一仗不让他打，以后就打不上了。就请他来！”许世友虽然点了将，心里也不无犹豫，“但愿他宝刀不老。”

当时，刘昌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被许世友请来广州。人看上去还是老了，但双目炯炯，心气很高。

“许司令，刘副司令到了。”陈良顺安置好刘副司令，去向许司令报告。

“晚上我在家里请客，你多准备些酒。”许世友这样吩咐。

谁也没见许世友询问刘副司令的身体状况，更没见许世友和他谈谈对于现代战争有什么研究和考虑，只听到让准备酒。

因为周恩来已经逝世，没了约束；因为许世友这次不是“自己喝酒”，所以这场酒喝得惊心动魄。喝掉三瓶茅台，还让上酒。他们开始只是叙旧情，回忆当年的九死一生。喝到后来，已是无话不说，敢争敢抬杠。

许世友酒气逼人地问：“酒喝三瓶了，还敢开瓶吗？”刘昌毅豪气冲天地说：“天下没有会喝不会喝的事，只有敢喝不敢喝的人，九死一生过来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许司令喝到哪儿我就喝到哪儿！”

这场酒喝下来，许世友云山雾罩，睡了一天。刘副司令醉了两天。许世友感动地说：“真是好汉一条，不怕死。副司令就是他！”

不能简单地由此而言“许世友喝酒选将”。那是多方面考虑比较的结果，喝酒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何况，许世友对此也讲了很有哲理的一段话：学会打仗并不难，敢舍命对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选将之后就是出兵。许世友带兵有大将风度。部队向前推进，遇到困难很多，不断有报告来，事多得叫人

发毛。许世友不紧张，不着急，甚至根本不操那份心，把报告扔一边。他只管大的军事行动，下达命令让各部队执行、完成。完不成就军法论处。

部队打下谅山后，中央命令撤兵。许世友望着军用地图沉吟，迟迟不下命令。他伸出小胡萝卜粗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比画：“全是平原了，坦克大炮正好发挥用场了，不要两小时我就能到河内。”

可是，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后不无后顾之忧。要防备有人在我们后面捅一下，沈阳军区方面压力很大，中央一再下令后撤。

许世友表示服从命令，同时又坚持拖一下：“拱一拱，我再拱一下……”

许世友是希望将越南主力从柬埔寨牵回来。他对部队领导说：“我们再前拱一下，吓唬他们一下子！……”

他派兵出谅山几十公里。当时，越南的政府机关纷纷撤出河内。接到报告，许世友哈哈大笑，捋起袖子，晃动着粗大的胳膊说：“吓屁了不是？撤了，屁滚尿流！”

战罢凯旋时，许世友阴着脸下令：“我回去不许通知人，不许搞迎接。谁走漏消息我毙谁！”

可是，一位部队领导想，这么大事不报告中央怎么行？便将许世友回来的日期时间报告了中央军委。于是，广东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提前赶到机场热烈欢迎。

许世友乘飞机回到广州，刚出机门就骂出了声。

因为他看到了欢迎的人群。

前来欢迎的首长，在50年代就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是位老资格的党政领导人。他满脸是笑，热情地上前迎接，伸出手握手。

许世友上前一步，一把握住那只手，猝不及防地用力握去。

“哎哟！”那位首长痛苦地叫了一声，几乎要倒下去。

“妈的，叫你们欢迎。”许世友大步而去，钻进了汽车。当时，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有人也哼哼咧咧地讲了一些难听的话。

许世友就是这么一个人。

开庆功大会，中央派王震同志前来参加。派年轻人来不行，许世友不买帐。只能派王震这样的老元戎。许

世友偏头巴脑只尊重老的。广东水果多，常有飞机去北京，他就给邓小平、叶剑英这些老革命家捎水果去。他要是尊敬你，对你印象好，就什么都想送；对你印象不好，什么难听的话都能骂出口，甚至挥拳动手。

许世友是我军一位有着特殊经历和功绩的又富有个性、特色的传奇式将军。所以，人们对他的某些弱点都能善意地给予谅解。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家曾被造反派抄了。后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保了他，他又回到家中。一进家，他不看卧室，不看办公室，也不问丢了什么文件或财物，一溜疾步直奔厕所。那是他个人专用的卫生间，工作人员和子女又把那卫生间叫储藏室。许世友的全部财产就藏在那里。准确地说，是藏在卫生间一个橱柜里。

“妈的，糟了！”许世友一进卫生间就叫苦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拉开橱门，凄惨地大叫起来：“这群酒贼哟……妈的不得好死！”

在场人都忍不住笑了。橱子空了，那里本是藏满了茅台和古井酒。许世友伤心地一屁股坐地上，不愿再起来。

他的夫人田普匆忙地赶来劝他。

“可惜我那么多好酒哟！”许世友只顾对着空酒橱伤感。

“没拿走的东西也全给毁了。”田普心疼地抚摸皮箱上被戳破的四五个洞眼。

“这群不要脸的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妈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全是一群酒贼。”

周总理打来电话：“世友同志，听说你的家被抄了，严重吗？”

“总理呀，我的酒全被他们偷走了，一瓶也没给我留下。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周恩来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周恩来和许世友都是英雄海量，晚年又都是死于癌症。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晚年滴酒不沾了，许世友却直到临死时，还钻入他那小储藏室“偷”酒喝，昏倒在酒液中。他说：“许世友就是许世友，许世友能喝酒，活着就不能变成不会喝酒的人……”

（责任编辑：仲文）

奇耻大辱

——克林德碑的由来和变迁

□王森

在今天北京的东东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80多年前曾矗立起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四根大理石白柱座，组成三个牌楼，制作得很精美。然而当时多数中国人从那里走过都会愤愤不平，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耻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呢？这要从石牌坊的由来讲起。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公使

就在石牌坊建成的两年多以前，公元1900年，中国的大地上，从直隶（即河北）、山东交界一带，掀起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夏天，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立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用严厉手段镇压义和团；同时，还积极建议本国政府出兵侵略中国。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外交使团的会上，狂妄叫嚣：“瓜分中国时机已到。”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从大沽登陆，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与此同时，北京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的卫队，成群结伙上街寻衅，恣意向无辜的百姓和义和团民开枪。13日清晨，义和团列队从崇文门入内城，途经亚斯利教堂时，突然遭到美国兵的开枪截击，造成多人伤亡。同一天，义和团战士三人乘车从东交民巷经过，德国公使克林德指使德国兵拦截，抓住一人。克林德令人将抓到的义和团战士的衣服剥下，连同腰刀一起送往清政府总理衙门，并威胁说，两小时以后就要将他处死。见信后，清政府总理衙门派

提督崇礼等三个前往德国使馆。见德国兵将被抓获的义和团战士捆绑在树上抽打，崇礼等人要求将他带走。克林德蛮横不放。这天傍晚，意大利、比利时使馆门前，都有许多义和团战士被枪杀。法军、奥军的巡逻队，更是见中国人就开枪，不问青红皂白。

第二天，各国使馆人员率卫队继续在北京街头行凶，任意向义和团战士和中国百姓开枪。这天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了一排持枪水兵，在内城城墙上寻衅。他们看到城下沙地上有义和团战士在那儿练习拳棒，便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20多名义和团战士当场全部被杀害。然后，他们又赶往一座庙里，枪杀在场的义和团战士30多人。同一天，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在东单牌楼以北的大街上，向百姓和义和团民开枪，当场杀死几十人。至15日，帝国主义列强派兵将使馆区以及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等地圈禁起来，不准中国军民来往。比利时使馆用炮炸死义和团战士六七十人。美军上校迈默率军队包围东单帅府园的一座大庙，当场开枪杀死义和团战士四五十人。事态仍在进一步发展。

所谓的“克林德事件”

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义和团的极大愤怒。从6月中旬开始，义和团包围使馆区并攻打西什库教堂。与此同时，大沽炮台失守。清政府决定利用义和团抵挡外国的侵略。6月19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各国宣战。同一天下午，清朝总署向各国发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和家属在24小时以内离开北京，

并说明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是“各国有意失和”，所以中国对各国使馆



不再保护。这天晚上，各国使馆人员惶惶不安，其时京津交通已经断绝，到处都有义和团武装，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公使、随员们，自然不敢轻易离开住地。他们聚集在西班牙使馆商议对策。德国公使克林德提出，全体公使立即前往总理衙门，迫使中国政府收回宣战决定。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各国公使的支持。最后，经协商写了一个联合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们缓期离京，并要求第二天上午9时给予答复。清政府答复说缓期可以通融，但各国公使不要到总理衙门来。第二天上午，清政府的这个答复通知到各使馆。然而，内心恐惧的克林德，不到9点，就迫不及待地乘轿前往总理衙门抗议。随行的还有翻译官柯达士和几名水兵。当克林德乘的绿红呢官轿，行至东单总布胡同口时，正值清朝神机营章京恩海率领部下几十人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便命令他们在北边的高处停下，“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克林德屠杀中国百姓和义和团战士，肆无忌惮，血债累累，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外国侵略者称之为“克林德事件”，以此为借口，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辱国辱民的克林德碑的修建

八国侵略联军疯狂地向中国人民反扑，先后攻下天津、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匆忙出逃，在逃亡中，慈禧命令清军剿杀义和团，更无耻地



请求八国联军“助剿”。义和团运动在清军和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八国联军入北京以后，血洗北京城，犯下滔天的罪行。

卖国的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竭力向帝国主义讨好。在逃往西安的路上，清廷于9月25日为克林德这件事，发布上谕。上谕里无耻地说：

“大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前被匪徒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洽，朕追念之余，备深珍惜。著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灵枢回国时，并著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用示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同一天，清政府电令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向德国递交国书，书中对克林德之死表示“弥深惋惜”，希望德国政府“尽捐嫌隙”，“和局早日定议”。

清政府的讨好，换来了德帝国主义的威胁、讹诈。10月14日，德国政府致书清政府竟说：“贵大皇帝祇伤奠，岂是以慰此项无辜之冤魂哉？”于是，德国公使在各国公使商议和条款的会上，提出增加补充条款，即要求清政府派出一个以亲王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柏林对克林德被害一事向德国政府道歉，并在克林德的死地修一座纪念碑。各国公使同意了德国公使的提议，在后来照会清政府的《议和大纲》中，明确规定：

原任德国克大臣被害一事，钦派亲王专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国皇帝国家悔之意；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拉）丁、德、汉各文叙列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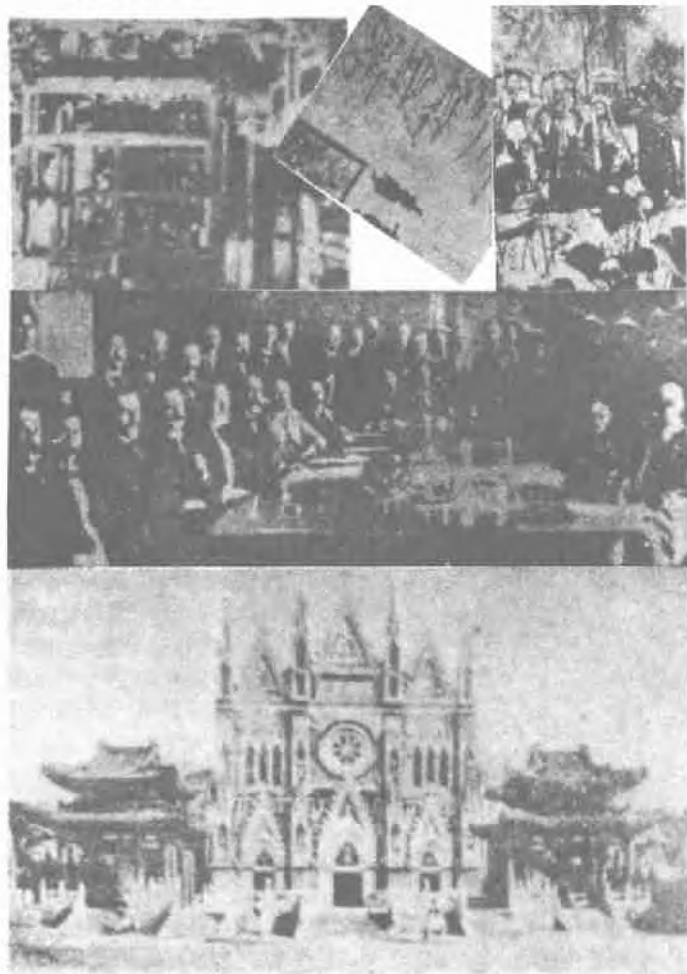
这些规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大的侮辱。然而清政府却奴颜婢膝地全部接受下来，派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大臣，于1901年8月启程赴德国赔礼。在此之前，德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将为克林德建碑之事，改为“用大理石树立牌坊一座”，并要“东西宽满崇文门大街”。清政府唯唯应允，于同年6月动工，至第三年初，即1903年初完工。这就是所谓克林德碑修建的经过。石牌坊上还用了拉丁、德、汉几种文字书写着清朝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文中竟无耻地称克林德是“为国捐躯，令

名美誉”，要求看到此碑的中国人“睹物思人，惩前毖后，咸知远人来华，意存亲睦，相与开诚布公，尽心款洽。”无怪当年中国人走到石牌坊面前无不愤愤不平，感到抬不起头来。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每一个有自尊的中国人都是不能容忍的。

耻辱碑的变迁与新生

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着，18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北京人欣喜地拆毁了耻辱的克林德碑。协约国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出面要德国把拆毁的牌坊移至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重新修好，改为“公理战胜”碑。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从战胜国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原来德国在我国山东的

▽翰林院藏书室被
联军抢劫一空



辛丑年一
（李五修）

（李五修）
一 李五修式

北京西什库教堂

一切特权，又由主张“公理战胜”的帝国主义，转让给了日本。中华民族仍然处在受侵略、遭奴役的境地。“公理战胜”，也只是一块骗人的招牌而已。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才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3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为表彰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决定将“公理战胜”碑改为“保卫和平”碑。请大会主席郭沫若为牌坊题写了“保卫和平”四个闪闪的大字。至此，石碑才真正洗去了耻辱，容光焕发地屹立在祖国首都的土地上。

《马关条约》 签字内幕

乔还田

这是19世纪末震惊世界的一幕。

1895年3月24日，日本广岛马关春帆楼附近。

这天下午4时15分，中国的全权议和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结束第三次谈判，自春帆楼乘轿返回寓所途中，亦即4时30分，一名暴徒突然冲到轿前，轿夫兼卫士尚未反应过来，“砰”的一声，一粒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李鸿章顿时血流满面，一度不省人事。受害者虽然没有死，但不得不通知日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开的会议”。

一个外国使臣被所在国的国民刺伤，实在是一件丑闻。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政府也极为狼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最大的担心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动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假如“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也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

按理说，清朝政府和李鸿章本人应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争取外援，以“酿成国际异变”，可悲的是没有这样做。

在李鸿章受伤前，日本的策略是，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对清使进行恫吓和要挟，一方面仍然派兵攻打中国的澎湖，以加重谈判桌上的筹码。清廷恰恰害怕的就是战争继续打下去，因此迫切希望早日停战，一切回到谈判桌上来。行刺李鸿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顾及到其他列强干涉，以退为进。首相和外交大臣亲临病榻慰问李鸿章于前，天皇降诏严惩凶手于后。尽管李鸿章看出日本的做法不过是“敷衍外面”，自己却压根儿没打算中途退出谈判，以示抗议。3月28日，当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再次亲至李鸿章寓所，通知日方已允诺停战时：“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竟“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

就这样，日本担心的一场风波，化险为夷了。

谈判继续进行。

4月1日，伊藤拿出了和约的底稿。李鸿章看后为之愕然，他没想到日方的贪欲竟这么苛刻：要求中国承



李鸿章

认朝鲜独立自主”；要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要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3万万两；要求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重庆、杭州等7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能输入机器等等。

尽管是全权大臣，李鸿章也不敢作主吞下这苦果。他明白，签订后的条约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为了使每一个字都让皇帝知道，李鸿章在即日傍晚就将条约稿电达北京。

日本首相伊藤等得不耐烦了。4月6日，他发出照会，催促李鸿章“勿再延缓”，尽快对日方条约稿作出明确答复。

李鸿章又电告北京：“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

其时，清廷决策层人士对日方条约稿，仍态度不一。

皇室要员，当时的外交机构——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的主管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主张割让台湾，保住奉天，尽快议和。

帝师翁同龢“力言台湾不可弃”，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发生齟齬。光绪皇帝从感情上是倾向翁同龢的，但究竟采纳谁的意見一时作不出抉择。4月7日，只好让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奉天和台湾，“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

明眼人看出，这封语义含糊的电旨，暗寓“极尽驳论尚不能”时，可

以弃地。

日方截获了这份密电，完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

4月9日，李鸿章将和约修正案交给日方。

4月10日下午4时15分，中日全权代表又在春帆楼开始第五次谈判。

闲谈片刻后，伊藤拿出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款2万万两，并蛮横地告诉李鸿章：日本“已让至尽头”，中国“只有同意不同意这两句话！”

李鸿章忍辱负重，哀声乞怜。

伊藤“悍然不顾”，进而威胁说，中国若不同意，日方决意再战，眼下广岛已有60只舰船做好了出征的准备。

会谈进行到6时30分结束。

回到寓所，李鸿章马上急电北京，说自己已“力竭计穷”，切盼皇帝降旨明示。

次日，伊藤又致函李鸿章，声称昨日所交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中国或同意或不同意，务于四日内告明。其四日限期，系从昨日算起”。

4月12日，焦急中的李鸿章盼来了北京的回电。光绪皇帝指示他继续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但辽东半岛的“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实在无法商改，同意“即与定约”。

4月13日，李鸿章连复三电，强调日方“词气极迫”，已没有回旋余地，要是不按时定约，京师难保。

到此刻，清廷彻底打消了讨价还价的念头。4月14日，光绪皇帝回电李鸿章，说原希冀争得一分之益算一分，现在既然难以商改，就遵旨与之定约吧。

大概是出于履行皇帝能“争得一分有一分益”指示的考虑吧，李鸿章在15日进行的第6次谈判中，又不惜费尽唇舌，向伊藤哀求将赔款减至1.5万万两，并希望以“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作为一个外交官，李鸿章的这种举动，不免有点失态。

4月17日上午10时整，中日和议第7次会谈，亦即最后一次会议又在春帆楼开始。实际上，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陆奥语)。11时40分，当李鸿章和伊藤

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完字时，伊藤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根据这个和约，中国付出了如下沉重的代价：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

这就是割我沃土、索我巨款、毁我经济的《马关条约》(又名《春帆楼条约》)。仅就赔款一项而言，就给父母之邦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不过7千万两，即使全部用以偿付赔款，也需要好几年。相反，这笔巨款却大大滋养了日本。据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透露：“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日元的收入。日本一年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到现在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顿觉无比的富裕。”

它是一个罪恶的里程碑！

打这以后，中华民族又进一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事到如今，李鸿章作何感想呢？他会认为这一灾难是由他个人造成的吗？他会自责吗？

还在东渡日本之初，他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屈辱的使命，是一项“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证明，这次交涉确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当画押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内至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至直省督抚、一般士大夫，“莫不交章谏阻”，把一腔怨愤倾洒在李鸿章一人身上，形成一种“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面。

其实，人们的指责未必公平，时人的意气多于冷静

的分析。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使臣，战败国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在谈判桌上挽回的。李鸿章在谈判中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到头来还是饱尝了种种屈辱的苦涩。他的屈辱就是战败国的屈辱。他是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才被迫吞下这个苦果的。这个苦果早在李鸿章出使前，日方就给准备好了。签字画押的罪名不是由李鸿章代清政府吞下，就会由另一个使臣来吞下，可历史老人，却偏偏安排李鸿章充当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不是么？

本来，清廷于上一年8月1日对日宣战就是出于无奈。当时，恰逢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寿即将临近。还在两年前，她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世铎把庆寿活动视为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派出大批人马采办寿品。据记载，“万寿庆典”的耗资是相当惊人的。仅给慈禧备办龙袍、龙褂、髻衣、衬衣、各色蟒缎、大小卷缎绸等衣物面料一项就耗银23.2万两。为了粉饰太平，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还搭建了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景物等，耗银多达240万两。此外，备办玉册、玉宝、金鞦、轿舆、宫廷点缀和修缮、筵宴、演乐、唱戏、赏用物品也耗去不少银两。据有人统计，这次“万寿庆典”，共挥霍白银不下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收入的六分之一，而这些银两有的竟是挪自“边防经慈禧、隆裕和瑾妃



费”和“铁路经费”。当战争打响后，慈禧虽也假惺惺地发布懿旨：“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繁，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恻悼何穷？……兹者庆辰将届，予以休心修耳目之视，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礼，宜即行停办。”但这仅仅是官样文章。事实上，“庆辰典礼”的活动仍在极其铺张地进行着。11月7日，京即日军攻陷大连的当天，迎来了慈禧的六旬“整寿”。于是，一幕咄咄怪事出现了：当国土沦陷，人民遭难之际，慈禧却在禁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连续放假3天赏戏。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保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入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盖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章太炎的这则联语是当时西太后糜烂生活的真实写照。

果然，当战争只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慈禧太后就急于求和。9月29日，她和光绪皇帝召见翁同龢，派翁赴天津去见李鸿章，命其托俄国驻华公使从中调停。10月初，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又把视线转向英国人赫德。赫德曾这样记述道：10月6日，“孙毓汶、徐用仪和我自下午4点钟谈到6点钟。他们俩人几乎痛哭流涕，愿意接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今后办这样办那样。”当时，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是庆亲王奕劻不少枢臣感到他平庸无能，要求重新起用10年前被西太后罢免的恭亲王奕訢。按慈禧太后的本意，是不情愿起用这位小叔子的。他曾对人讲：“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但考虑到恭亲王的国际影响，只得批准让他再度出山，并使其得到军事和外交上的最高指挥权。不过，闲居了10年的恭亲王，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锐气。他在给密友宝鋆的一首诗中流露道：“纸窗灯焰照残更，半砚冷云吟未成；往事岂堪容易想，光阴催老苦无情。风含远思倚傍晚，月桂虚弓霭霭明；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更何况，奕訢心里也明白，西太后让他复出，并不是要他把战争继续打下去，而是旨在利用他的影响

进行外交上的联合工作。所以，他一旦大权在握，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

当时，在前线作战的大部分是李鸿章的部属——淮军。因淮军屡败，声名狼籍，言官纷纷参劾李鸿章。翁同龢的谋士文廷式曾直言不讳地说李鸿章与日交战是出于无奈，“并非本意”，甚至妄说李鸿章在日本有存银数百万两，他的儿子李经方在日本开办了三所洋行。为了扭转前线颓势，奕訢采纳了军务处建议，调湘军将领刘坤一主持战事，李鸿章遂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遭到降职的处分。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湘军和淮军没有什么两样，刘坤一也并非安邦定国之才。就连文廷式也失望地说：刘坤一坐镇山海关，某天有人造谣日本兵来了，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到1895年岁末，慈禧太后感到打了将近五个月的战争已威胁到王朝的安全，便作出了派遣张荫桓、邵友濂赴日乞和的决定。

然而，日本方面竟又在议和代表的全权问题上大玩淫威，故意侮辱中国。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双方若开始和谈，就应实行休战。清政府也满以为和谈一开始，双方即可停战。可是日方却通知中方：“停战时间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对于日本这种违反国际惯例的做法，软弱的清政府竟屈辱地默认了。

紧接着，清政府要求日方提供谈判代表的名单，不料日本又我行我素，一口加以拒绝。此事连从中调停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感到“未免过分”。

过分的举动仍在继续加剧。

1895年1月26日午夜，亦即旧历春节那天，张荫桓、邵友濂等一行怀着颓丧的心情乘船离开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漂泊，1月28日到达日本长崎。30日转神户，次日来到谈判地点广岛。

日本把广岛定为谈判地点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想把中国的议和代表“孤立起来”。这是一座防御工事非常牢固，并且有重兵把守的城市。中国代表一到

那里，“将被监禁起来”。

在张荫桓一行到来的前一天，亦即1月27日，日本大本劳连忙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对策会议。刚刚上任的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和谈条约方案。明天皇阅览后，立刻加以批准。31日，又任命伊藤和陆奥为日方全权代表。

正像美国人预料的那样，张荫桓一行在广岛的处境，果真恰似囚徒一般。中国书信往来，日人“先拆阅而后送”。首席代表张荫桓想往北京寄密电，日方不允许。清廷来旨，也扣压不送。中国使节提出交涉，日方竟蛮横地回答：中方代表要想给国内寄密电，必须先把密码“书送交译”日方看后，“方可接递”。中方头等参赞伍廷芳看到中国使节蒙此耻辱，不禁感叹道：“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

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中日和谈拉开了序幕。

2月1日上午11时，中日两国代表会于广岛县厅。双方交换全权证书时，伊藤和陆奥“发现”张荫桓、邵友濂的全权证书中有“妥商一切事件”，须“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的限制，遂断言清使无全权，拒绝进行会谈。其实，这种发难是没有道理的。所谓“全权”伊藤和陆奥的证书也不完全，明治天皇颁给他们的证书中也有“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的限制。可是，日本乐于过份扮演战争胜利者这一角色。在他们看来，随之而签订的一切条约必将是强迫的结果，先侮辱一下清使有什么不可呢？

日方虽拒绝了清廷的命令，张荫桓一行是不敢擅自回国的。然而日本又以屯兵为由，不准他们在广岛滞留。如此，张荫桓一

行只得于2月4日，沮丧地离开广岛，到长崎静候清廷的指示。

“战事屡败，使臣被逐”，“中国体面安在？”慈禧太后在2月6日对枢臣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但是，这个对内说一不二的铁女人，对外却怎么也硬不起来。考虑到所谓社稷大业，祖宗江山不致被毁掉，逆来顺受，继续忍受“挫辱”。于是，当日改国书，授予张荫桓、邵友濂具有签字的全权，并将“批准”二字也轻笔点出。

尽管如此，日本仍将张、邵拒之门外。2月9日，日方通过美国人谭恩转电北京：“虽允可再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派从前能办大事有名之员，给予十足全权责任，方可再行开办。”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好下令召回张荫桓和邵友濂。

那么，改派谁为新的全权使臣呢？

还在张荫桓离开广岛前，亦即2月2日，伊藤就对中方谈判随员伍廷芳透露：贵国何不派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来日议和？恰在2月17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刘公岛、中国北洋舰队覆没的当天，日方又毫不掩饰地告诉清廷：中国所派新大臣，必须有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割让土地及一日本日后办理交涉能画押的全权。

正是屈服于日方的这些压力，担心失去王位的清廷重新起用刚被撤职的李鸿章出任全权议和大臣。

2月22日，李鸿章从天津来到北京。当天，光绪皇帝郑重地在乾清宫召见他，在场的有军机处全体大臣。枢臣们就李鸿章东渡谈判中中国能给予的条件展开了讨论。当提及外界议论有中国须割地之说时，李鸿章声明“对割地之说不敢承担”，但又意识到日本必定会利用胜利者这一角色进行索地索款。孙毓汶和徐用仪率直地说，不割地便不能议和，恭亲王奕訢没有表明态度。翁同龢强调“但得办到不割地”，可以多赔一些款。2月25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各省将军督抚电陈割地赔款的意见。第二天，8个总督中有5人；16个巡抚中有7人；21个布政使中有6个电陈主和主赔款，不割地。其余皆装聋作哑。由于实在找不到良策以对，总理衙门只得于当天通告日方：李鸿章具有割地及执行全权。3月3日，皇室要员奕劻等

又公奏慈禧太后，直言不讳地说：日本重在割地，“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由此可见，早在李鸿章赴日前，清廷已作好割地的准备。3月4日，李鸿章单独晋见光绪皇帝，接受了全权敕书。10天之后，亦即3月14日，李鸿章率团自天津乘船驶向日本。

和张荫桓的那个代表团相比，李鸿章的阵容要大得多，张荫桓一行仅23人，李鸿章所带随员、随从加在一起共计135人。

这个庞大的代表团3月19日抵达日本马关后，次日便进行了第一次谈判。3月21日又进行了第二次谈判。3月24日刚结束第三次会谈，就发生了李鸿章被刺事件。

对于赴日谈判期间被刺一事，李鸿章本人好像早有预感似的。他于受伤的当晚告诉顾问科士达（美国人）：自己的“朋友曾警告他不要到日本，因为可能有企业图暗杀他”，但美国驻华大使田贝和法国驻华公使向他保证那里没有一点危险。可现在怎么样了？科士达你看？”

日本人为什么要行刺中国的首席代表李鸿章呢？凶手小山丰太郎在供词中宣称：“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看来，他们刺李鸿章，是旨在阻止和谈，使战争继续打下去。

小山丰太郎的这种歇斯底里症在日本绝非孤例。当时，日本国内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人是相当多的。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甚浓，有人狂言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日本将领所写的诗中，“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入燕京”的诗句跃然纸上。2月21日，当李鸿章要日方停战的要求被拒绝后，日本报纸马上反映出继续扩大战争的调子。诗人山田松堂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于中春！”

由此可见，即使在议和的日子里，日本仍被那种“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的扩张主义流行病笼罩着……

1895年4月20日，当北方的冬天仍被黄尘风沙笼罩着的时候，李鸿章回到了中国。他自大沽乘马车返回

行辕天津途中，望着身后滚滚的黄尘和路旁被呼啸的北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柳树的刹那间，不禁百感交集。“误国之臣！”“卖国贼！”“内奸！”一想到这些不光彩的字眼，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他甚至不敢进京述职，只得让随员杨福同星夜赴京送约本至总理衙门，并代他请了20天假。其时，外国驻京记者报道：“京中士民仇视李鸿章，鸿章不敢进京陈述谈判经过。中国政府，仍在昏睡状态。”

按照国际惯例，李鸿章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但正式生效，还须由清廷最后批准施行换约手续。对于要不要批准换约，清政府内部几位决策人士在御前会议上又争论了一番。软弱的光绪皇帝“因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4月25日，他命大臣们向高高在上的西太后讨主意。没想到，为了推脱卖国的主要罪责，慈禧竟把球又踢给了光绪皇帝。她以患感冒为由，不仅不见军机处大臣，而且让太监传旨：“一切请皇帝决断。”事到如今，连平时主战的翁同龢、王文韶、刘坤一等也开始退缩了。因实无良策，光绪遂派伍廷芳和联芳赴烟台完成批准换约手续。5月8日晚，当时钟指向10点时，伍廷芳与日方代表伊东在顺德饭店互换了条约文本。至此，一场生与死的搏斗以中国的屈辱降下了帷幕。

“生归因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实写照。由于《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件“失民心，伤国体”的事，时人又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更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便把一腔怨愤几乎都倾泻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于是，李鸿章失宠了。没过多久，他就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离他而去。以往“一路扶摇”的李鸿章首次尝到了失势的苦涩味。

（责任编辑：仲文）

留苏幸存者的故事

记老友郭肇唐

□楼适夷

87岁的楼适夷

有友人应邀访苏，托捎一件礼物，送给留苏不归的老友郭肇唐。礼物送到了他的家，可人已亡故，闻之黯然。

他是我的小同乡，父亲是穷秀才，把孩子送去乡下一家当铺当学徒。肇唐不干，开了小差，到当时挺有名的白马湖春晖中学半工半读。学校部分教师与校董不合，到上海江湾联合自办了一个立达学园，有夏丏尊、丰子凯等在此任教，肇唐也跟来了，而且不久进了上海革命中心的上海大学。我还在上海银行当小职员，同乡相见，志同道合，往来密切，常常从他那里知道些政治形势和活动信息。

记得1925年5月30日的南京路示威事件，还是头一天，他特地来通知我的。那天下午，我在工作时间溜号，从南京路东头向西走去，只听到一阵枪声，人群雪崩似的自西向东涌退。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拼命挤上去逆流而西，到浙江路口先施公司门口，道路已被马巡封锁，无法前进，只好随众涌入先施大门，铁栅一下子拉紧，只好在公司禁闭，我从公司二楼走廊向街上探视，只见用自来水在冲刷满地的血渍，死难的尸体已经搬走。守卫在旁的巡捕举枪向上，不准窥探。大家议论这回打死了十多个人，冲在前头的正是上海大学的学生，我想，肇唐可能在内了。

但肇唐没死，他成为学生联合会的中心骨干，罢课、罢工、罢市，忙得见不到面。直到运动风潮过去，他匆匆跑来辞行，说上海呆不住了，要奉派到苏联学习去。从此便断了消息。过了几

年，我有机会呆在国外，才敢和莫斯科通信，知道他在东方大学毕业，又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后来留第三国际工作，和一位波兰裔苏联姑娘结了婚。那姑娘还当过季米特洛夫的秘书，生活过得圆满。

新中国成立，我在北京，他的老兄郭静唐在浙江工作，写信托我打听兄弟的下落。留苏归来大都报喜不报忧，连熟悉他的李立三同志也摇头说不知道。我看口气是吞吞吐吐的，怀疑可能被肃反扩大化“扩”进去了。

至赫鲁晓夫上台，孙治方同志访苏归来，才知道了确讯。肇唐在北极煤矿抬了17年煤块，始终在外相守的波兰夫人，给老赫上了书，1954年平安回家了，现在是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还向孙探问我的消息。不久就收到了来信，怀乡情深，有回国探亲的计划。

正当苏联那只小狗莱依卡乘人造卫星上天的那一年，我接到北京饭店打来的电话，肇唐和妻女一起回国了。我高高兴兴地赶去，他给我看一封党中央同志给他的亲笔信，表示我们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欢迎他回祖国观光。大家兴奋地又握手，又拥抱，对他那波兰太太也表示了特别的敬意，和妻子一起请他上全聚德吃烤鸭。住家与北京饭店近，还请到会间深谈。原来他在第三国际做联络工作。留苏中国同志分了什么什么派，受了王明的“恩惠”，1938年的“大肃反”，以“国际间谍”这莫须有的罪名，一“肃”就“肃”进去了，肃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当苦工。朋友间习惯不多谈本人的过去，谈话涉及老赫上台、二十大后的苏联动态。好比西太后不肯照相，怕脸上一块黑一块白的，我们知道的全是白脸曹操的大脸谱，一切宣传以正面为主嘛。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所谓形势大好的另一面。问赫鲁晓夫怎么样。摇摇头：“几十年铁桶似的统治，谈何容易，孤掌难鸣，要改革就是‘内战’。”

这一次的任务是私人探亲，回了一次家乡，游玩了浙江好些地方，中国同志热情接待，连政治局同志还请他们赴家宴，有的劝他回国工作，有的送给了许多资料，因为他是中国问题的专家，主动供他作参考。北京站站台上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以后通信多了，因为我搞出版，经常受托购些中文书，才知道他研究中国近代史，对太平天国有关的著作甚为关注。

1958年大跃进。这一次，他是苏联科学院访华代表的身份应邀重来的。接待单位听说我是老友，有时也添陪末座，活动余闲，仍来舍下聊天。他对“大跃进”颇有不同的看法：“两块钱一个月的共产主义，可没大兴趣！”“人不是宰割的死猪肉，整个儿活体，怎么用刀子来个三七开，四六开呢？”我当时是“三面红旗”的拥护者，看来得换话题，又谈到了苏联的改革：“什么改革？改革就是‘内战’嘛！”这话他又讲了第三次。

五十年代末期的两次谈话后，经过饿死人的大跃进，开了1963年10月的中央十中全会。最早只有高干才有资格听传达，庐山会议林彪一到会便问：“德怀同志刚去东欧，苏联跑了一圈，赫鲁晓夫给你什么任务？”老总一跳老高，“我一句外国话也不懂，你去问翻译！”不知是传达首长的插话，还是文件本身的内容，传达首长笑一笑：“翻译嘛，郭肇唐，有名的国际间谍！”使我吃了一大惊。在部里的讨论座谈中，首先发言：“郭还是我的朋友，两次回国，都做私人接待。”会上无人应和，过了一天，部党委的同志来找我：“你那天谈的，写个书面报告好吗？”我坦然地叙说。当然这几年也学到一点诀窍，没提什么“两块钱”之类的话。以后也无事了。

一直到“史无前例”的10年，问题又来到了，特务的朋友还有不是特务的？正是“大批判”的好材料。大会、小会，站在地上写着“坦白从宽”四个大

字的台板上,说来说去还是那么几句话,满足不了造反小将的要求。谈了那么多次,还得一一交代其中的内容。想来想去想不起,记起来因为我干的文学这一行,曾被问当时有什么好作品,我赞许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群众”的智慧是惊人的:“果然,赫鲁晓夫看中了彭德怀!”这里通外国竟然还有我的来头,我感到光荣了。

我到今天还感觉我们单位造反派小将们对我是不错的。朱之光作为浙江的统战部副部长,奉省委之命,接待这位自己老战友郭静唐兄弟的贵宾,一路陪着他们又是回家,又是游览,这回受了大罪,罢官蹲棚棚,没完没了的大会和小会,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长期的灾难。一个在山窝窝坚持十几年直到迎接大军的老游击队员,成了国际特务安排在南方据点的特务了。连来京外调的小将也气势汹汹,差一点罚我下跪。

时间进入了八十年代,一天,我接到外交部一个电话,问:“在苏联是不是有个叫郭肇唐的朋友?”我承认了。才知道我驻苏联大使馆最近招待留苏中国同志座谈,鼓励他们继续与国内联系。肇唐提到了我。我当然愿意。不久接到了他的来信,表示年纪大了,怀乡情深,想再回来看看亲友,我表示了欢迎。

原来长得瘦小精悍的肇唐,已经显得苍老,太太年纪大了,不便旅行,是他女儿英娜陪同来的,小姑娘已成了少妇。谈起五十年代两次回国,给朋友添不少麻烦,非常抱歉。我当然不免谈到了“史无前例”的刑讯逼供,有些友人的惨绝人寰的遭遇。他说:“并非史无前例,还不是苏联来的!”看他因衰老而暴露的孱弱憔悴的体魄,不难想象他自己从未详谈过的17年的岁月;并不算我们伟大的英明的创造与发展。

送他回到宾馆,抱歉明天不来机场送行了,谁想这就成了最后的永别。

闻说了噩耗,我一直闷闷不乐,想当年与他先后去苏不归的朋友,都是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老战友,有很多不见回国,董亦湘、俞秀松都惨遭了杀害。据郭自白,当时同上北极的40几位全是中国人,他可是唯一的生还者,幸而在妻女的怀抱中,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1935年1月6日,红军长征攻进了遵义城。自从部队离开江西以来,这是他们开进的第一座城市。干部休养连的女兵们,像过节般高兴。

1月9日,上级命令就地休整,姑娘们就更是高兴了。自从长征开始以来,这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姑娘们像男同志一样,几乎天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奔波,如今,红军打了

征途偷婚记

□陈先义

胜仗,还要在这座往昔热闹的城市停下来休整,她们怎能不高兴呢!瞧,她们那身军装大都洗得干干净净,划破之处补缀得整整齐齐。

这天傍晚,在遵义城“忙”了一天的女兵们都回来了,到了睡觉的时候,指导员李坚真大姐举着那盏松明子灯,开始一个一个清点人数,忽然,她发现少了一个人:刘彩香不见了。“刘彩香!刘彩香!”李坚真找遍了休养连,都没见姑娘的影子。李坚真有点着急了。

“准是逃跑了!”有人气愤地说。

“不会,绝对不会!”24岁的老大姐危秀英坚决否定刘彩香逃跑的说法。比起其他女战士,她更了解刘彩香。这个来自江西赣县的农民姑娘,苦大仇深,在最艰苦的时候,是个打也打不走的好兵,何况眼下打了胜仗呢,她是不会离开革命队伍的。休养连的女兵们都懂得,长征中重要的是要磨练出一双男同志那样的脚,因一旦掉了队,就没命了,为了保护好双脚,刘彩香的绝招是练跑步。她生就一双大脚,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常常把男战友甩在后面,每到一个宿营地,人家都累得躺在地上喘气,她却还能原地跑一跑,蹦一蹦。她双脚起过泡,溃烂过,但从来没有掉过队。所以,危秀英是决不相信刘彩香会逃跑,再说,此时已千里迢迢离开故土,一个姑娘家在这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里,能跑到哪儿去呢?

到了下半夜,刘彩香还是未回来,



许多人认定她真逃跑了，女兵们怨怨艾艾地咒骂着，为革命队伍出了这样的“败类”而感到丢人和愤怒。此刻，只有指导员李坚真沉得住气。这位曾担任过中央妇女部长的红军女战士，对部下了解得更多更细。她沉着冷静地劝告那些议论纷纷和忿忿不平的女兵：

“睡觉吧，同志们！跑了的，追也追不回来，没跑，她自己会主动回来的！明天再说吧！”尽管指导员口气如此坚信，刘彩香的悄然失踪给初到遵义的休养连带来了令人不愉快的气氛。

第二天吃完早饭，李坚真扯了一下危秀英的衣角，把她叫到一边，悄声告诉她：“你去一趟八军团，找到他们的参谋长毕占云，叫他立即把刘彩香交出来。”

危秀英以困惑的眼睛看着李坚真。自言自语地说：“她刘彩香难道真的去结婚了？！”她虽然知道刘彩香在长征出发不久和毕占云相爱了，但她不相信这个时候她敢去找毕占云结婚。那个时候所谓结婚，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只要两个人一起睡了觉，就算结了婚。漫漫征程，不可能有什么复杂的婚礼仪式，有的甚至连请示报告也免掉了。可是，休养连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没谈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生育；谁要违犯了这“土政策”，要受军纪处分。这是长征开始时订的规矩，不同意此规矩者，不准参加长征。所以，谈了恋爱的，决不敢去恋人处“结婚”睡觉，不管对方是哪一级首长。休养连凡是结了婚的女兵，不论何时，历来不准去与丈夫同宿，不为别的，为怕因生育给行军带来累赘。这些听起来有点苛刻，然而在特殊年代，也不能不采取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的规定。李坚真看危秀英仍然以怀疑的眼光望着自己，伸手拍拍危秀英的肩膀，很有把握地说：“去吧，准能找到她。”

果然不出李坚真所料，危秀英赶到八军团时，毕占云正与刘彩香同桌吃饭呢，那情景亲亲热热，显然刚刚起床。一看危秀英来了，毕占云和刘彩香的脸刷地红了。危秀英一字一板

地说：“报告毕参谋长，奉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命令，请归还本连战士刘彩香。”别看毕占云是参谋长，危秀英几句话弄得他理屈词穷，羞愧难当，只是忙不迭地给危秀英让座倒水。为了不使毕占云过于难堪，危秀英顾不得他们没吃完饭，拉着刘彩香的胳膊飞也似地离开了八军团。

回到干部休养连，一下子像炸了窝一样热闹。须知，刘彩香破了休养连的规矩啊！

“彩香，你可真大胆。”危秀英很气愤，“干部休养连的约法三章，你全都给忘了，这下你可给咱女兵们‘争光’了，这叫有出息吗？”刘彩香知道闯了祸，只是吞吞吐吐地告诉危秀英：“行军打仗还好，可这两天一平静下来，心里老惦记他，昨天原本是见见他就回来，没想一见面他就不让走了。真是太可恨了！”说着，刘彩香的脸更红了，“批评、处分、写检查怎么都行，可别让我离开红军啊！”

这还得了吗？有人居然违犯军纪，在长征路上结起婚来了。于是，等待刘彩香的是一场小范围的“批斗会”。主持会的是指导员李坚真；参加人有危秀英、邓六斤、吴富莲……；被批斗的对象除了刘彩香外，还应该毕占云，无奈因公缺席。会一开始，女兵们都颇为严肃。刘彩香耷拉着脑袋，看也不敢看伙伴们一眼，她悔恨只顾迁就自己的感情，脑子一热竟然违犯了军纪。

“说吧，你昨晚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去找老毕睡觉……”发问者似乎觉得出口的话有点粗俗，忙改口，“为什么去找老毕结婚？”

伙伴们一连串的发问和斥责，使刘彩香羞愧难当，她满面通红，眼角边有泪花在闪。不善言辞的刘彩香结结巴巴地申辩说：“我，我好久没见他了，心里怪想得慌。我看部队进了城，一时没什么大的行动，就去跟他见个面，没想到……”

没等刘彩香说完，女兵们一顿连珠炮。

“难道你不知道休养连有不准结婚的规定？”

“你疯了吗？怀了孕你还怎么打

仗？”

“一个连感情都不能克制的人，还配当红军！”

刘彩香放声哭了。别看女兵们个个刀子嘴，一看刘彩香流泪心都软了，也不作声了。何况自己将来说不定也碰上这档子事呢！刘彩香历来是一个泼泼辣辣、风风火火的女子，她一抹眼泪说：“我擅自离队去跟老毕结婚，犯了纪律，请处分我吧！”

“当然要处分！”有人仍然很气愤。

事情已经弄清楚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大家都等待李坚真下结论。

“算了吧！”李坚真冷静地说，“刘彩香同志私自离队去结婚，当然是不对的，同志们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但彩香跟毕占云同志毕竟是长征路上的战友加未婚夫妻，感情一时控制不住，结了婚，依我看，也算正常，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现在既然彩香已认识到错了，我看就免于处分吧！”说完，她用征询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她见伙伴们一个个都点头同意，才又严肃地对刘彩香说：“现在长征刚开始，你已经结了婚，你说，如果你怀孕了怎么办？”

刘彩香此时眼泪簌簌直流，她从同志们眼神里看到了深切的关怀和纯真的情意。突然，她抬头目视大家，用略带羞涩但异常认真的神情向战友们保证：“从今天起，我仍然跟大家一起睡觉，保证不到老毕那里去了，请大家监督我！”

大家开始愣了一下，顿时明白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又把刘彩香围起来，把她抬上天，那股亲密劲，就不用说了。

刘彩香说到做到，整个长征途中，她始终和干休连一起行动。

30年后的一天，毕占云敲开了危秀英的家门。她见门口站着一位高大魁伟的中将，不禁愣了神：“您是？……”

“我叫毕占云，老婆刘彩香！”

危秀英禁不住又惊又喜，原来是30年前缺席“批斗会”的毕占云参谋长。

两位老战士紧紧地拉着手，他们坐下来，叙说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仿佛又回到了炮火中的青春岁月。

画家范曾去台遭打

□竹繁

1991年10月25日，台湾中正机场。

下午3时20分许，随着隆隆的轰鸣声，由巴黎起飞的台湾“华航”066班机进港降落。20分钟后，乘客们按惯例完成了执照查验等过关手续，神态各异走出了海关。画家范曾也在这群乘客之中。

凭自身在台湾的知名度和特殊的身份，范曾估计在出境大厅将会受到不少人的迎接。在进入大厅前，他不时整理西服，系系领带，又将捋头发，清清嗓门，试图给迎接者以良好的第一印象。

天有不测风云。范曾刚在大厅自动门前露面，还尚未听到一句欢迎声，就见一名男子疾步冲过来，拿出少林武功的架式，挥拳迎头击来。“不妙！”不知是机警还是本能，范曾见状迅速向后退了一步。他这一退，虽说自己躲过了这拳头，但却害苦了来接客人的“民生报”发行人王效兰。拳头击中王效兰的左颊，使其趑趄后退数步，险些跌倒。

这一场拳打脚踢的上演，使厅内一片混乱。

这位挥拳打斗者何许人也？此君名曰胡云鹏，是台湾名人画廊的负责人。

见第一次出击因目标规避误伤他人，更为愤怒的胡云鹏又很快发起第二次攻击。他再次挥拳趋前欲打，但却遇到随同范曾来台的友人上前遮挡。即便如此，胡云鹏的拳头仍有不少击中了范曾。

“不要看了，快护着范曾离开！”在众人的护卫下范曾才很狼狈地离开了大厅。

“不能让范曾白挨了好多拳，咱们得收拾一下姓胡的！”一人发话，很快冲出七八人围住了胡云鹏。一顿拳打脚踢，胡便倒在地上抱头蜷曲，脸部及身上多处受伤。

“怎么在机场上也有类似台湾立法院常有的热闹打斗场面？”一位女乘客惊讶地自语道。

“不要多言，快走，此处不可多留！”怕遭不测的同行拽着她快步走出

了大厅。

发生在大厅中的打斗戏，直到警方闻讯赶来制止才算告终。

胡氏为何要在机场上如此气愤地殴打范曾？在警方侦讯及接受记者采访时，胡云鹏讲明了原委。对此，台湾的《中国时报》在一篇专访中作了透露。

问：你为何选在机场挥拳攻击范曾？

答：近两年范曾一再说两年前名人画廊自日本引进的画是假的，使我们损失惨重。去年他又以“侯军”的笔名出了《范曾假画案》一书，污蔑名人画廊。我本来是来和他当面对质的，但一见他就火冒三丈，忍不住打了过去。

问：你是否考虑到在国际机场这样做会造成严重后果？

答：我就是想所有人都知道他“翻脸就像翻书”，出尔反尔的作风。国内有人将他当作大师看，其实他只是画插画的画匠，根本不够资格当什么大师。

问：你一再说范曾出尔反尔，有何证据？

答：1989年5月1日，名人画廊举办范曾作品展，自日本购得15幅他的作品，范曾太太曾告诉我这是好画。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些画失窃后，范曾却于5月14日通过大陆一家新闻机构发表声明，指责名人画廊的作品是假画，而且称连画册也是盗印的。

3个月后，窃画一案被刑事局女警组侦破。胡云鹏曾通过台北某画廊的李姓负责人前来拜访，证实这些作品是真的。范曾也曾主动在其作品集



范曾从巴黎抵达台湾中正机场时，遭到名人画廊负责人胡云鹏的殴打



中正机场海关大门前一场混战。胡云鹏打人后，立即遭到接机者的痛殴。

《中国人物画》上签名盖章，表示此画为真迹，以作为下次展出使用。谁曾想，他却匿名在北京出画，将原先的证实作品全部推翻。这种作风怎么算是艺术家的作为？曾经有人说范曾的画是“托人家的命而活”，一点也没错。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决定去找范曾当面论理的。

问：你挥拳攻击范曾，如其告你伤害罪，你可如何是好？

答：他敢如此告诉，我就敢反告他诽谤。没有什么好怕的。

问：现在你与范曾的关系已正式决裂，将来如何处理？

答：我要求范曾和我当面对质，将所有事情弄清楚，如果他不对，他应该向名人画廊道歉。

胡云鹏理直气壮，毫不示弱。记者问范曾对此有何感想？

他说：“来台湾刚抵机场就受到这种待遇总觉得很遗憾。”



汪东兴日记

——随毛主席重返井冈山

1965年5月21日 晴

酝酿已久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今天终于成行。

上午11点，毛主席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及其夫人和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的陪同下，从长沙市陈山招待所乘汽车前往火车站。毛主席的专列于12时50分到达株洲。接着由株洲改乘苏制吉姆牌汽车，经醴陵、攸县，于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在茶陵稍事休息，吃过晚饭，然后安排毛主席在县委办公室里住一夜。我们在办公室安置了一张床和日常简要用具。为了不给当地增加麻烦，毛主席生活所需的物品，如窗帘、被褥、床及便桶等，都是我们事先按照毛主席的生活习惯自己带的。

1965年5月22日 晴转雨

毛主席来到茶陵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早，茶陵县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就找到我说：“毛主席来茶陵您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作安排。”

我说：“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县委书记说：“我的房子可以让给毛主席住。让毛主席住在办公室里，我们心中十分不安。”

我说：“住办公室也蛮好，主席睡惯自己的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习惯带来了一些用品，不麻烦你们了。我代表主席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

县委领导同志心切地要求见毛主席。我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高兴地说：“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很困难。这一次来可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喝了一口龙井茶，点燃一支烟高兴地说：“你先安排好，待我饭后就接见他们。”

早饭后，毛主席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张平化夫妇、李强、我和徐业夫陪同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照完像后，毛主席对大家说：“这次我们就不能多谈了，要赶路，谢谢大家。”茶陵的同志看到主席这样精神焕发，兴高采烈，自己的愿望又得到了满足，都使劲地鼓掌欢笑，目送主席上了汽车。

毛主席乘汽车由茶陵向江西方向进发，经莲花县到达永新县。在永新县县委招待所休息，吃午饭。饭后会见了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和永新县县委领导同志。张平化同志和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会见时，永新县委领导同志问主席午饭吃得怎样？毛主席笑着说：

(1965.5.21—1965.5.30)

“这顿饭又吃到当年在水新吃过的新鲜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随即，又乘汽车由永新县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开去。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山腰处茅坪的八角楼。这里是毛主席当年工作过和住过的地方。根据主席的意思，我们一行人没有下车，坐在车上围绕八角楼转了一圈。毛主席非常专注地看着八角楼，引起他无限的回忆。

由此不远即到达黄洋界。车刚一停，主席就下车快步走向山顶。毛主席满怀豪情地指着黄洋界周围的山峰叠嶂对我们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一些工事，给了敌人很大打击。”接着主席说：“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我按主席指示的方向去查看了附近的地形，回到主席身边向主席汇报说：“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

我们同毛主席一起站在海拔1300米高的黄洋界上，环视着黄洋界巍峨险要的地势，深为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深感敬佩。

毛主席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上合影一张。然后我们驱车来到茨坪宾馆。

在宾馆刚坐下来稍事休息时，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这1000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1965年5月23日 小雨转晴

茨坪宾馆刚盖好不久，坐落在青松翠竹之中。毛主席住在宾馆一层，我们住在三层。

午饭后我去看主席。主席已起床，看上去精神很好。

我问主席：“休息得怎么样？”

主席说：“可以。休息得还好。这里现在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你们休息得怎样？”

我说：“休息得很好！”

主席说：“请你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专列上的工作人员，还有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拟好了发给中央及周总理的电报稿，经主席审批后发出。

1965年5月24日 晴

今天有关同志分批参观井冈山。有的同

志去五大哨口、黄洋界参观，有的同志去井冈山烈士纪念碑、井冈山博物馆参观。

我去井冈山博物馆参观。

井冈山博物馆座落在茨坪西面，离我们住处茨坪宾馆仅一华里。博物馆里分五个展览厅。展示了从毛主席上井冈山开始，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展览馆收集了大量的当年红军用的实物，集中体现了毛主席等革命前辈在井冈山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

看完整个展览，我还有一些感觉。如有些展览品的处理比较零乱；有的地方文字说明不够清楚；有的历史事实介绍得不够完整……尤其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及组成情况没有说清楚；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建立经过虽有介绍，但组织机构等情况与毛主席著作上讲法不一致。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环绕着。

我参观回来后，和张平化、刘俊秀等同志一起吃饭时讨论了上述问题，他们亦有同感。

饭后不久，主席出来散步。我一边陪主席散步，一边向主席汇报了我今天参观井冈山博物馆的情况，将一直环绕在脑子里的问题向主席提了出来。

我问主席：“当年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哪几支部队组成的？”

毛主席说：“当年井冈山的红军由四支部队组成。一



支是我率领的秋收暴动起义的部队。这支部队在三湾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井冈山时期被编为第三十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一个连的兵力，在永新、宁冈两县交界处驻扎。

“第二支部队是井冈山上原来有的两支小的农民地方武装。这两支小部队分别由袁文才、王佐领导。经过我们派人上山做工作，他们同意我们上山，并接受改编，但有一个条件，即保留原来的建制，保留他们一定的独立性。这两支小部队后来改编成为三十二团，袁文才当团长，王佐当副团长，何长工被派去当党代表。

“第三支部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这次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在部队向广东潮州汕头进军时遭到失败，由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部队退出广东，经闽、赣边转入湖南南部和湘南农军会合，并派人和我联系。当得知他们要上井冈山来的消息后，我曾带一个团到湖南桂东地区去接他们。结果由于当时联络困难，没有接到，只接到由萧克带领的一支小部队。我们回到井冈山后，又听到有消息说朱德、陈毅已提前到达酃县与攸县交界的地方。我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酃县会见。这样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这几支部队于5月4日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为红军第四军）。

“1928年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永新、莲花、宁冈一带与我们会合。这样井冈山的四支部队对外称红四军、红五军。山上的人多了，吃、住都有困难，人员来自不同成分组成的四支部队，红军内部的矛盾也多了。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三大民主，经过商讨，问题和矛盾都能不断得到解决。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开始离开井冈山，先后到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福建西部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建立了革命政权。以后又扩大到江西瑞金县。这样，中国大地上有了一大块革命根据地，革命的形势进入一个高潮。

“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由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守备井冈山，坚持斗争。”

毛主席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与组成的情况，使我对井冈山红军的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中国革命早期革命斗争历史有了新的更深的了解。

1965年5月25日

小雨转晴

今天井冈山下着小雨。雨雾环绕群山，一眼望去，感到景色格外秀丽、迷人、清新和舒适。上午主席休息得很好。中午1时左右，主席派人通知我，说今天下午要见我们，要我通知张平化、刘俊秀同志，下午2时许到主席住地去。

下午2时许，我们三人准时到达主席住处的会客室。主席听到我们到来，满面笑容出来和我们一一打招呼。

毛主席说：“这几天你们在井冈山观感如何啊？张平化是酃县人，俊秀是永新人，东兴是赣东北弋阳人。你们到井冈山的机会比我多，情况比我了解。我是38年前

来过的，现在的井冈山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大不一样了？”张平化同志说：“我虽然是本地区人，但解放后我只来过一次，对井冈山现在的情况也不很熟悉。”

我说：“我在江西工作期间，到井冈山来过两次。”

刘俊秀同志说：“我一直在江西工作，到井冈山来的机会比较多。”

毛主席说：“这次你们陪我一起来井冈山印象如何呀？”

我们说：这次能陪同毛主席来井冈山参观学习，感到特别高兴，也是我们一生难遇的机会。过去我们读主席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因为没有实际感受，领会不深。通过这次跟随毛主席来井冈山实地看看，对井冈山的地形，地理位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当年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加深了对党史、革命历史的认识。今天的井冈山变化很大，和过去比是确实不大一样了。

毛主席听后深情地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毛主席激动不已，继续对我们说：“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事变，宣布反共。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协会，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遇到了巨大的挫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

毛主席说到这里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好不好啊？”

毛主席思潮澎湃，继续说：“1927年9月份，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有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指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编者注），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在修水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我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

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起进攻。一团取道长寿街，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指起义前夕，收编的流落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编者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東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一个团，实际当时只剩下两个营，七个连，不足千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毛主席喝了一口水，又说：“为了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做到班有党员，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都设立党代表，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革除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习气，我们提出建立新型的带兵方法。实行政治上官兵平等，进行民主建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赋予士兵委员会很高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整编前，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悬殊。整编后，改成官兵完全一致，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很快使官兵的关系密切起来。部队在三湾完成整编后，我开始考虑上井冈山的问题。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与广东、湖北、江西、湖南交界。周围500里全是峭壁山崖，古木参天。只有五条山洪冲成的小道通向山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井冈山邻近的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茶陵、莲花等县均有党的活动和农民运动，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

“山上有两支地方武装。一支是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袁的部下有一个曾在广州我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人。袁文才听说我到了井冈山附近，就派这个人来宁冈古城看我。他和我谈得不错，并表示袁文才欢迎我上山。后来我又派何长工上山与这两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袁文才、王佐的态度很热情，都欢迎我上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上井冈山的时机基本成熟。十月份我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开上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夹道欢迎我们。上山后袁文才、王佐同意接受我们改编。他们两支部队编成一个团。这个团人员混杂，经常是在编不听调，不大好管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还是服从了我们党对他们的改编，接受了党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组成部分之一了。”

毛主席沉默了片刻，又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

是相当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的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上山下山全靠两条腿。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靠两肩挑。当时除极少数人说点风凉话，闹点情绪外，大多数人是坚定乐观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当年11月，我们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攻打茶陵县城。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不到一小时就攻下县城，建立了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我率领部队攻打遂川县城，红军官兵猛打猛冲，一鼓作气攻入城内，取得较大的胜利。当时正值过春节，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纪律，热情宣传群众，并执行‘保护工商业利益’等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井冈山周围的新永、莲花等县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各区、乡纷纷建立起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数不清的大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几经失败、周折，我们在井冈山站稳了脚根，扩大了、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的根据地。这一段历史，使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今天井冈山各方面比起38年前是大不相同了。上山坐汽车，住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干净、整齐的衣服，真是神气多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今天我讲了许多过去的故事，你们还可以再去访问一些井冈山的人民群众。老井冈山人都知道过去井冈山斗争是如何艰难困苦的，都知道无数的井冈山人为了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的精神。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呵！”

毛主席一下就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我们听着主席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年井冈山的斗争生活、战斗情景，很受教育和鼓舞。

主席最后说：“我今天说的是1927年至1928年底井冈山的情况。后来年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开始离开井冈山，先后到赣南、闽西地区。在东征福建后，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又扩大到江西瑞金一大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和由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今天说了不少话，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仔细听完主席讲井冈山创立和发展的经过，难得听到主席今天讲了这么多话。我用心、用笔拼命记录毛主席讲的每句话，生怕遗漏掉什么。

1965年5月26日

晴

毛主席起床后，吃过饭，在住地附近散步。一面走在山路上观看对面群山变幻不定的白云，一面向陪同他散步的井冈山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询问井冈山建设情况。

毛主席说：“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井冈山的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说：“现在进出井冈山建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准备再建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这条路正在修建。”

毛主席又问：“井冈山现在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样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

井冈山管理局的同志说：“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毛主席接着说：“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革命成功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应该利用井冈山革命的这些历史，多宣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让后来的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我们问主席：“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激烈，许多同志英勇献了身，您知道现在还有那些老同志健在呢？”

毛主席说：“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在党、政、军领导岗位的领导同志如朱德、罗荣桓、陈毅、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提起这些老同志，毛主席心情有些激动。他说：“今

天和你们谈及往事，心情激动是当然的。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战斗；没有工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不去起来推翻反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敌人的几百万军队，是不会自行倒台、自行灭亡的。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井冈山。”

主席边谈边走，散步已远离住地，我们考虑主席应该回去休息了，就劝他回来。随后我们送主席回到住处休息，我们也各自回去。

晚上，主席的心情仍不能平静，又找我谈心。

主席说：“这次重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还想和你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性！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最大的闹乱子的是张国焘。张国焘就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子弟兵，可长征的正确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坚持正确的长征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

主席稍平静下来继续说：“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1965年5月27日

小雨

今天安排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及专列工作人员第二批参观井冈山。

主席让我第二次给党中央、国务院、周总理发电报，报告主席平安无恙，如中央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往江西南昌樟树机场，然后用汽车送上井冈山。



下午三时，中央派人将文件送到井冈山。我们把文件送到主席处时，我看到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写“重上井冈山”的诗稿。诗是这样写的：

重上井冈山 水调歌头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人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1965年5月28日

阴

上午毛主席散步后，回到住所看中央送来的文件，其中有关于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情况简报。

下午3时，毛主席找我商量安排接见井冈山革命老同志们；井冈山上的负责同志；宾馆的服务、警卫、医务人员；工厂的工人、山区农民；还有湖南来的送主席上井冈山的同志等。

毛主席对我说：“这些同志辛苦了，我乐意意见他们，和他们合影留念。过去井冈山的许多人民群众为了红军的生存，受尽苦难，流了不少血和汗，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我和他们同甘共苦过。张平化同志代表湖南送我上山，刘俊秀同志代表江西欢迎我上井冈山，你陪同我上井冈山，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参加会见井冈山的主人们。这件事由你安排他们分批进行。”

我接受任务后去作安排。

1965年5月29日

晴

主席起床散步后，同张平化、刘俊秀和我一起谈话。

毛主席对我们说：“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清新，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

张平化、刘俊秀同志说：能有这次难得的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



不及待要见主席。

主席说：“我们难得上山一次，一定要见他们。昨天我让东兴同志安排了，不知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回答说：“我按主席的意见将人分成四批会见。”

毛主席说：“就照你的安排办。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4时，接见开始。井冈山上人群鼎沸，欢声雷动，群情激奋。到处都有人高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来了！”热烈的场面感人至深。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井冈山人很守秩序地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和照像进行得很顺利。毛主席频频向人群招手致意，然后在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之途。一路上井冈山的人民自动形成夹道欢送，依依不舍地送主席离去。

毛主席一行经拿山、泰和县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主席这一天比较劳累，吃过饭后即休息。

这一夜主席休息得很好。

1965年5月30日

晴

毛主席起床后吃了午饭，问我下面如何安排。

我说：“一早吉安地委的同志要我转达他们要见主席的愿望，我答应报告你后再定。”

主席说：“那就见吧，照照像。”

我安排了吉安地委的常委、吉安市委的负责同志和毛主席一一握手、合影。

然后主席一行乘汽车，经峡口、分宜到达樟树机场的火车停车处。

主席上火车前，和张平化、刘俊秀等同志亲切话别。我们和主席一道在樟树机场旁的专列上宿营一夜。

（责任编辑：仲文）

一代翻译大家汝龙的辉煌业绩和苍凉后事

□晓 未

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汝龙，带着他一生的执著走完他75年令人钦佩的人生道路，于1991年7月13日在北京去世。

汝龙作为中国翻译俄国文豪契诃夫作品的权威，这是众所周知的。契诃夫与俄国许多大文豪的文学创作，曾作为很重要的精神食粮养育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人们通过汝龙认识了契诃夫的智慧、执著和幽默诙谐，契诃夫通过汝龙在中国人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汝龙对契诃夫的钟爱和执著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四十年代的朱生豪甘愿忍受贫穷、病痛、饥饿甚至不惜生命而埋头翻译莎士比亚早已经传为文坛佳话。就像朱生豪与莎士比亚、傅雷与巴尔扎克的关系一样，汝龙的名字也与契诃夫紧紧相连。汝龙早在战乱时期便深深地迷上了外国文学翻译，那时他白天从事挣饭碗的职业，夜晚则埋头心爱的翻译工作，后来索性辞职从事专业翻译。因此，他几十年来成了“自由职业者”，仅靠稿费维持自己乃至全家的生计，他是大陆社会里名符其实的“自食其力者”。不料，这却给他的晚年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他长期患肺心病，并一直是靠自己的稿费支付医疗费用，不享有大陆绝大多数公民所享有的公费医疗待遇。今年初夏当他再度发病时，家属通过熟人的帮助让汝龙住进了北京朝阳医院8人一间的病房，由于医疗和护理实在太差，最后又转到一家民办的康复医院。多年来汝龙家属曾向有关单位要求解决汝龙的公费医疗问题，但由于他没有单位编制而受到拒绝。这次汝龙病重，在住院医治困难的情况下，汝龙子女曾向中国作家协会“求援”，要求帮助改善住院条件，多年来汝龙没有担任任何社会公职，



汝 龙

唯一的“头衔”是“作协理事”，在费了许多口舌和腿脚后，作家协会则开了一份向医院证明汝龙为社会知名人士，可以住高干病房的介绍信，以后便不再问津。汝龙悄然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家属简单地办理了丧事，没有追悼会，没有向遗体告别，没有治丧委员会，也没有发讣告，甚至没有留骨灰！一代翻译大家就这样苍凉而惨淡地离世而去！

汝龙走了，双手空空而去，然而留下的却是他毕生为之呕心沥血的60多册译著和好几千册的珍贵藏书——几十年来他悉心购买和珍藏的帝俄时代的俄文版文学名著及它们的英文译本，还有部分中文书籍。当汝龙去世后，笔者走访汝龙夫人和子女时，汝龙的女儿深情地说：“父亲除了翻译还是翻译，他一生都是在为人民工作，家里除文学界的朋友，几乎不结识其他人。”

按照汝龙的遗愿，家属向作家协会通报了噩耗，对于这样大的一个机关来说，办理一桩名人后事是完全不在话下的，况且汝龙还是作协理事。然

而他们却双手一摊，说时间太紧了，一切都来不及做了，汝龙家属则很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一切都按汝龙生前要求丧事从简的意愿办。汝龙去世不久，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在一版左下角发了一条消息，报道汝龙去世及他生前要将自己的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的遗愿。在此期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派人向汝龙家属表示慰问，汝龙曾在该出版社出版过《契诃夫选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而与此有关的翻译家协会只通过电话表示了一下意思。

汝龙一生远离名利和社交，兢兢业业埋头文学翻译，是中国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刚正不阿、超凡脱俗、自甘寂寞和清贫的又一典型形象。他早年遭遇动荡、晚年苍凉，又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际不幸的强烈证明。汝龙从未正式进过大学念书，青年时代酷爱文学，立志要献身文学事业，可是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代，文学根本无法谋生。高中毕业后他就到铁路上谋职，以后又由于战乱流亡于南方各地，靠当教员为生。他勤奋好学，一边当英文教员一边习英文，从而开始了文学翻译，他早翻译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都是从英译本译成中文的。从那时起，他开始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并帮抽烟提神。抽烟最多时为一天两包，他的肺心病主要也是来自这点嗜好，一直到临终他都未能丢弃这一嗜好。病重期间，他在医院里还向女儿提出要一包英国烟，然而只抽了一支就离世而去……解放后，汝龙立志更准确、更写实地翻译俄罗斯文学名著，便开始刻苦自学俄语，那时他已步入中年，文学修养和翻译技巧都日趋精深，他开始了从俄

文原版本校订原来从英译本翻译的作品，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工作，这些重新被翻译的名著是：27册的《契诃夫小说选集》、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等。与三四十年代的颠沛流离形成强烈对照，汝龙解放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安定而宁静，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窗明几净的安静环境，以便更多地译著。解放后这一愿望化为现实，他对此是感激不尽的。他觉得只有加倍的工作才能真正报答国家和人民。

“文化大革命”期间汝龙虽不属于任何单位编制，却依然遭到财产被没收、私房被强占、几千册书被抄走的噩运。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汝龙上交的稿费中，每月支他100元作为生活费。被抄走的书，则放置于北京孔庙内，即使在那个黑白完全颠倒的年头，这批“资封修的毒草”仍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由专人定期在孔庙内翻晒。“文革”结束后藏书终于归还给汝龙，虽有缺损，但大多数还是回到了汝龙手中。然而，十来间私房却因已住上他人而不能归还，重新分给汝龙一家一套两居室的住房，一住就是七八年。“文革”中、后期，汝龙夫妇一直坚持翻译工作。他的夫人文颖，也是一位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汝龙晚年肺心病严重、手颤抖得很厉害，好几卷《契诃夫文集》都是靠汝龙口述，文颖整理、誊抄完成的。

八十年代初，巴金到北京参加会议，曾到当时简陋而拥挤的汝龙家看望汝龙和文颖。当巴金见到文颖在缝纫机上翻译东西时，巴金很激动地说：“你连一张书桌都没有，我一定要去为你们呼吁，给你们解决住房。”汝龙夫人一谈起巴金便有点滔滔不绝了：“八十年代初，巴金为好几个人的住房向有关部门呼吁，其中有沈从文、萧乾、汝龙，好像还有丽尼的家属，不久总算都得到了解决。1985年巴金再次到北京出席会议，他非要来我们的新居看看，那天他来时正巧电梯停电，大家劝他不要上楼了，可他说，没关系，我在家也天天爬楼梯。他爬上了七楼，来到我们家里……”1985年巴金已80高龄，而且有腿伤，在不少场合他都是坐着轮椅，那次到京，他亲自登门走访的朋友已是屈指可数了，他对老友汝龙的一片情意，对翻译大家的尊

敬和关心是令人肃然和感动的，与某些部门某些人对出类拔萃的人才的漠视和践踏形成鲜明的对照。

巴金与汝龙的友谊可追溯到三四十年代，早在抗日战争前，远在北平念书的汝龙和文颖曾以读者的身份，向巴金通信诉说他们的痛苦和理想，热情的巴金及时给他们写了回信。抗战开始后，汝龙和文颖辗转南方各地，多次得到巴金的关照和指点。汝龙钟情于文学乃至契诃夫，都受到了巴金极大的影响，汝龙原来打算翻译莫泊桑，后经巴金指点，开始从事契诃夫翻译。汝龙的第一部译著《阿托莫诺夫一家》（后改名《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四十年代中期，由巴金主持的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以后，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小说选集》、托尔斯泰的《复活》以及库普的《亚玛》、《决斗》等也都初版于巴金创办的平明出版社。1953年，汝龙还曾在平明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汝龙五十年代回到北京定居后，依然与巴金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都已毁于“文革”期间。当汝龙听说巴金的稿费全被没收，全家生计陷于艰难，便毅然多次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抽出好几百元托人转交巴金，巴金为此深受感动，他在《随想录》中曾怀着对朋友的感激之情记述过此事。文颖说：“我们一直是把巴金当作老师，他在年龄上整整比我们十多岁，早年在精神上又给我们许多指导，但他对待我们始终是平等的朋友。”汝龙的新居是位于西便门普通居民楼里的两套两居室房子，其中一个单元是汝龙的书房和卧室，汝龙在此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儿子称父亲一生是“苦行僧”，这一点也不夸张。汝龙和夫人居住的房间布置十分简朴，不知情的人初次进入，一定会以为那是下层平民的居室，屋子里没有任何装饰和现代化设备，水泥地、石灰墙，几乎没有一件新式家具，这在目前北京普通平民家里也是不多见的。甘愿过如此清贫生活的汝龙并非完全是手头拮据，解放后至今他靠翻译挣得的稿费积蓄达10多万元人民币，汝龙真可谓省吃俭用，甚至对自己花钱看病吃药都很吝啬，这次病重住院，总向家属询问医疗费用的数目，并暗自叹息：“这点稿费都丢在医院里了，太可惜。”

汝龙并不将这笔稿费看作是私有财产，生前就立下遗嘱，要将此全部捐献出去，用于建立一项青年翻译文学基金。很多亲友和熟人表示不解，有的亲友说：“汝龙的稿费曾先后两次被剥夺，一次是“文革”被没收，一次则是物价高涨后这笔钱大幅度贬值。文颖与汝龙一样，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工资，不享受公费医疗，目前也已年迈，并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汝龙去世后，家属受到不少奉劝，然而文颖却说：“这是汝龙的一个遗愿，因为解放前翻译是没有稿费的，因而他认为这是人民政府给他的，他对此是非常感激的，他死后一定要将这笔钱奉还给政府。”听者默然，如果还说什么，可能就会扰乱汝龙的在天之灵了。

汝龙有三女一子，其中大女儿在离北京200多里的一个小县城当物理教员，二女儿日前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当教授，小女儿在中学当英文教员，儿子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教员。儿女们清一色的都是教书匠，这不知是得之于汝龙自甘清贫的家教，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汝龙的子女中要数二女儿的遭遇最为曲折艰难，她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由于“文革”而遭到不公平的待遇长达10多年，为了争取学历和公正的待遇她不得不出国，读完了硕士、博士，她先后丧失了两个10多岁的儿子，……她的故事可以构成中国另一代知识分子不幸的缩影。

问起汝龙最后的夙愿，他的家属告诉笔者，上海译文出版社近年来已出版了他翻译的《契诃夫文集》7卷，因为整个出版业不景气，还有3卷搁置多年未能问世，契诃夫的其它一些文学作品，诸如戏剧、散文、书信等等更因这种不景气的缘故而不出版了。多年来，汝龙在翻译契诃夫的同时，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契诃夫的长篇论文，这次病重处于昏迷状态时，念叨最多的是这件事，可见他对契诃夫的挚爱。可以想象，如果汝龙能够写出这篇论文，一定会像一坛陈年老酒那么具有醇厚浓郁的芳香和美味，这不仅是汝龙的终生遗憾，也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的一大损失。

最后，让我们愿兢兢业业地为翻译事业贡献了一生的汝龙先生安息！他的名字和成就将会永存！



海粟 台湾之旅

叶雷

1989年12月27日傍晚，刘海粟偕夫人夏伊乔女士由美国洛杉矶飞抵台北桃园中正机场。他的许多上海美专老校友们立即迎上前去亲切问候，向他献上花环，热烈欢迎他的到来，随即他在旅台学生搀扶下，离开轮椅，登上带有麦克风的坐台，在机场临时记者招待会上，开心地谈他“十上黄山”的乐趣和感受。

在海老心目中，黄山是他创作的

最大源泉和他艺术的最高圣地。因而他抵达台湾的第一件事，是要向同胞们诉说他以94岁高龄十上黄山，再次“拥抱黄山、吞吐黄山”的愉快经验。海老对黄山的痴迷起于73年前的1918年。在黄山瞬息万变的景色中，海老激发出大泼墨、泼彩的绘画风格和博大的艺术胸怀。他对学生和记者们说：“十上黄山，我更深深体会到人生何其有限，但学问无涯、艺术无涯。我总觉得学问不够，无奈何人生短促，活到95岁，或者活到100岁，甚至150岁都有完尽的一天，而学问和艺术却无止境……”他还说：“画山水，如果老是把几棵树和几座山翻来覆去地画，就不足以称得上创作了。”海老还认为，气韵生动是创作的最高境界，临摹只是创作的过程。他告诉人们，他学中国画是从古人古法入手，最后则努力融贯中西。

12月29日，在董氏基金会和历史博物馆安排下，海老又出席在历史博物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我为了来台湾展览，从去年十上黄山的50张画里，挑了20多张出来。”他希望大家看看他近年的泼墨泼彩作品，他说：“‘师自然’其实不够，更要‘胜自然’，‘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大家知道我喜欢艺术，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学问无底，我还要努力，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向台湾同胞学习。”他还将随身带来

的数米长书法长卷展示给记者们看，用以充实展览。他表示，他很喜欢写字，其中尤其偏爱中国文字中最难但却是最美的“篆书”。至今还能悬腕写生，画极细的松针和点景人物，均得力于康有为教导的书法。

海老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影响他坚持信念的主要因素。他在12岁时，见到家中所珍藏的《史记》，便问老师《史记》是什么，老师不肯解说，他又追问母亲，至今依然清楚记得她读了几十遍的内容，每次遭困境，海老便以司马迁的境遇勉励自己。

同日，海老又与台湾画坊人士会晤，有上海美专校友、中国美协会员数十人。海老说，由于喜游名山大川，世界许多地方他都去过，近年来频频周游世界艺术圣地。甚至还攀登了埃菲尔铁塔，但最喜欢的还是黄山。

海老说：“科学家与自然争，艺术家也要与自然争，除了师造化，还要欺造化，使法自我生。”“中国画家必须具有诗、书、画结合之才。因为，有了书法基础，作画的笔墨就不同流俗；有了题诗，可使画面、画意更完整。”“搞艺术的人，为了成名，拿报纸来鼓吹，拿金钱来运动，更加不对。所谓‘美在自然，自然方美’，有了虚荣心，就无法自然地达到美境。”“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他主张旅行写生，率直天真、性情是求，最反对描头画角，专事修饰。他还谈到艺术家的生活态度：“不要以为学美术的，一生便可以随便。西洋的大艺术家生活有秩序，整齐清洁，绝不散漫。每个人要自己管自己。”海老的话引起人们的尊敬，当地报界称誉他不忘劝勉后学，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1990年元旦下午3时30分，“上海美专师生联展”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隆重开幕，海老亲临现场，主持开幕典礼。

正逢假日，慕名而来的观众把展览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台湾报纸称为“人潮汹涌”，“使原本宁静的历史博物馆，顿时成为吵闹的菜市场。”下午3时30分许，历史博物馆早已挤满人潮，欲一观大师风采的画迷和观众蜂拥而至。40分许，当海老出现在历史博物馆一侧的刹那，观众们便顿时欢呼起来。

开幕典礼在博物馆二楼举行。展

厅里人头攒动，毫无空隙。海老以激动而洪亮的声音称呼在场观礼者为：“亲爱的同胞、兄弟、姐妹，”“这样热烈的情况使我非常感动。老年人鼓励我，年轻人也鼓励我。这使我自己感觉，还得再用功、再努力。”海老说，他在95岁之龄还能够来到台湾举行画展，完成一桩心愿，今后他还要继续到世界各地旅行展览，“务必要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一点灵犀，远及两岸”，海老以这8个字总结他这次画展的意义。此间人士也认为文化经络活动是使祖国统一的最好途径。

“上海美专师生展”虽名为师生展，但事实上是海老的个展。海老提供的106件书画作品，由于画作尺寸相当大，因此一至三楼的国家画廊展览空间都挂满了他的作品，海老学生20余人的作品，因囿于场地，不得限于一人一幅，增加在地下室的遯彭厅展出。

在开幕典礼上，历史博物馆馆长陈癸淼，代表历史博物馆赠刘海粟一枚荣誉金章，以推崇他在美术教育及图画创造与革新的贡献，并表示对海老的敬意；董氏基金会也致赠锦有“中华之光”的双凤奖座给海老；原上海美专在台同学胡克敏、郭翠舫等30人，也致赠海老一座奖牌，感谢恩师教诲。

在画展同时，史博馆播放了刘海粟“十上黄山”作画过程的纪录片。此间新闻媒介评价说：透过展览和录影，可深入了解刘海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作面貌和历程。观者如潮，“足见其个人魅力和作画精湛，为国内艺坛一大震撼”，“本来两岸艺术交流可望更为密切，则刘大师此番画展意义，实在非比寻常！”

台北传播媒介对海老的画展作了详尽的报道与评论，还刊登了诸如油画《南京夫子庙》、《巴黎少女》和国画《忆写黄山》等多幅展览作品。陈长华在台北《联合报》上称：海老展中最早的作品《黄山孤松》千笔勾绘，犹见画家中年的盛气风采。1956年的《没骨青绿山水》，透露了海老早年临摹古画的心得。设色温雅，在点叶描枝之间，表现了笔墨功力。而1969年的《骤雨旋风声满堂》，则挥出海老晚

年一心一意从古诗解脱的山水风格；1981年的《始信峰高境界幽》，出现了狂放的笔墨走势；1982年到1988年间的黄山系列图，使人想起张大千的泼彩山水。1989年完成的《忆写黄山》及稍早一些的《山水徐将军》，是海老在台展出的最新水墨作品。记者说，95岁的海老在言谈举止中似显得力不从心，但在创作中却有返璞归真的情绪：“黄山第一峰的行云，在淡墨轻染中飘过，似在反映着人间繁华如过眼烟云。”

海老早年游学欧陆，作品入选巴黎冬季沙龙。他在展览中展出的油画也引起注目。1963年的油画《向日葵》，以及1981年的黄山系列、裸女、花卉等都被台湾艺术界认为是呈现了海老“早期所追随的后期印象派所影响的风格。以西洋画材表现中国名山黄山之美，色彩浓艳有余。”

在海老赴台画展中，传为佳话的是他与郎静山、黄君璧两位艺术大师的重逢。这三位大师年龄加起来已有285年，相识于本世纪初，如今相逢已是本世纪末，在艺坛上各领风骚，畅叙旧情故事，不胜欣慰，被当地报纸誉为“世纪之会，岁寒三友。”

著名摄影艺术大师郎静山在开幕式上，以他1928年首拍的人体模特儿作品《沉思》赠给海老。“道尽两人一甲子岁月的情谊，同时凸显刘海粟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倡导人体模特儿写生之功。”

郎静山说，他拍人体模特儿，其实是由于刘海粟的缘故。刘海粟在当时封闭环境中，大胆启用人体模特儿，他们从事摄影创作者，才有了机会拍照。每当刘海粟画室有模特儿课程，郎静山也就前往摄影。

刘海粟却因启用模特儿被称为“艺术叛徒”。但他已多年不画人体。除了1981年和1989年分别在香港、新加坡各做了1次人体写生示范之外。

海老提及香港那次画人体时说：“提起当年的不愉快，心情很不平静。”“学生们看我画得很轻

松，其实我不仅在30岁以前打过基础，在巴黎柯朗秀密工作室练习人体写生时，还用毛笔白描的方法苦干过很久。”可惜，郎静山早年的摄影作品尚在，海老30年代的200多幅素描在“文革”期间全付之一炬。海老至今不后悔少年时冲撞社会礼俗的作法，他说，因为“人体是生命之寄托之所。”他还比较中国与欧洲女子说，“从绘画观点看，中国女子的体形较差，欧洲女子的较好。”

谈起海老当年“开风气之先”的大胆举动。台湾舆论认为，海老当年所以有此壮举，是因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美育所致。刘海粟正是以蔡先生的“美术是国家的元气，超凡的境界，可以代替一切宗教和法律”美育观为鼓舞，提倡模特儿写生的。

1910年，海老与天马会的亚尘、贺天健、朱自齐等人在上海开办会员画展。刘海粟展出了一幅巨幅模特儿的创作，破天荒地在上面画了五位赤裸裸肥臀丰乳细头颈的蓬面女子，标售价5千元。当时看画的人都为之咋舌不已。因为该画第一大胆，第二看不大懂，第三标价过高。据说当时上海最名贵的吴昌硕的画，一张堂幅也不过20元，冯超然、吴待秋等名家的一张尺页，只售三四元，而海老的裸女画竟比当时中国名家的画高出1000倍！自然使得上海乃至全国艺坛为之震惊，纷纷传说中国人画西洋画画出了一个怪人。

可海老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力提倡“模特儿到教室里来！”遂招致卫道者们的攻伐。此时，北洋军阀五省联军孙传芳的势力已扩展到上海，他也认为刘海粟此举简直有伤风化，要查封刘的学校。西洋画室里有了模特儿，整个上海更为之轰动。卫道者



们提起“刘海粟”三字，便认为大逆不道。孙传芳甚至通令五省联军，要捉拿刘海粟。一些舆论更将刘海粟与当时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一道并称为上海“三大文妖”。但也有拥护和支持刘海粟的人，认为刘是东方的毕加索、马蒂斯。结果，海老虽背着“艺术叛徒”的名衔，但与卫道者们的奋斗还是成功了。他的大胆作风，奠定了中国现代西洋画的基础，从此后，全国弥漫起西洋艺术的浓厚风气。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拍摄成功了第一张裸体照片，那是借助上海市一个黄包车夫的妻子充当裸体模特儿的。至此，不论写生或摄影，都慢慢热起来，人们似乎也不过分排斥了。

海粟老人说，近年来由于环境所限，已少有以模特儿写生的机会。但他认为，人体的美，是“美中之至美”。他说，人体的美，来自其生命和自然流动。这种美态解释起来很费时，但那是最活的、生动的。那是生命的活动，姿态又多方面，还有肌肉紧张与松弛所引起的美态。

尽管海粟老人是率先主张采用模特儿写生的画家，但他说，其实，中国的人体画可说是源远流长。中国的云岗、龙门石刻、福建泉州开元寺上面的“飞天”，都是裸体的人体画。但他又认为，中国的人物画在绘画发展是虽能自成一系，可在人体画上，却不讲究，这跟中国人思想保守封建有关。他提到，江苏六合县一位农村姑娘，因在南京艺术学院当过人体模特，不容乡里而被逼致疯，海老闻讯即寄钱去让其家人给这位姑娘治病。他慨叹，究竟中国人还要再过多少时间，才可抛开这种封建思想，认清艺术的真正含义而不再责难，使人体写生得以健康发展。他说，在国外，赤身露体自古已是常有的事，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走者就是裸露上身的，所以欧洲到处都有人体雕像，造型优美，但中国人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反对人体写生。

对于人体画，海老还有一种看法：“人体的对象要以适合文艺复兴时期为标准。试看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菲尔他们所画的模特儿，全是上肥下丰，十分肥胖。16世纪的审美观，是任其自然，肌肉以自然为美，而没有

加以约束。而19世纪的美，不无有些矫揉造作。”

海老还针对人们的提问，说了他对人体画与“春宫图”的看法与见解。无论中外绘画，都有所谓的“春宫图”，可尽管“春宫图”画得再好，也都难登大雅之堂，多属私下秘密传阅。海老说，人体画与“春宫图”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他说，人体写生是对人体作画，不涉及情态之念。但“春宫图”是与情态有关的，是对性的研究，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否则用人体模特儿写生的压力就更大。他也直率地说，“春宫图”当然也有其艺术性，但这方面的画除了因封建思想而遭排斥外，还涉及到道德的观念。不过，海老又说，其实，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应该什么都不怕。当然，中国现时是禁售“春宫图”的，即使古人留下来的也一样，只能秘密收藏。

可为何一定要画人体写生呢？海老进一步阐述道：“医学少不了解剖，美术少不了写生”。画人体的意义，为的是一个“生”字。人体的曲线是能完全表白出一种顺从“生”的法则，变化得很顺畅，没有丝毫不自然的地方。

画人体，不只要从复杂的形体上去练习准确，以掌握人体肌肉结构和体态精神等一切物象，更要启发画者对“生”的无限扩张了解。

人体是生命的寄托之所。在形式上，人体曲线能表现不息的流动与生命，给人感染；在表现上，人体能使人体的灵与肉谐和，给以感情和情绪。人体充分具备了自然美、精神美的极致，是美中之至美。所以，美术上的模特儿，必须用人体。而画画的当儿，最好是任他们自由动作，让他们不断地

裸露着肉体，映出人体在自由活动中的形象。

对海老的人体艺术观，台湾舆论颇为重视，刊登了多幅海老作人体写生时的摄影照片。

因为海老将在周末下午3点半举行现场挥毫泼墨的消息早已见报，因而1月13日下午不到3时，众多美术爱好者就挤满了台北历史博物馆的演讲大厅，准备一睹大师的挥毫风采。

3点45分，海老在夫人、女公子和博物馆馆长陪同下比原订时间晚了15分钟到场，但随即挥毫作画。在半个多小时内，海老神态自若地完成了题为“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水墨作品，赠送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并在画的左侧题字：“云移怒翼博千里，气霁刚风御九秋”，呈现了95岁高龄画家毫气万千的精神面貌。

海老因在台度春节，故延迟了在台时间。2月15日，他在台北华视大楼作饯别挥毫。他为华视新剧《六个梦》和《早安今天》节目题字作画，又以一幅墨色苍松作为两个月台湾之行的饯别纪念。他以准备妥当的笔墨纸张迅速挥洒起来。毫不迟疑地勾勒出苍松的主干，然后加上松针，略作收拾细部，并题句：“虬角龙鳞气屈蟠，长风天末座生寒，分明艺海无双笔，……”上款为“纵横郁勃”，充满了自信。有人请海老说明，海老笑答，两个月说了不少，还是看画吧。

海老结束台湾之行后又赴美继续其艺术之行。他在近日给南艺师生的信中说：“大耋之年，精力已衰，但日日夜夜，孜孜不倦，意在报国，弘扬中华，为世界人类作贡献。”

高龄的刘海粟去野外写生



叶公超护国宝



考古学家张光远(元山)所著《西周重器毛公鼎》一书,曾被露了一件叶公超维护国宝毛公鼎的轶事。

毛公鼎的又名厝鼎或毛公厝鼎,为公元前827年,西周宣王姬静的叔父毛公厝所铸造。其铭文32行,连重文497字,为传世青铜器最长的铭文。其鼎内铭文记载说:

周宣王新立,有中兴之志,乃向叔父毛公厝训诰先王肇建周室之艰巨伟大,现在国势濒危,特册封毛公厝为冢宰,掌理朝廷内外的政务,勉其秉公处事,以兴周室;最后厚赐毛公,毛公厝为感谢天子皇恩,于是作鼎垂示子孙。(译文)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毛公厝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后,“士林矚目,惊为至宝。但当初持有毛公鼎者,无不深怀怀璧之惧,秘不示人,于是屢招同好之忌,迭以伪器相诬……”,“数经私人秘藏,故清末民初的金石考古学家,最多只看到毛公鼎的铭文墨拓,无人能见原器的庐山真面目……”

清朝末年,毛公鼎落到两江总督端方午桥手中。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革命党人杀死于四川资州。1916年前后,英国记者辛甫森曾以5万美元向窘迫中的端方姨太太及家人购买毛公鼎。还有一日本人在打毛公鼎的

主意。国人闻讯,纷纷阻止国宝出国,其阴谋终未得逞。毛公鼎后被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经过这次风波,“毛公鼎身价陡增,尤其学术界都以国宝重器礼遇,实获商周青铜器所未有之最大荣誉!”

1926年,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叶公超的叔父),在美国学者福开森的劝说和帮助下,买得毛公鼎。后来,叶恭绰携毛公鼎由北平迁居上海法租界芳里育路卫乐园3号。1931年,叶公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为毛公鼎精拓一纸。《西周重器毛公鼎》一书说:

铭文拓系分置于器形拓的左右两翼,全纸作横幅。异于簠斋直式者。但簠斋之四块拓或二块拓,纸上均见重复拓字,颇有混淆识读之感;公超先生的铭拓,作双靴形,迥与原器铭同,其行款条理不紊,实在难能可贵,后出毛公鼎铭拓,多取此法。

叶恭绰(遐庵)、商承祚、孙海波、唐兰、董作宾等人均在这张墨拓上题记。叶的铭记为:

此器兹逢国有可云得所然抚今思昔不能无感怀璧之罪可不慎欤遐翁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叶恭绰避乱香港。毛公鼎及其书画藏品来不及转移,而留在上海。1940年,叶妾潘氏,欲侵吞毛公鼎及叶氏在上海的

家产。叶公超闻讯,即电召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侄儿公超至香港,商谈讼事。见面后,叶恭绰对叶公超说:“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买毛公鼎,我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不久,日本宪兵队根据叶恭绰之妾的密告,搜查了芳里育路卫乐园3号的叶宅。日宪兵先是搜出一些字画,接着发现两支自卫手枪后,当场将叶公超以间谍罪拘捕。幸运的是叶公超卧榻之下的毛公鼎却没有被日本宪兵发现。

叶公超在日本宪兵总部身遭49日囹圄之苦,曾7次被审讯、两次受鞭挞、水刑。但始终未说出毛公鼎的藏处。1941年夏,叶公超由其兄具结作保获释后,一携毛公鼎秘密逃到香港。这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终未落到洋人手中。

欢迎订阅《炎黄春秋》杂志

《炎黄春秋》双月刊,逢单月11日出版,每册订价为2.80元,另收邮费0.28元。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邮局汇款地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师院附中院内)《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电话:8414411-2903。邮编:100037。联系人张君:无论银行或邮局汇款,都请函告您的详细通信地址、单位、姓名、邮编。

本刊邮发代号:36-138

魂尔鲁迅的裘沙夫妇

□张楠

1991年9月25日，面貌一新的中国美术馆在停馆重修两年后终于开馆。美术界一些久不露面的闻人名士聚在这里，庆贺开馆盛事。

有幸在新馆首批展览的除美术馆藏品展以外，有大师张仃的焦墨山水画展；漫画家米谷遗作展；天津民间绘画展及日本平山郁夫画展……，不过，美术馆东南角窄小的过厅和走廊却成了这一天的热点，各方人士和画界同仁纷纷拥向这里。这里是裘沙、王伟君夫妇以《鲁迅的世界》为总题的新作《鲁迅论·杂文一百图》，它带着文学斗士的呼号，带着当代画家的赤诚，组成一个博大深邃的鲁迅之世界。在这片并不讨人喜欢也不悦人眼目的色彩、造型的画幅中，许多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裘沙的一位老朋友，老画家，眼睛湿润地感慨而诉：“裘沙这辈子没有白奋斗！”

一位年轻的“顽主”，收起往日的骄纵，愧疚而谈：“看完这画，我心里很沉重。我好久没有沉重了，我要重读鲁迅。我想，在中国，尤其我们这一代，还需要责任……”

人大教授甘惜分深感：“鲁迅的时代并没有过去。”

老戏剧家黄宗江说：“你们依附于鲁迅身上，鲁迅也依附于你们身上。你们的画展开导我重新学习鲁迅……”

人称“热血老年”的老编辑许医农，看过裘沙夫妇的画，拍案叫绝，留言代话：“……记着！中国与世界只有一个鲁迅，也只有一个将鲁迅作品连同他的人格、精神具象化的裘沙夫妇！”

……

裘沙、王伟君夫妇的《鲁迅的世界》画展，与其说是作品展示，倒不如说是画家积19年心血用绘画艺术来传播鲁迅精神的一次行动！

我已经了解到：裘沙，1930年生



裘沙夫妇——一对饱经磨难画家

于浙江绍兴，与鲁迅同乡，也生长于一个封建大家族里，解放之初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1年到中国青年报任美术编辑，1957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78年转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

王伟君，1932年生于杭州，1949年由西湖艺术研究所参军，1951年赴朝鲜前线，1955年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曾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报社任美术编辑，1974年调北京少年宫任教。

在《鲁迅的世界》展厅前，我看到裘沙，他披长发，清瘦，一张病恹恹的脸和一副过时的深度眼镜，操一口急切想让人听懂然而又很难让人听懂的浙江话。镜架上的眉头总是蹙得很紧，在他身上你看不到艺术家的潇洒儒雅，他像副铮铮傲骨。他的气质，他的言谈，总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人物，是谁？狂人？他似乎从里到外都成为鲁迅世界里的一部分，尤其他那双浑浊的眼睛，一谈起鲁迅便会变得专注甚至固执。那神情总像在提醒我们：别忘记鲁迅，他是中华民族之魂！

王伟君是裘沙的夫人、合作者，她

是位对艺术和爱情都极为真诚的女性，是裘沙在创造奇迹中最重要的助手，可说是他的第二个我。裘沙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块颜色都渗进了她的心血，面对他们的作品，你没法说这幅是他画的，这幅是她画的，他们是溶为一体的。

是什么促使画家把毕生精力献身于传播鲁迅思想？画家脱口而出：是“文革！”

一场影响了几代人的大浩劫，把这位忠诚于党，热爱艺术的画家抛进了漩涡里，他失去了工作，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发配到“五·七”干校长期劳动……画家从“紧跟”到困惑，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命运都突然间变得混乱无序，难以捉摸……

“文革”后期，裘沙很想继续工作，美术出版社、浙江美院、工艺美院《人民戏剧》编辑部、中央美院以及北京军区等单位先后来调裘沙，可当时中青报的军管会领导以“裘沙是反动人物”、“有反攻倒算嫌疑”、“是漏网右派”、“不参加批邓”等罪名，不让裘沙恢复工作，裘沙讲，有一次农业电影制片厂来调他去画农作物动画片，他都干了，最后还被军管领导卡下来了。就这样裘沙有九次工作机会都白白失去。走投无路的裘沙在困境中，埋头精读鲁迅著作，希望能从中探询答案。一读进去，他才发现，以前并没有读懂鲁迅，经过这场浩劫的洗礼，才从阿Q身上引发了深层的反思，开始看到了国民的劣根性和中国社会难以奋发的痼弊病根。困境之中，裘沙为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就是用画笔来宣扬鲁迅，让国人通过形象来认识鲁迅。特别是让年轻的一代。他深信鲁迅的方向，依然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依然是中国人民今天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新生的指针。他誓以此生精力把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奉献给炎黄子孙们。

裘沙和王伟君开始了长达19年的鲁迅研究工作，他们不仅通读了20卷鲁迅全集，还对原著作了详尽的批注、诠释、查询、笔记，深入程度足以使鲁迅研究专家叹服。裘沙讲，我是一个艺术家，是以艺术家的赤诚之心，在探索人生、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和鲁迅相沟通的，这沟通使我成为一名鲁迅主义者。以此，来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求自己应该身体力行的生活准则。

为了编纂《鲁迅照片集》，裘沙走访了在京的鲁迅生前好友和鲁迅之子周海婴，又自费去上海、绍兴调查考证。可这些努力得到的却是“招摇撞骗”的大罪名，更造成经济拮据，以至到鲁迅博物馆去查找资料，为省五分钱车费只得中途下车。有时，伟君每月30日去换月票，裘沙得赶紧拿她的旧月票利用月初几天外出，好省几个车钱。

逆境更激发了裘沙深思和探求，激愤之中，画家有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他拿起笔把自己的爱恨全部注入画面，在3个星期内一口气画出了鲁迅《呐喊》等5本作品集的167幅草图！这速度、这数量，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1981年，鲁迅诞生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历经磨难，终于走出困惑之时，裘沙夫妇的鲁迅文学著作300余幅作品在京首次展出。获得成功之后，又应邀去福州、杭州、绍兴、乌

画展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准备了半年



鲁木齐、西安、上海等地巡回展出。当时的美协主席江丰在画展前言中说：裘沙的鲁迅插图作品是“经过反复研究，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判异前贤，他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别开生面，自具典型。”并称赞这次展览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最值得观赏的画展之一。

就在裘沙夫妇事业刚刚有点起色，一叠“乙肝”诊断书警告裘沙这些年太累了！画家没就此躺下，他依然为酝酿了多年的《鲁迅画传》作准备。这时的伟君，既是妻子，也是护士，还是助手，为了共同的事业，两人都尽全力支撑着。……终于100余幅的《画传》提纲拟出来了！上海画展的展稿也整理出来了！刚刚从医院出来的裘沙却被送进急救室，从医生和伟君的脸上，裘沙预感不妙，果然，所有化验结果都和癌症指标接近。画家突然意识到：生命就要结束了！他感叹：事业刚刚开始，许多事还没做完，甚至刚刚开始，事业、孩子特别是相依为命的伟君怎么会得下？……绝望之中，他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想好了：“这是一个用自己的一生，真正认识到鲁迅的意义，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鲁迅事业的人。”

和死神搏斗了3个月，画家终于脱离险境，大难不死的裘沙拖着病体又干开了……

1986年初，正值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日本知识界认为，日本的振兴受惠于鲁迅思想的影响。二战结束，战争中一颗原子弹几乎炸毁了日本的一切：信仰、原则、对天皇的崇拜以及日本倡导的大和精神……战后的日本思想处于茫然和混乱的状态，日本学者竹内好用鲁迅精神对日本知识界作了振聋发聩的批判，激励了当时的日本，成为日本振兴的巨大动力，时至今日，日本的老年人却多了一种忧虑：日本年轻一代在忘记了日本振兴前的苦难的同时，也忘记了鲁迅。因此，他们很想借鲁迅逝世50周年之际，寻求一种恰当的宣传方式，再次引起青年一代对鲁迅的认识。就在此时，他们在了一本中国杂志上发现了几幅裘沙夫妇的鲁迅作品插图。几张小小的插图，引发了东京造型中心社社长藤山纯一，岩波书店顾问高草茂和艺术编辑浅井和弘三位日本友人的中



这是裘沙在国内外有影响的部分出版物

国之行。他们要找到插图的作者，为他在日本举办画展并出版画册，以此来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唤起日本新一代对鲁迅的认识。

藤山先生和高草茂先生都是精通西洋美术的专家，在裘沙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屋里，400多幅画让他们激动了，他们看一幅要一幅，当场把裘沙夫妇拿给他们看的438幅画全部入选。



上图：1975年冬裘沙与儿子小鲁在上海鲁迅故居前



下图：1977年春在斗室埋头创作

第二天，日本方面又带来了消息：他们决定把原定的《鲁迅小说插图选集》改名为《裘沙画集·鲁迅之世界》。这意味着，评价和定论都是高规格的。他们认为，这些画不单是文学作品插图，而是独立的绘画作品，此外他们还提出收买这些作品国内外版权。不料裘沙却客气地答道：“不！”理由很简单：他们的作品首先是画给中国观众看的，是为鲁迅思想在国内的弘扬。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首先在国内普及。为此裘沙夫妇至今依然保持着不卖一张画的纪录。裘沙讲，我们不是不想卖，有一位法国朋友想买一幅，我真动心了，可是把那幅作品拿出来一看，我又舍不得了。一个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在国内点燃起鲁迅热，再一个是卖掉几张就破坏了整套作品的完整性。

1986年8月29日，裘沙夫妇用画表现的《鲁迅之世界》在东京开展了！盛大的开幕仪式，丰盛的宴请没有让画家激动，在仙台鲁迅纪念碑奉献花圈时，当两位画家抬花圈走向鲁迅纪念碑时，他们想到自己事业的艰

辛，想到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禁不住热泪纵横。日本之行，让画家夫妇看到：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

在鲁迅的故乡，我国的年轻一代不是更应该从鲁迅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使祖国走向繁荣？！

裘沙夫妇这次的《鲁迅的世界》画展，是画家日本之行之后4年间创作的《鲁迅杂文·论文一百图》。这批作品，没有重复自己原来的风格和一般绘画模式，而是各种画法并用，各种色彩和造型并存，用不拘一格的绘画手法与鲁迅特有的杂文语言一起交汇构成了一股震人心田的冲击力。这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画家研读鲁迅作品时体味鲁迅的独特感受，引发了他们独创的表现方式，他们跳出了一般插图的圈子，从而使鲁迅的作品得到独特的具像阐述。正像他自己说的“我所追求的并非单纯的艺术，而是活的生活，活的严峻的中国人生。”正因此，其创作风格很恰当地表现了鲁迅三四十年代对国人、国事的愤懑与压抑。裘沙夫妇是用与鲁迅相通的心，找到了表现鲁迅精神的绘画形式。

4年的艰辛劳动，画家创作的被称为“巨大艰深的文化工程”鲁迅杂文百图完成了。这一年，裘沙正满60岁。几乎在同一天他收到了副教授职称评定证书和干部退休证。拿着这两个小本本的裘沙，失掉了多少应该得到的实惠，为社会又创造了何等价值的精神财富呢？

该怎么计算画家的失与得呢？裘沙夫妇从开始研究鲁迅，画鲁迅，前后19年，以700幅之众鲁迅作品插图震动画界；一次日本《鲁迅之世界》画展轰动东京、仙台，引起日本的鲁迅热，使日本有名的岩波书店所积鲁迅著作全部脱销；一本《鲁迅之世界》大画册和一本《鲁迅·阿Q正传(206图特装本)》的出版，又被日本出版界公认为1986年度日本出版界的一大收获……由此，画家成为美国国际传记协会(ABI)《世界5000名人录》中的名人之一，成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IBC)《国际名人录》中的名人之一。然而画家的斗室里，我看到的依然只是几件旧式的家具，一张大画案占了半间，这画案有时还兼画家夫人的卧床，一套让人一坐就感到弹簧乱蹦的破沙

发，一块看上去极不舒适的窄小的木板床，大大小小的六七个书橱放满了画册、书籍。20年来夫妇俩靠着两个人200多元的工资收入，建成了这“巨大的工程”，创造出史诗般瑰丽的《鲁迅的世界》。我惊奇了：“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用清贫支持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还是有意表现艺术家独有的个性？”

“不！不！绝不是！”画家略带急切地回答，“我也希望能评上教授，享受高干的待遇，不过要拿到这些实惠，就得耗去我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我们作为一个鲁迅主义者，从日本回来就憋着股劲，总想鲁迅既然具有这么广泛的世界性，一定要完成这套作品，把它完整地奉献给我们的青年和世界！”

他正如鲁迅所说的“自己背着固袭的重担，挡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为了青年和未来，画家确是什么“重担”“闸门”也不在乎。

而这正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

上图：台湾、日本报刊对裘沙的报道

下图：画展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



(本文照片由王长贵、裘小鲁、蔡彦明、高燕提供)

西方头号“中国通”——

费正清

宁先绪

一个美国人，少年立志了解和研究中国，不远万里多次来华，毕生关心和同情中国革命，成为享誉西方的“中国问题权威”和“中国问题研究之父”。本文历述了他在中国的“蜜月”与不解情结，供读者了解和记住这位中国之友。

公元1991年9月1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医院，一颗跳动了84个春秋的心安息了。这是一颗不寻常的心，它曾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也曾吸引过许多要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西方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几届美国总统及其国务卿……

这颗心属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之父”。他就是费正清，西方人更喜欢叫他的英文名字——John King Fairbank。

病榻边，聚集了各种肤色的人，其中有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但以黄种人居多。费正清安详地仰卧在病榻上，枕边放着一束鲜花，寄托着生者的哀思与怀念之情。人们默默地望着已经故去的他，不少人禁不住凄然泪下，相拥而泣，他84个春秋的业绩历程与音容笑貌，也在人们脑海里一回映着……

少年立志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一次上课，老师将一个大大的地球仪带到了课堂，从老师那里，费正清第一次听到了在地球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叫CHINA（中国）的地方。使他惊讶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比美国还悠久，面积比

美国的更广阔，人民也非常勤劳勇敢。在他看来，与中国浩瀚漫长而且内容丰富的历史相比，美国的建国史简直是孙子辈的儿童。“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地球的另一边看看。”

1925年，18岁的费正清只身来到威斯康辛大学。成为大学生的费正清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在上历史课时，教授又一次讲到了中国，并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因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状态而不重视它。深深打动费正清心灵的是教授下课前的结束语：“波拿巴·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将威震寰宇。”这节课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要再看一眼东方的雄狮。

又一次，他在学校图书馆从翻阅的报纸中读到一个故事，大意是：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场矛头直指世界列强入侵中国的暴动，发展之迅速，影响之广泛，大大出乎八国联军的意外。作为联军统帅的德国将领，把在中国的战况写成报告呈送德国的威廉大帝。威廉大帝阅后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中国人每天食不饱肚，尚能有如此之威力，敢与装备有洋枪洋炮的洋人拼个高低，有朝一日，他们丰衣足食，将毫无疑问地统治整个世界！”

费正清被震惊和征服了，他禁不住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立志要研究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了长达60余年的不解之缘。

不久，他几乎读完了学校里所有关于中国的图书，开始感到这所学校难以满足他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愿望与要求，他提出了转学的请求。

校长很理解他的心情。当他得知



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费正清决心转学去更著名的哈佛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开了绿灯。在转学报告上批写道：“希望能看到东方问题专家的成功。”

哈佛求学

在哈佛，费正清遇到了真正领他走上研究中国之路的中国问题专家，被称为“中国通”的莫西（Mercy）先生。

莫西第一次见到费正清，就被他的勃勃雄心和执著态度所打动。他们在教授办公室里交谈了约有半个小时。费正清虔诚地请求莫西先生作他的导师，指导他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后者则愉快地答应下来。

莫西在学术研究上的要求很严格。他不仅帮助费正清制定研究提纲，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就提出新的学习要求，列出要精读和泛读的书目，并不时督促检查。费正清说：“他是我学术

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朋友。”

他毕业时，完成了一部自称为“四年心血结晶”的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著，他兴高采烈地送给莫西先生。不料想，得到的答复却是：“在跑之前必须先学会怎样走。”这一含蓄而又直截了当的批评使费正清认识到自己在知识的旅途上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刚刚扬帆启程。

愿望实现

1929年，费正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他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已小有建树，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在毕业典礼上，莫西教授鼓励他这位得意门生在中国问题研究过程中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费正清回忆道：“他（莫西）向我谈到去中国的事，说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必须到中国去亲眼看看，获取第一手资料，这有助于今后的研究。……做学问不能瞎子摸象，满足于一知半解。我当时毫不迟疑地表示一定不辜负教授的希望。”

为实现到中国的愿望，费正清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莫西先生推荐他以头等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贝立欧学院，进修了三年多中国历史。在此期间，他攻读了所能找到的每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籍和各种报刊，他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读书、思考和写作，找人探讨论证。但他牢记“走与跑”的教训，很少发表作品，他认为还不成熟，决心“练好了走才开始跑”。1932年，他以全优的成绩获得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Ph. D.），结束了在那里的学习。

费正清“到地球另一边看看”的愿望终于在1932年得以实现。在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他又获得了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罗兹奖学金，这可以使他赴中国做实地考察和研究。他立即偕新婚妻子以学者身份来到北京，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

当航机飞临北京上空时，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机上的新婚夫妇心情激动，年轻的夫人兴奋地指着长城称之为“蠕动的大蟒蛇”，费正清严肃而坚定地纠正说：“不，是龙。一条跃跃欲飞的龙。”

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落脚于清华大学。当晚，学校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席间，校长热情地向她介绍了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先生。与热情奔放爱发脾气西方学者不同，蒋教授谈吐大方得体，举止温文尔雅，是一位颇具儒家风度的学者。

“在我走上中国问题研究之路的时候，我受惠于两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费正清说，“即英国的莫西先生和中国的蒋廷黻教授。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终生受益。”

费正清与夫人在中国埋头研究了4年，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考察中国状况。作为学者，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对中国青年在西方国家留学回国后，为祖国强大而效力一事备加赞赏。他曾这样写道：

“当时的中国青年已经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重任，许多人力图走教育救国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去西方学习后又回到了中国。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张蒙林先生，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回国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编辑出版《新教育》，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几年后，他继蔡元培先生之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即使到了九十年代，费正清也仍然主张“是什么人就办什么事。”他以自己为例说：“我从事中国研究几十年，也多次去过中国，但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一定要回到美国来。这是人之常情，丝毫不足为怪。”

日臻成熟

对于1932年至1936年第一次在中国的经历，费正清一语双关地称之为度“蜜月”。他是与新婚妻子威尔玛双双踏上中国大地的；在学术研究的路途上，正是他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最终促使他确定了自己的终生研究方向，因此，将这个时期称为度“蜜月”，生动贴切又恰如其分。

1936年，费正清回到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年仅29岁，这不仅在哈佛，就是在整个美国历史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为了丰富与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费正清先生又多次来到中国，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探寻中国文化的真谛与精髓。

费正清的学识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协调员，接着成为大使的特别助理，1945年至1946年，又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实际上他一直担任着中国事务的“顾问”角色。他对中国的透彻了解及其渊博知识，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倚重于他。

1948年，他出版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本专著《美国与中国》，其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形成，记述了他对中国的印象。他的著作一炮走红，立即在美国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记者采访，报告座谈，约稿信函等纷至沓来。

已过不惑之年才初尝成功滋味的费正清，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面对欢呼与喝彩，头脑异常冷静，只使他对研究中国的热情一如既往，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更加关注。1950年，他出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1959年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自1966年开始，他一直是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

1951年，他与人合著的《1921年至1950年中国共产主义纪实史》一书，详细记叙了中共的形成与发展；在1954年，与人合著出版的《中国对西方的回答》里，他赞扬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废墟中建立起一个强大国家的业绩；1960年出版的《东亚：传统与变革》，对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的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透彻的分析；1986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更显示了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中国的全面理解；倾毕生精力研究的精华，莫过于他从七十年代末期着手编著的《剑桥中国史》，中国自1800年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书中均有评述，堪称一部包罗万象，价值非凡的中国近代史。

同情中共

对在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费正清一直持赞成态度，这在西方国家里是十分少见的。

他到中国之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深知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因而他深信由这位革命先驱发起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

位。当然，当踏上中国的大地之后，他发现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官员损公肥私，商人投机倒把，百姓民不聊生，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四十年代后期他再到中国时，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感触尤深。由厚望到失望。

而当时共产党虽然开始力量弱小，但它宗旨鲜明正确，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因而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从而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直至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取得胜利。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斗争的历程中，费正清开始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张承认中共政权，认为这是现实。在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小组顾问期间，他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呼吁改善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的一些观点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后来在中美两国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更为支持。基辛格与他既是校友，又是同事。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的独到见解，或多或少有着费正清的积极影响。1972年5月，在尼克松总统刚结束改变世界的中国之行不久，费正清又一次到了中国，为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奔波。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费正清如释重负，在回忆录中称“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作为建交功臣，费正清应邀出席了卡特总统为赴美访问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的宴会。他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与邓小平亲切交谈。

邓：请问高寿？

费：七十有二。

邓：噢，比我小两岁。我七十四岁。

费：可我的头发都掉光了。

邓：这说明你学问高，思考问题多。

言罢，两人相视而笑。

邓小平邀请他在方便时多到中国看看。

由于对中共的同情、亲近和赞扬，使国民党当局对费正清十分恼火，他的名字上过台湾的黑名册。

对于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费正清也十分赞成。他

多次在中国问题座谈会上强调，改革与开放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向工业现代国家转变，因此，中国才能与今日世界同步发展。

费正清十分钦佩邓小平。“邓先生以超人的胆量和毅力使中国摆脱了贫困，走了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他说，“邓所实行的政策使中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他也赢得世界的尊敬。他先后两次被《时代》周刊选为世界风云人物就足以证明。”

费正清一生中在学术与教育上建树颇多，其中国问题研究可称独树一帜，晚年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成就与影响更大。他除了个人论著颇丰，还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设了学术基金，为中美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又以哈佛为中心，建立一个强大的研究网络，掌握着整个西方汉学界的研究走向。作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他独领风骚半个多世纪，可谓西方汉学界的一代开拓大师。为了表彰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自1977年起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费正清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掌握中国文字，他说原因是“汉字太繁杂”。

对于死，费正清在晚年曾多次提到在中国十分流行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似乎他对自己的离去早有准备与预测。“七十三，八十四”之说源于中国两个古代圣人孔夫子与孟夫子的过世年龄，而费正清也以八十四之高龄撒手人间，莫非他真是灵犀相通，欲去阴间与圣人们探讨问题？果真如此，可真是他与中国的缘分了。

（责任编辑：卢弘）

（上接95页）

1950年，陈强与李玉洁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相识相爱而结合。他的爱妻比他小13岁，美丽、善良，处处体贴照顾陈强，真是他的贤内助。俩人和和美美，从来没吵过架。奇怪的是他得什么病她也得什么病，他右腿疼，她左腿疼；他出差外地咳嗽，她在家也咳嗽，真是心心相通，脉脉相连！

他们的大儿子1951年出生时，陈强正随代表团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访问演出。玉洁就给儿子取名布达。第二个儿子也就随之命名佩斯。女儿丽达，也是因流经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多瑙河中间有一玛格丽达皇后岛而得名。如今布达夫妇为他们生了一个孙女；佩斯夫妇为他们生了一个孙子。丽达新婚燕尔，新郎也是北影演员。

他们家只有布达在铁路上工作，未涉足影视圈内。玉洁在新影搞录音音响；丽达在北影搞剪辑，陈强和佩斯合作的《父子老爷车》等喜剧系列就是由丽达剪辑的。佩斯就不用说了。电影电视加小品，已是家喻户晓的喜剧新星。谈到这里，陈强颇为风趣又不无得意地说：“从前人家一介绍，都指着佩斯说：‘这是陈强的儿子’；现在人家一介绍，都指着我说：‘这是陈佩斯的爸爸’了。”这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说到佩斯的自学精神，那是令人佩服的。陈强的藏书颇丰，大多是古今中外名著，佩斯自幼到长大，博览群书。他在内蒙古军垦时，是个核心人物，大家劳动一天，晚上都到他屋里听他讲故事。他把读到看到的书中情节，融会贯通，编成故事讲，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这对他以后的艺术实践得益匪浅。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又想到陈佩斯的儿子。记得那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演出一个小品，佩斯说他很担心怕生个女儿，朱时茂马上批评他这是“重男轻女”。他“委屈”万分，解释说：“我是怕生个女儿长得像我，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啊！”可巧，陈佩斯后来真如愿得了个儿子。我们期待着陈强～陈佩斯～陈大愚祖孙三代系列喜剧早日同观众见面。以其新作杰作，让人们笑得更开心，生活得更愉快，心灵更加充实美好！

中国「百灵」飞进白宫



1987年1月16日，韩文君出席布什家宴时与布什总统亲切交谈

——中国外交官夫人

韩文君在美国

她，原是歌唱演员，后随丈夫去了驻美国大使馆。她不甘于只做个交际应酬的外交官夫人，竟以自己的歌声吸引了许多美国朋友，促进了中美友谊。

每个人事业的生命之树，都有其独有的一段叶茂花盛之时。韩文君的这段事业生命的浓荫期，是在美国度过的。她将她人生中最成熟的那段限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

——1985年7月，韩文君作为外交官卞庆祖的夫人离开北京来到美国。

到美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处在安闲的失落之中。作为女高音歌手，她惘然了，她不知道自己到美国能干些什么，一种“废弃”的感觉时时在困扰着她。

尽管有各种困扰。在美国仍是一个良好的港湾，是靠岸还是继续扬帆？很多和她一样的随行夫人大都在这个港湾靠岸了。她们

由于语言不通，无所事事地打发着日子。韩文君觉得自己不能在美国仅仅做一名外交官随行夫人，不能仅仅去观光游览……她需要有价值的存在。

美国人能有今天，正取决于这个民族富有进取精神，韩文君所具有的这种精神强度，丝毫不亚于美国人，她决心张开自己的风帆。到美国的第二个月，就进入了哥登成人语言教育中心。

一天课间休息，她来到休息大厅，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了《茉莉花》和西班牙民歌《鸽子》。这是她第一次在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组成的学校唱歌。当优美的旋律伴着她甜润的嗓音飞向大厅的各个角落时，老师和

学生们没有想到他们中间有一个歌唱家。当她歌落琴止时,很多学生手按胸口,为韩文君的歌声叫好。

从此,她成了美国华盛顿成人语言教育中心的著名人物,教育中心每次学校集会,都要高薪聘请职业歌手到校演唱,自学校有了韩文君的歌声,他们这些活动由韩文君承担了。韩文君为学校集会的正式演唱达20余次,没收一分美金。

鉴于韩文君和其它中国学生在教育中心的影响,学校决定,每年中国春节为教育中心的“中国日”。

“中国日”这天,中国学生可以停课,可以在学校举行庆典活动。演唱会,当然少不了由韩文君专门演唱富有中国文化的中国民歌。

1986年12月23日,当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应韩叙大使的邀请,到中国大使馆度过圣诞节。同他一道来的有他的夫人芭芭拉一行十余人。宁静幽雅的华盛顿使馆区里,穿行着各使馆邀请的美国客人,和以不同形式迎来送往的各使馆人员,毫无疑问,在各国驻美使馆邀请的美国客人中,副总统布什能到中国使馆过圣诞节,这在外交上是不同寻常的。中国使馆大使官邸曾是一位美国画家住过的房子,为了使布什能在大使官邸愉快地过一个圣诞节,他们把餐厅、客室都做了布置,包括每一件餐具、酒杯,大使的夫人、书法家葛绮云都亲自过问、擦洗,并安排韩文君在餐后为布什一行演唱。布什一行是6点30分左右到中国使馆的。

美国的宴请活动和中国不同,不是客人一来,就上桌吃饭,有什么话、什么事端起酒杯再提,喝酒、吃饭多半是为了办事。美国的宴请多半是为了友谊,尤其在外交上更是如此。布什总统到大使官邸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就站着和韩叙大使聊了很长时间才入席。宴席上的主要话题是叙旧。布什谈了很多他在中国当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对中国的印象,对北京的印象。他提到了他在北京时曾经为了学习汉语请的汉语教师如何地对他热情、诚恳。后来,为了感谢这位汉语老师,布什把她的儿子从中国接到美国,送到了美国西部大学念书,并且经常在节日期间,把他汉语老师的儿子接回华盛顿,让自己的秘书陪同着,到各地游览观光。

“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布什。

那个圣诞节,布什总统及芭芭拉夫人一行过得十分愉快。活动的高潮之一是韩文君为布什演唱。美国许多公众场地的大厅里都摆有钢琴、挂有名画。中国使馆大厅里挂的是以“湘西人”自誉的土家族画家黄永玉先生的画。这画很受美国人赏识。但却没有钢琴。这在其它使馆是不多见的,在美国公众场地的大厅是绝无仅有。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不爱音乐,不懂音乐,只是因为使馆没有买钢琴。所幸的是韩文君的丈夫卞庆祖是个很好的手风琴手,他曾经是北京市业余合唱团男高音声部长。在那天晚上,夫妇配合默契,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当他俩合唱《敖包相会》时,布什总统满脸兴奋,扭身问身边的使馆人员,是不是专门请来的中国歌唱家。使馆工作人员告诉布什,韩女士是卞先生的夫人,歌唱家倒是,但不是专门请来的,是来使馆工作的。布什听完很高兴,等她唱完,带头鼓掌,走时长时间握着韩文君和她丈夫的手说,歌唱得很好,他圣诞节过得很愉快,愉快极了!这时候,韩叙大使说,希望下一个圣诞节总统偕夫人一行还能到中国使馆过。布什总统当即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以后连续三年的圣诞节,布什总统都是应韩叙大使的邀请,到中国大使馆过的圣诞节。

1987年元月5日,也就是布什总统到中国使馆过完圣诞节的半月之后,韩叙大使接到布什总统的邀请,邀请韩大使夫妇和参赞杨洁篪夫妇到总统官邸作客。在邀请中,布什特意讲到:“别忘了请那对会唱歌的夫妇也到我家来,我和我的家里人都喜欢听他们唱歌。”

元月6日,参赞杨洁篪夫妇和韩文君及她的丈夫卞先生来到了布什家。

“你们参观参观我的住室吧。”

一到布什总统家,布什总统就像一个乔迁新居的中国人,首先邀请他们参观了他的住室。布什那个时候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他的官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豪华、那么富丽堂皇。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点:

一是布什的卧室中有一个中国古董专柜,并且主要是他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搜集的。二是布

什总统卧室地毯的一角上,规规矩正用英文绣着他孙女的名字。布什告诉客人,这是他孙女出生不久,他亲自动手绣上去的,因为他特别爱这个小孙女。

这两点使大家感受到了布什总统对中国的感情和他作为普通人的情感。

那天,布什总统邀请的客人,除了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和夫人外,还有其它美国高级官员和美国空军军乐团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韩文君为布什及其它客人演唱了《北风吹》、《大海的故乡》两首歌曲,美国空军的歌唱家唱了两首美国歌曲,使布什总统的家宴活动增添了愉快和欢乐。布什和夫人芭芭拉·布什及儿子马文·布什等一再为她的歌声鼓掌。

韩文君第3次为布什演唱,是1988年12月22日的夜晚,那时候,布什作为副总统,配合里根工作了8年,里根从法定的年限中退出国家元首这一重要政治舞台,共和党在竞选中再次成功,布什在竞选中获胜的结果已经出来。正是在布什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前夕,布什又一次,也是第4次应韩叙大使之邀,到大使官邸同中国朋友欢聚一堂,共庆圣诞节,这在美国的外交史上是破格的一例。

同布什总统一道来中国大使馆的除了他的夫人芭芭拉·布什和他心爱的儿子马文·布什外,还有布什的堂妹玛丽·布什、《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布罗德和布什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一行16人。因为此行是在布什即将就任总统之时,来宾们的脸上都漾着少见的、特有的轻松愉快。布什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紧张竞选带着获胜后的喜悦心情进入圣诞的节日气氛的,那天他一到中国使馆就显得更是神采

陈香梅女士出席音乐会时合影



To Bian Qing Zhu and Han Wenjun
with Best wishes for Bush

给卜庆祖和韩文君最美好的祝愿。

布什

奕奕。为了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为了表示对布什的敬意，大使馆的厨师拿出了他超常的手艺，做了极其丰盛、精美如工艺品般的宴席。布什总统对中国菜很有兴趣，他边吃边讲，整个宴会，笑声不断。为了把宴会推向高潮，大使馆安排余兴节目，由韩文君女士唱3支歌。

第一支歌是美国圣诞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歌曲《圣诞之夜》。这首歌旋律优美动人，隐含着淡淡忏悔的哀伤，在美国的城市乡村，家喻户晓，人人都能唱，都爱唱，尤其在圣诞节前后，整个美国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首歌。

韩文君用她流利的英文唱了这首歌。美国客人和使馆人员坐在客厅周围，布什和他的夫人同在一张沙发上。当卜先生拉起手风琴，文君在客厅中央用英文演唱第一句歌词时，大厅里突然奇特的雅静，布什和夫人及其它人员，一下子被韩文君婉丽、清澈的歌声带进了如同天使正在降落一样神圣的氛围里，尤其是总统的夫人芭芭拉·布什在那歌声中，仿佛进入了一种完全忘我的境界，她满脸肃然的虔诚和庄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演唱的韩文君，当韩文君唱到“我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时，芭芭拉·布什竟被文君的歌声和这歌声中充满宗教色彩的情

调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韩文君唱的第二支歌曲，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铃儿响叮当》，这首歌轻松欢快，当她第一句出口，在场的美国客人用英文，使馆人员用中文都一道地唱起来“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一直伴她唱到最后一句，而使余兴节目进入热烈高潮的，则是韩文君唱的第三首歌，在美国历久不衰的著名民歌《你是我的阳光》。

能诗善词的参赞江承宗先生，专门根据《你是我的阳光》的曲调和原词字数重新写了歌词，并将中文歌词译为英文打印出来，给布什总统及夫人等每人发了一份。

它通过韩文君的歌喉唱出来以后，确实委婉动人，如一溪甘泉，从秀丽的山涧汨汨地流来，使在座的美国宾客和使馆人员全都手拿歌词，情不自禁地合唱起来。总统的夫人芭芭拉·布什、儿子马文·布什和表妹玛丽·布什等，个个兴奋不已，唱得激情而又响亮，使热烈的欢快如同看不见的白雾，浓烈地笼罩了整个使馆的大厅。

那天晚上，宴会和欢聚从6点45分一直到10时左右，布什总统一行十余人都感到3个多小时如转瞬即逝般迅速。尤其布什总统仿佛经过长时间竞选的奔波，终于到中国大使官邸在韩文君美妙的歌声中得到了一片温馨的小憩。歌声中，他微闭着眼睛，面带惬意的微笑，显得安详而又自得。

在告别时候，布什总统紧紧又久久地握住韩文君的手说：

“你唱得真好，真美，非常非常感谢你！”

玛丽·布什亲切地上前一步也拉住韩文君的手说：“要不是我亲耳听到，我真难以相信你会把我们美国最优美的圣诞歌曲唱得这么好，这么动人。”

1988年12月22日的夜晚，在中美外交史上，是一个值得存有记忆的夜晚。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以“腊月欢聚韩家村”为题发了这个夜晚的特写。美国和海外的报纸也对此作了报道，都对韩文君在这个夜晚的歌唱

特意作了描述。正是在韩文君和使馆全体人员所创造的欢快的外交气氛中，布什回忆起了他在1977年9月游览我国长江时，那滚滚向前的长江水和巍峨的两岸壮丽的景色，激起了他更大的政治热情，他在卸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作出了竞选美国总统的重大决定。

就是这个夜晚，韩叙大使向布什谈到，希望布什当政期间中美关系能继续在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健康、平稳地发展。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布什指着 he 手腕上的“海鸥”牌手表说，这是一位中国友人送给我的，“虽是机械表，用了几年仍很准，因为防水，我钓鱼时也戴着，不怕溅水！”还说他连个正式外交身份也没有的时候，他处处都感受到了中国的温暖和友情。因此他愿尊重美中两国的3个联合公报，保持美中两国间的“强有力的关系”。

在美国，外交上的了解和宣传尤为重要。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就拿文化来讲，十几年来，中国翻译了那么多英国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熟悉得就如熟悉中国的少数民族，可美国对我国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的译介却少得可怜。

一次，韩文君和美国女作曲家协会主席汤米·卡尔谈话，她说美国民歌《铃儿响叮当》，在中国很多人都会唱，和中国著名民歌一样，路人皆知了。然后，我问她中国哪些民歌在美国流传较广，她想了半晌，很抱歉地向我摇了摇头。

这种抱歉的摇头，使韩文君感到了一种羞愧。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历久不衰的中国民歌成千上万，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夫人，作为一个歌唱演员，唯一的选择就是：为了中国文化，唱唱唱！她愿意把中国民歌唱遍美国的城市乡村。

在美国4年时间，除了完成她在使馆内负责的本职工作，在不同场合她参加各种演唱活动。在华盛顿唱，到匹兹堡唱，到里士满市唱……给布什





上,1988年12月23日,韩文君为布什演唱(右起,芭芭拉·布什、布什、大使夫人葛梅云)

中,与大使、公使夫妇出席著名实业家科恩家宴(右为科恩)
下,韩文君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



上,1988年12月22日晚,新当选总统布什出席韩馆大使家宴,布什向韩女士介绍白宫人事局长昂特迈耶

中,晚宴结束,芭芭拉·布什激动地和韩女士拥抱告别
下,韩文君在音乐教授爱德华家宴上自弹自唱。

总统唱、给美国官员唱、给美国普通百姓唱……唱北方民歌、唱南方民歌、……《康定情歌》、《敖包相会》、《玛依拉》……四川民歌、哈萨克民歌、内蒙民歌、西藏民歌……演出了二百多场。

美国《华府新闻报》1989年5月4日,《国际日报》5月23日报道:

4月30日下午在华府萨姆纳档案博物馆音乐厅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民歌独唱音乐会”。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各族的优秀民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组成部分。训练有素的韩文君女士以其甜润优美的音色、端庄自信的台风演唱了18首风格各异的中国民歌,并应观众要求加唱了一首美国歌曲,以纯熟的技巧唱完升C2高音的一个长句后,全场观众都报以极热烈的掌声。

30日的音乐会座无虚席,音乐大厅里超容量地多容纳了许多听众,其中有布什总统的堂妹玛丽·布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丽娟、美中友协华府分会主席麦克高伊、美国

女作曲家协会主席汤米卡尔、马利兰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厄本以及陈香梅女士等知名人士。

美国政治学教授罗廷杰女士来信说:

“文君女士:上帝恩赐给了您一副金嗓子,当你演唱时我热血沸腾,您的嗓音美极了,您唱出了中国的文化;同时,您又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两者的结合,您就像一朵放在美国的可爱的中国之花。”

伦敦武装游行 中的中国军队

高光祚

正对面,但一直空着,苏联认为,在击败德、日两大轴心国中,它应居首功,不甘心在游行时居于美国之后,故未派代表参加。

美、法两国代表与我们交往甚多,相互串门、打桥牌、聊天,共享胜利者的喜悦。

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人代表,尤其是同遭日本侵害的亚洲国家,如印度、缅甸和菲律宾等,也纷纷来中国营帐访问,并互致祝贺。他们对中国普遍具有深厚的友谊,对中国的古文化赞赏敬佩不已。正式游行前约一个星期,各国代表队开始进驻营地,英国各大报纸作了醒目的报导。

侨居英伦三岛各地的华侨,当他们闻讯祖国也派了自己的儿子,尤其是以战胜国代表身份出现,而且是海军,前来参加这次盛大的游行时,他们都兴高采烈,兴奋异常,尤其是一些侨居海外数十年的老华侨,更是喜出望外,除伦敦当地外,不少来自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贝尔法斯特与都柏林等地,专程赶来营帐看望我们,交谈中,他们的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旦亲眼看到这些刚刚来自弭兵伊始、以战胜国姿态出现的祖国亲人时,怎能抑止住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的喜悦与自豪感。有些人到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才依依难舍地离去,海外侨胞普遍的爱国热忱,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记得,有位来自爱丁堡大学教经济学的迈教授(浙江绍兴人),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从爱丁堡赶来,紧握着我的双手,老泪纵横地说:“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在海外能够看到来自祖国的海军,我们真太高兴了!今天,是我离开放国30年来难忘的日子啊!”

不论是邂逅在马路上,还是在餐馆里,或是在娱乐场所,只要遇到华侨,他们都会主动上来找我们攀谈。

如在中国饭馆吃饭(一开始,吃西餐不习惯,老觉得似乎没吃饱,一个月,总要跑中国饭馆一两次),店老板会主动来唠嗑,帮着点菜,为我们举杯,为祖国胜利举杯,吃完喝完,有时碰到热情的老板,不仅拒收收费,有时,还让儿女驾车,送我们回营地。

我们的出现,也震动了三岛上的各界人士,有些到过中国的英国朋友(多数是传教士),遇到我们时,都各感亲切,她(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邀请我们去作客,甚至度长假(Long



作者在旅途中

1946年6月8日,英国为了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战胜德、意、日三个轴心国的伟大胜利,特邀请各同盟国的军事领导人与武装部队的代表,齐聚伦敦,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胜利大游行。

应邀参加大游行的国家,除中、美、英、苏、法五大同盟国外,还有波兰(在英的流亡政府为代表)、荷兰、南斯拉夫、印度、缅甸、伊朗、巴西、澳大利亚等46个中小国家,约占当时独立国家的2分之一强。

按照东道国的规定,五大盟国各遣72名武装代表(海、陆、空三军种各24人),其他国家各24人(海、陆、空三军种各8人)。

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国派遣了72名武装代表参加,并有海、陆、空军三名掌旗官,督训官为赵忠麟海军少校。

全部训练与游行组织事宜,由当时的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中将主其事。

中国的72名代表,是由正在英国皇家海军枪炮专科学校留学、准备在学成后接舰(“重庆”号巡洋舰与“灵甫”号护航驱逐舰,以及8艘快艇)归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军事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来自战时陪都重庆的大中专院校,并志愿参加抗日与献身海军事业的爱国青年。训练基地设在英国第三大军港——卡塘的皇家海军枪炮学校内。每天持枪操练8个小时,历时一个月。

各参加国的营帐,集中设在世界上最大公园之一的海德公园内。

各国的营帐分为“A”线与“B”线,除东道国外,四大盟国安排在“A”线,其他中小国家为“B”线。

中、法两国为比邻,美国在我们的斜对面,苏联本该在我们的

Leave、英海军规定,官兵一律每三个月都有两个星期的长假,交通费报销)。

我们的到来,也部分地改变了一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陈腐观点(拖个辫子、抽大烟)。记得,当我们抵达皇家海军枪炮学校不久,多次到过中国的海军中校的副校长说:“我所见到的中国人都很孱弱瘦小,怎么你们都这么高大精神?”

英国人素以绅士自居,绅士派头十足,平素不太爱讲话,不认识的人,极少主动地向人打招呼(与美国人迥然不同),但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素昧平生的绅士,主动向我们打招呼,或举手致意,作一个“V”字手势,喊一声“China!”,尤其是英国老太太特别善良(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

有些衣冠楚楚的绅士(通常戴个礼帽、手持文明棍或雨伞——伦敦多雾,天气多变,出门多带雨衣或雨伞),遇到我们时,很庄重、礼貌地先问一声:“对不起!我可以随便问一句吗?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得知我们是中国人时,他们都高兴地紧握我们的手,祝贺两国的胜利!

游行前夕,英王乔治六世,在其母后玛格丽特王太后和伊丽莎白王后,以及二位公主依丽莎白(即现在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玛格丽特的陪同下,乘坐两辆维多利亚时代的敞篷车,来到各国营帐巡视,经过我们营帐时,我们列队向他(她)们敬礼,他(她)们频频向我们挥手致意(英王站立答礼,其他人正襟危坐)。

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二次大战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丘吉尔老先生,时已年逾古稀(72岁),但精神矍铄,在英王巡视的第二天,专程来看望各国代表,给中国代表队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代表们在营帐前,列队欢迎他,向他致敬,并接受他的检阅,他缓步地在每个代表面前经过,不时停步与代表们作简单询问与攀谈,对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侵略者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气概,他备加赞扬。记得,在临别前,他对大家说:“我衷心地赞赏大战期间,伟大的中国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丘吉尔先生连用了两个“伟大”称颂中国人民。他离开我们时,“V”字手势一直高举着。

6月8日,晴空万里,大游行按计划如期举行。

检阅台设在市中心的“林荫道”,两旁搭有观礼台,均离游行队伍约10米(与天安门相比,其气魄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站在检阅台上的有:身着海军特级上将服的英王乔治六世(英国是海军国家,每逢重大节日,英王均着海军服)、王太后、王后、两位公主及其他皇室成员,站在观礼台上的有:工党领袖、首相艾德礼先生,内阁全体阁员、国会两院议长以及丘吉尔老先生,和战时名将蒙哥马利元帅以及蒙巴顿海军上将(英王堂弟)。

当时,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与法国流亡政府“自由法国”首脑戴高乐将军,以及中国的桂永清将军全都站在观礼台上。

8时整,一声令下,队伍浩浩荡荡地由海德公园东端出发,美国打头阵,中国居次,法国第三,其它中小各国按英文字母顺序跟随于后,东道国英国殿后。

长长的队列,沿着伦敦主要街道行进,经过英王的白金汉宫、议会大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特拉法加广场,这里高高地矗立着英国人民百多年来最尊敬的纳尔逊海军统帅(1805年率军击败拿破仑的海上入侵,拯救了英国),以及繁华闹区皮卡迪利转盘,最后,经过著名的大理石拱门,由海德公园的西端回到营地。

中国代表队,在领队及掌旗官的引导下,8人一个排面,共9个排面,组成一个小方阵,身着海军呢军服,帽上有金绣“中国海军”字样。大家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荣誉感,以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重托,飒爽英姿、大无畏地荷枪前进,精神确实很饱满,步伐也极整齐。

不难想象,沿途受到英国人民长时间热烈的鼓掌欢迎与挥手致意,两旁不时传来阵阵“中国万岁”的欢呼声,马路两旁楼上的姑娘们,边喊“China”边向我们抛撒五彩缤纷的纸屑,沿途男女都高举“V”字手势。

大游行历时4个小时,中午回到海德公园营地休息。(下接89页)

古长征回眸记

陈靖

长征路上,所经之处的少数民族,都对我们艰苦卓绝的长征深表赞赏,总是把红军长征同自己祖先数千年前的古长征联系起来,感慨万千。我特地步毛泽东同志的《长征》涂了这首《古长征》。

千古远征未言难,^①
蚩尤子孙非等闲。^②
黄淮江汉血涌浪,
夏商周秦汗凝丸。^③
冀鲁南下鄱阳暖,
洞庭西上武陵寒。^④
扫尽同根相煎雪,
炎黄蚩裔共新颜。^⑤

①远古时期与黄帝、炎帝齐名的还有蚩尤,被称之为“三大部落”。涿鹿之战,蚩尤战死,他的子孙们被迫从黄河中下游迁徙到淮河中下游,及到鄱阳和洞庭两湖区域。《史记》云:“三苗氏,古洞庭,石彭蠡”。

②出于偏见,传说中把蚩尤说成是白痴,是鬼怪,其实蚩尤并不愚昧,他发明了铜器,他的子孙制造了陶器,栽种了谷物等等。

③古时部族争战的“血流漂杵”。使有的部族消灭了,有的部族融合了,也有的部族被逼入边远洪荒,他们在那里斗争生息,创造自己的生活。

④在诸多少数民族中,苗族具有勇于生存、敢于反抗的代表性。世界史学家格迪斯有过这样的评论:“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清代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苗族人民和各族人民共同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斗争。

⑤谈到中华民族,人们习惯称之为“炎黄子孙”,依我之见,以炎黄蚩代表中华民族,或许更为全面一些。

林彪三怕之谜

权延赤

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就曾任过北京新6所1号楼。他先带了叶群、林立果、林立衡来看房子，在李维信陪同下，楼上楼下看了一圈，感觉还可以，没坐就走了。不久便搬来住下，用李维信的话讲，“当时他地位不算太高，又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没太在意。他住进来以后，我们只派一名服务员去照顾他。所里干部基本没怎么去看过。他不像朱老总，大家愿意去他那里坐坐，聊聊天。有什么事就马上办一下。林彪不爱交往，和其他任何首长都不怎么交往，他怕冷、怕光、怕味、怕吵、怕风，整天自己闷在屋子里。他生活很简单，吃喝穿用都没什么琐事，偶尔有事就由服务员向我们汇报，我们派人办了就是，无须多去问候。所以‘文化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说我们刁难副统帅。其实不是我们刁难，是他自己不怎么麻烦人，也不喜欢别人去打搅他。他不跳舞、不打牌，中南海来放电影他也极少去看，至多不过听个京剧唱片。当时我们都知道他身体不好，不爱出头露面，也极少参加宴会，热闹场合基本找不到他，我搞服务工作几十年，党和国家的主要会议、庆典的招待工作几乎全参加了，做宴会服务无计其数，林彪参加的宴会我只记得一次，就是赫鲁晓夫1958年匆匆应毛泽东之召来北京那次。那一次

他也是不吃不喝不讲话，吃点菜还是总理帮他夹的。实在说，那时服务人员都以为他是艰苦朴素的模范……”

在记忆中，林彪只麻烦过李维信一次，就是暖气片前面有铁纱罩，大概是纱罩上的漆被暖气烤的有气味，林彪受不了，像军人下令一样，小声但不容怀疑地对李维信讲：“把铁纱罩都拆掉，味太大。”

从五十年代始，林彪每年差不多都有半年是住在广州。广州无论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大多是在“四野”时的老部下，都是大军南下时，在广州安家落户了。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他来北京，可以不看别人，对林彪是一定要去看望的。如果林彪到了广州，陶铸也是马上去看望，那是一种战友之情。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曾是“四野”8纵司令员，并且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在林彪麾下作战，感情自然也是极深。如果说林彪在新6所还显得“地位不算太高”，服务人员“没太在意”，那么在广州就不同了。那一大批南下干部听到林总两字，往往比听到其他任何官衔还要肃然。

现任深圳兴华宾馆总经理的陈良顺，曾在广州军区搞过30年的服务工作，他向笔者回忆了当年接待林彪的情况：

“良顺！”老局长吆喝。

“到！”我疾跑过去。

“这两天有事，”老局长的手指头直冲我的鼻子伸过来，“你除了上班哪儿也不要去了。”

这种含糊而严厉的要求，往往含有机密。

一天不见动静，两天不闻消息，三天过去，我就有些松弛，中午被一个战友拉去喝酒。就那么巧，回来刚沏上一杯茶，三天不吭的老局长，一鸣惊人地出现了。

“良顺！良顺！快，去机场接人，马上……”他的目光刚触到我的脸，嘴巴忽然闭住，鼻子像老鼠一样抽动着啾啾有声，立刻变脸变色地吼起来，“啊，你喝酒了？混帐，谁叫你喝酒了？”

“来了个战友……”我生出不安。

“来了个屁！”老局长急火攻心，有点语无伦次，“来的是林总！你知道吗？”

“林总……”我的脸立刻煞白。

“我怎么嘱咐你的，啊？”

“三天没动静……”

“三年没动静你也不许动！你是干什么的？啊，林总来了，你和队长都要受处分！”老局长气急败坏地训斥我几句，将手一挥，像挥苍蝇一样把我赶出视线，另换了别人去接林彪。

我不无懊丧。我一参军就在“四野”。那时，“四野”的兵都有一种荣誉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出门胸脯都比别人挺得高。不管林彪后来怎么变化，毕竟还是后来。当时可不同，无论“四野”出来的什么样的骄兵骁将，一提“林总”便不由得想立正。这种近于迷信的崇敬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谢天谢地，老局长是刀子嘴豆腐心，晚上再见面已是笑咪咪一张脸，仿佛风暴过去，波涛受了阳光的照拂，闪闪发光。

“良顺，脑袋怎么耷拉了？”他在我脖颈上拍一下，“吸取教训就好，明天还是你去，任警卫兼司机……”

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就去见林彪。我走进司令部院里的老一号。这是林彪在广州的“家”。

我是怀着紧张、神秘、崇敬之感第一次见到林彪。在东北战场，他指挥了70多万像我这样的兵，同60万国民党兵决战，可是，我们的统帅竟是这样？！不高大，不魁梧，清清爽爽，一脸病容，他在屋子里踱步，头微微向前低倾，对于我的到来毫无感觉和反应，即便叶群向他介绍，也只嗯一声，脚步停顿不足两秒，便继续踱他的步，想他的心事。

我拘谨地侍立一旁，不知所措，威武、豪迈、热烈或是慈祥、和蔼、风趣……所有这些人喜欢用来形容首长的词语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当我谨慎地退出房间时，只剩了怅然若失



和深不可测的感觉。

时间稍久，我终于悄悄观察、悄悄获得了一些直接印象。

他清瘦，但是秀气，年轻时若参加连队的文娱晚会，一定适合扮演姑娘。现在不行了，他已经秃顶。

秃顶大概是因为他脑子使用过度。他几乎没有不想事情的时候，这种无止无休的想事情，简直达到无人无我的境界，以至于有时他走出屋门，你须赶紧上前“引导”，否则真能撞在树上。

“林总，”我挡在树前，“走砖路吧。”

“唔。”他下意识地应一声，很服摆弄地沿着铺砖路继续踱步，继续想事。

他不交往，不串门。别的老帅喜欢凑在一起热闹，他不凑。静静的院子静静的房间，他独个儿踱步，嘴里还不时念念有词；念到一定时候，写在纸上；继续念一会儿，又把写好的纸揉成一团扔掉，重新拿张纸再写。就这么想想念念、写写揉揉，日夜不息。

那时我以为他工作勤奋，废寝忘食。其实，他不是忘食，而是不想食。可能是粗茶淡饭惯了，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大沾荤腥。他的餐桌上除了米饭青菜，营养高点的也就是黄豆或豆腐。偶尔给他弄个鱼头汤之类的，他也能像完成任务似地喝两口。不能再复杂，再复杂就要挨批：“你们又在搞浪费！”

他也不是废寝，实在是睡不着。我们都知道他有病，身体不好，但多数人说不清是什么病，只笼统说“林总受过重伤，留下了后遗症……”深一步没人说，也说不清。

站在今天看昨天，估计他是神经功能紊乱。他怕风、怕吵、怕水，有时也怕光。这四怕现在有不少人都说过了，只是说得绝对了些。

比如怕光，那是分时间地点。有时林彪也喜欢晒太阳。若是绝对见不了光，他在天安门上也不敢站那么久。

比如怕水，这话不真也不假。他喝水不少，可见不是绝对怕水。但他听不得水声，听见流水声肠子就跟着叫，接着就拉稀。流水声会诱使他肠子里的东西一道流，所以他不住小岛。后来专为他在山坡上，在“老虎口”盖了一栋房，让他离水而居，便不再拉

稀。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开玩笑说：“我早看出林彪是反主席的。主席到哪儿都离不开水；有海住海边，有江住江边，有池塘住池塘边。没海没江没有塘，那就住游泳池。林彪整个唱反调，给他安排个好去处，他不睡觉，指着西边说有水。工作人员往西跑出一百米，果然发现一个池塘，只好连夜搬家。就这个怕水的样子还能跟毛主席一致了？”

笑话归笑话，林彪对待自己的病是有些唯心主义。不过，也确实留有战争的痕迹。曾使我目瞪口呆，也曾使我激动感慨。

最初，我不明白他家里为什么装有一辆摩托车，老式的，绿漆斑驳，大概是有特殊意义的战利品吧？排气筒伸出屋子外……

那天，我被急呼进屋。林彪病了！他脸色白得吓人，苦不堪言的样子，大概是把脑子用坏了，两手捏着额头，钻牛角尖一般。虚弱地喘息着，爬上了摩托车。

我按照叶群的吩咐，匆匆骑上摩托发动。

“开猛些……”林彪小声命令，“再开快些，再快……”

我把油门加到最大，摩托车像烈马一样猛烈颠簸。于是，奇迹发生了，林彪的手渐渐地、渐渐地离开头。他双目微闭，大衣领竖在颈侧，随着摩托车的颠簸，衣领轻击他瘦削的脸颊。十几分钟后，他的脸颊有了血，眼睛睁开一条缝，目光使人觉得他是在眺望；不是关在屋里开车，而是疾驰在山野大川，身边踊跃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百万大军。

尽管排气筒伸出屋外，汽油还是弥漫得令人难以忍受。林彪却惬意地长吮长吸，那神情使人联想起空旷三日的烟民终于得到一包“中华”烟……

当我颠得全身肉疼，头晕脑涨时，林彪终于恢复了精神，恢复了元气。他朝我瞥一眼，目光里少有地带出一丝感激：“好了，谢谢你。”

一个人活到20岁，多少都能给自己看点病，更不要说久病成医。林彪病多，但极少请医生。不能只说他“信巫不信医”，客观讲，他的病怪得出格，科班出身的专家博士恐怕难有几个能诊出他的病因病理。倒是他自己通过“实践”，获得了对付一身怪病

的医方。

那是更深半夜，叶群和秘书关光烈紧急调车。我以为是主席来了。因为林彪不与任何人交往，一般会议也不参加，除了主席没人能请得动他这尊“神”，就是江青，不拿主席的手笔也请不动林彪。而主席又有夜间办公的习惯……

林彪出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和神情，我就知道不是主席来到广州，而是他又犯病了，正在受失眠的折磨。

我曾听关光烈等人讲过，林彪有夜游的习惯，看来今天就是这么回事。

果然，林彪只吩咐一声：“开车。”便闭上了眼。

汽车驶出广州城，我加快了速度。我仿佛听到林彪痛苦的呼吸声，接着又是一声交待：“下公路，走野地。”

于是，我离开了平展的公路，走坎坷，碾石头，在没有人走过，没有牛羊踩过，甚至狗也没有跑过的大野地里行驶；汽车时而跳起，时而沉落，我的两手紧握方向盘，大幅度地滑来滑去，眼睛瞪得几乎要掉出黑眼球。

在这种大起伏、大摇晃中，林彪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身体放得松弛，头也敢靠在椅背上了。

“停车。”他小声下令，“我睡一会儿。”

我和警卫钻出车。看来，他的老警卫很有经验，毫未见怪，随身带了被子和毛毯，示意我帮忙，将被子和毛毯盖在车上，便拉我离开一点距离，忠心耿耿地守卫一旁。

我们无声地吸燃香烟，无声地望夜空，望四野，望那辆黑沉沉、孤零零的汽车。林彪睡着了吗？坐在汽车上能比躺在床上睡得更舒服吗？我到底不曾问出声。

“唉，好久没仗打了。”老警卫从嗓子眼里轻轻叹出一声。他话不多，一夜就叹出这么一声。

当林彪结束夜游，大病初愈一般回到家里时，叶群已经精气神十足地准备上班了。（责任编辑：仲文）

江青

施「恩」

小记

权延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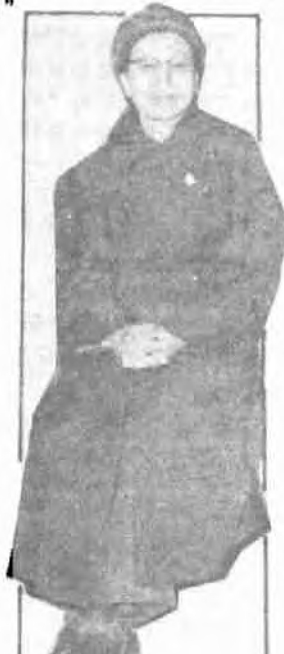
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不声不响赶去前门饭店和代表们共同进餐，代表们提前开过饭，他就和工作人员一道进餐，餐桌旁笑声不断，有春风入座之感。

江青不同，她紧随周恩来之后，“隆重宣布”要去前门饭店看望代表，并且说：“我最喜欢人民解放军。我也穿军装，我对人民军队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我这次不看别的代表了，只看军队代表，看看我们的司令政委们。”

前门饭店立刻动起来，乱起来，各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们，不论你资格多老级别多高，都像刚入伍的新兵一样整齐地排队于前门两侧，准备迎接江青。

忽然只听有人喊：“快快，快调队伍，江青不走前门了，走后门，到后门去。”

于是，一阵口令声，这些司令政委们又被带领着转向后门，仍是分到门口两侧，并且再次被告诫，口号要威武雄壮：“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这些司令员和政委，随便拉出一个来也比江青资格老、职务高、贡献大。完全可以自豪地说：老子打的仗比你听说的还多。但现在他们只能委屈地站列于门两侧，等候接见，准备欢呼。

可是，江青没来，来的仍是急迫的声音：“快快，回前门，回前门去，江青还是要走前门……”

司令员和政委转到前门又站5分钟，又传来喊声：“不行，前门目标太大，江青还是同意走后门……”

过了没10分钟，新命令又到：“江青发脾气了，她说走后门是不尊重三军司令，要走前门。说目标大怕什么？共产党还怕群众吗？江青同志关心尊重人民军队，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现在请大家再到前门去。”

无论江青如何“尊重人民军队”，“和群众站在一起”，这些老兵们还是忍耐不住了。不好明着骂什么，那粗重的喘气，故意的唉声叹气和用力的啐痰声，无不反应了他们愤懑的情绪。

也确实太过份了，前门后门调动了三个来回，走6趟路，才“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

当司令员和政委们前门后门团团转时，一个女服务员爱开玩笑，小声对服务处长李维信说：“情报不准，调动三军，前门后门，慌报军情；团团乱转，不见尊容。”

女服务员年轻，嘴边没个把门的。这种顺口溜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完全够定反革命了。

“我撕你嘴！”李维信听她说完了才警告一声。

女服务员一伸舌头，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年轻人不知厉害，传出去你哭都来不及。”李维信小骂大帮忙，爱护地关照：“多喝开水身体好，少说话人不



老，去吧。”

可是，这段顺口溜还是在司令员政委们之间悄悄传开，并且传回了各自的部队。

李维信搞服务工作虽久，见江青并不多，“文革”前毛主席不许她出头露面，所以她极少在餐桌旁露面。她更多的是关在含和堂里看电影，李维信只是在她看电影时为她上上水。

但是，在广州就不同了。

江青也是每年都要去广州住段时间，有时一住也是小半年。南湖宾馆修好后，江青很快就来了。从周恩来的嘱咐中，所长陈良顺体会到江青比较挑剔，难伺候，所以留个心，费不少神。了解情况的同志介绍，江青喜欢动物，喜欢养狗、养猴、养马。工作人员便在南湖为她弄了一只猴。平时养在笼子里，江青来时放出来。

江青自己并不养猴，不像有些文章说的整日养猴，她只是玩玩猴子解闷。猴子就是宾馆替她养了一只，跟陈良顺更熟悉些。放出笼子，便紧跟他屁股后边，走哪跟到哪。有时猴子也烦躁，扯他的衣服几口。

江青真正感兴趣的似乎还是看电影。每次来广州，片子都是用汽车拉来，天天看几个小时，看累了，出来散散步，玩玩猴，有时也骑马。不少人在南湖见她骑过马。

江青还喜欢指手划脚发议论，喜欢大家跟随前后左右点头称是；这时，

她兴致会越来越高，对周围的一切都敏感起来。哪块缺少树，哪块草地不好，都能引来她的一番议论，然后限期绿化。到期好真来检查，没照她的话办就要惹她发脾气。所以，她限期绿化的地方，都得按期绿化好。

“我喜欢茉莉花。”江青在南湖漫步，指点路边的茉莉，“多种些茉莉花，不但美化环境，而且美化空气。茉莉花能做香料，卖香料可以赚些钱，增加经济收入。你们就是缺少经济头脑。”

一向要“政治”不要“经济”的江青，忽然讲起经济头脑，不能不引起宾馆的重视，何况，她历来视个人的活动为“圣旨”，不允许别人不听。宾馆只好多种茉莉，采了茉莉花卖香料。

不管江青的想法如何，真办起来问题就多了。宾馆用车拉了茉莉花进城卖，好日子卖一二元，日子不好了只能卖角儿八分。没有一天能赚回汽油钱，更不要说汽车损耗和人力钱。大家便商量着想停止这项亏本买卖。

可是，小岛发生了一件，宾馆负责人都受了“警告”。

小岛的茉莉花种了很多，茉莉花枝伸出路面。小岛有个省接待处处长叫杨恩贵，兼小岛接待主任。他是个老资格老经验，看了那些茉莉花，好心好意吩咐花匠：“江青同志喜欢茉莉花。她并不喜欢住南湖，新鲜一段说不定又回小岛，来了肯定要来看花。她总是穿裙子，花枝伸出那么长，挂坏裙子不好。你们修剪一下，把花枝修剪平。”

花匠们接到命令，立刻行动，将茉莉花枝都修剪一遍，看上去齐齐的。

一切都如老杨所料，江青在南湖住一段，又转来小岛，到了小岛就要散步，散步就要去看茉莉花，糟糕的是，江青看到茉莉花后的反应却是老杨万万不曾料到的。

“啊？”江青眼睛一瞪，吃惊地张大嘴巴：“这是怎么回事？谁让剪的？”

“杨处长。他说……”

“坏分子！杨处长是破坏分子！”江青忽然尖叫起来。由于激动而全身颤抖，“好好的茉莉花，招他惹他了？全给我剪了，剪得肢体不全！他想干什么？这是冲着谁来的？这种坏分子不能留，马上开除！”

“圣旨”一下，所有人都惊呆了。

杨处长工作认真负责，又任劳任怨，人缘也好。受了这场不白之冤，好心不得好报，自然有不少同志为了出面解释，向江青说好话。江青“爱茉莉不爱人”，咬定开除不肯松口。只是不再笼统讲开除，排除了开除公职的可能性，明确为开除党籍，使杨处长免了丢饭碗的危机。

毕竟太过份了，连司令员丁盛也觉得交待不了，找机会去向江青说好话：“老杨这个人还是忠厚老实的，搞接待这么久，要坏早就坏出事了。他这次本来是好心……”丁盛讲了老杨的初衷，见江青气色平和了一点，便说：“好心没把事办好，也是考虑问题不全面，警告一下，接受教训就可以了，更能显出首长关心教育人……”

江青舒心舒意地点了点头，杨处长才免了开除党籍，只受了一个警告。

这件事也警告了南湖宾馆，在南湖拐弯抹角，所有地方都种了茉莉花，而且无论赔多少血本，一直坚持卖香料，天天出车进城，雷打不动。

江青很高兴，以为她对南湖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种花积极性也更高了，张口闭口：“我还要再立新功。”

在南湖，毛泽东的房子是7号，江青是1号。江青从1号跑去7号，在毛主席住房东头种了棵金银花。花以人贵，大家精心照料，施肥浇水，那棵花爬藤很高，长得叶茂花盛。大家为花搭了架，竖了牌。江青几乎天天看，乐得闭不拢嘴。后来江青不愿住南湖，想回小岛住时，便恋着那棵花说：“小岛虽好花难舍啊。”

赵紫阳对陈良顺吩咐说：“江青不愿住南湖，还住小岛。她喜欢那棵金银花，你们帮忙把花给挪过去吧，注意点，不要伤了。”

为移种这棵花，宾馆费了大力气。不伤花，就得连花带架子带上一块移。架高花盛。沿路电线不够高，一路走一路剪电线，前边剪断，后边赶紧再接上，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剪，把花移到了小岛上。

因为江青还喜欢狗、猴、马之类动物，宾馆多一份心，又养了许多小白兔，觉得长耳朵，红眼睛，通体雪一般白得可人，江青一定会喜欢。就请她来看。

这一次没搞好，江青一见就沉下

脸，教训说：“养什么不好非要养兔子不行？兔子打洞你们知道吗？打洞打空了，我的茉莉花就要死了。”

于是，宾馆赶紧把兔子打发走。

不久，那位美国女作家罗哈娜·维特克来了，江青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除了看电影、散步，每天还要和美国女作家谈话，而且天天谈到后半夜。

不知什么原因，江青不在小岛也不在南湖谈，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上老虎口谈。”

那是“离水而居”的林彪曾经住过的老虎口，大概这个地方无论名字还是历史都更有刺激性吧？也许江青认为她讲的以往是什么“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吧？正是天气热得难忍之际，她离开清凉的水边，跑到了火辣辣的老虎口。她身边有个警卫员小李，同陈良顺一道坐在外面守候；江青和美国女作家在屋里谈得“激情荡漾”，忘乎所以，陈良顺和小李在外面聊天无情无绪，热不可耐。

“该完了吧？”陈良顺烦得流汗。

“还早着呢。”小李到门口听，还讲山东的事呢，讲康生家里的事。”

不知过了多久，陈良顺也不知去探过几次，她们仍然在谈。

“到哪儿了？”小李问。

“到上海了，要进监狱了。”陈良顺吸燃一支烟，“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出狱……”

他们就这样白天黑夜苦熬着，陪江青从“山东”到“上海”，从“延安”到“北京”；一会儿上舞台一会上电影，一会儿进监狱一会儿又登天安门，走完了她那艰难琐碎极尽夸张的一段生活历程。（责任编辑：仲文）



文房二题

刘宏铸

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徽墨，如同她的出产地黄山一样声名显赫。游罢黄山，再到山下的黄山市里参观欣赏一下徽墨大观，那喜悦，便就是双重的了。

走进徽墨厂的墨品陈列室，第一眼就把我惊呆了：那曾与法国凡尔赛宫齐名的清代三朝皇帝行宫圆明园竟一砖一瓦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一读出那些亭台楼阁的名字：环碧楼、古柯庭、迎春阁、鉴光楼、韵琴斋、品诗堂、墨池云、芝兰室……

真令人难以置信，这庞大而瑰丽的建筑群，不是画在纸上，不是绣在绢上，也不是缕刻在黄杨木上，更不是嵌于百尺石岩，却是拓印在一寸长的墨锭上！

徽州墨厂厂长告诉我，这套“御园图”古墨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家收集了圆明园的风景绘制而成的，全套64块，外形、色彩都各具风格。那被八国联军毁了的圆明园，只在这套墨模中尚留真貌。

“这样珍奇，拿来研墨不是太可惜吗？”我为那些国宝似的墨锭心痛。

“不，姑娘，墨锭不都是用来研墨的，它也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品呢！”厂长接着说，明代万历年间，有个叫方于鲁的人，创制了这种“集锦墨”，早在宋代就远销海外了。

我开始在“百科集锦墨”前缓缓移步，那墨锭上的图案使我一忽儿像是在西子湖畔徜徉往返，一忽儿像是攀行在黄山的36峰之间；面对16块“织锦图”墨锭，我知道了古代织锦有16道工序；我还找到了“十二属相”墨锭，“四季图”墨锭……那光绪年间埋入中苏边境以示国境线的铜柱早已不知去向，但却以我眼前这个巨大圆形墨锭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墨锭上像当年的铜柱一样，写着“此柱可立不可移”的字样；万历年间为纪念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铸刑鼎而制作的铜钟不知尚在何处，但我却看见了用墨锭造成的“铜钟”。

噢，那是些什么人？好熟识的身影！走进“诗苑萃集”墨台，我惊叫：这是文学大师们在济济一堂呢——对月独酌的李白，埋头苦吟的苏轼，迎风而立的屈原……

最有趣的要算那块“百子图”墨锭：一百个童子有的捉鱼、放鸭，有的下棋读书，有的戏水、上树，有的采莲，骑竹马。他们各具神态，惟妙惟肖。据说，前来参观的人，十人有九个难能把一百个童子完全找出来呢！

蓦地，我被一枚罕见的巨型墨锭吸引住了。这是一块仿照地球仪制作的墨锭，那纵横遍布的江河湖海，真使人疑心那不会是印刷地球版图的样子。这墨锭置在一只晶亮的玻璃罩里，罩子上醒目的写着：1915在获巴

徽墨大观

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

望着这些瑰丽多彩的徽墨，我突然强烈地感到，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浅薄。这驰名中外的徽墨究竟从何而来？如何而来？

厂长告诉我一个古老而真实的故事：

五代十国时，河北易州墨工奚超与儿子廷珏避乱渡江逃到徽州，见这里“山有黄山白岳之奇，水有练溪新安之妙”，那满山的古松唤起了墨工重操旧业的欲望。奚氏父子苦心钻研技艺，改进了捣松、和胶技术，不出几年，制出了丰肌腻理的好墨，一时被盛称为“奚墨”。当时有诗人赞曰：“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到黄山游览的文人学士，对奚墨无不叫好。南唐李后主得知后，差人取了两块奚墨去，用它画了两条鲤鱼。鱼画好后，后主不慎将一杯水洒在了画上。这时奇迹发生了，那被水打湿的墨迹竟不濡不晕，两条鱼反而越发活脱欲蹦起来。后主大喜，连声惊赞“神墨！神墨！”一纸皇令下去，将奚廷珏封为了墨务官，并赐国姓。从此，“奚墨”便被改称为“李墨”；由此，天下便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一说。

我的心痒痒的，也想学那李后主开开眼界。厂长看出我的心，真的为我弄来一杯水。大厅四壁满挂着名家画师墨客的真迹，全是用徽墨写画的。望着那名贵的字画，我又犹豫起来。这时，厂长把杯子拿过去，将水泼在画上。我惊喜了！呵，那缕缕线条果然丝毫不晕，反而在水珠的映衬下，显出越发黑亮的色彩来，使人想起阳光下闪烁生辉的黑色天鹅绒。

“别说泼这点水，就是浸在水里数天，墨色也不会退的。”厂长说。

“那不是像漆一样吗？”

“这种墨就是叫超漆烟徽墨呀！明万历年间，皇帝用来写大字，不小心滴了一滴在桌上，忙拿抹布擦，擦来擦去擦不掉，后来



万历程君房制墨

还是叫木匠刨掉的。皇帝大惊，说：“此墨入木三分，可谓超过漆矣！”

厂长摸着下巴，学那作古的皇帝拖着长腔。

竹笔书法大师 李国桢

当代中国的书法家犹如灿烂的群星。在那长长的名单中，一个叫做李国桢的中年男子当推较为特别的一位。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毛笔书法、钢笔书法，却很少有人知道竹笔书法的存在。其实，竹笔可称是“万笔之祖”。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是断竹为笔，然后蘸着兽血在石壁和兽皮上书写记事的。后来发明了竹筒，祖先们又用竹笔蘸生漆在竹筒上书写。只因出现了毛笔，竹笔才渐次被这个蓄墨性能好、书写灵活的“新生代”笔所替代。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民间仍有用竹篾写字的，俗称“筷子书”。人们对竹笔书法的眷恋不舍，就是因为用竹笔写出来的字古朴苍劲，颇有一种金石气韵。

海外书法界曾一度以为中国的竹

笔书法已经失传。1982年，日本现代硬笔书道协会会长柴田木石先生来华访问，言谈中提及这一看法。于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火速召来居住在安徽滁州的李国桢进京献艺，以正“视听”。

李国桢一下火车就匆匆赶到中国美术馆。馆内正在举行中日书法交流活动，柴田先生此时就在这里。因李国桢没有请柬，门卫不让他入内。当李国桢向门卫讲述了自己此行身负的使命后，门卫肃然起敬，对他放行并祝他为国争光。

起初，柴田先生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位自称是“用竹笔的”中国人投去半信半疑的目光。当他看到李国桢果真从随身的小提箱中取出一截寸把粗的竹管时，先是惊住了，等到李国桢用这竹管饱蘸墨汁，写出一幅幅清丽洒脱的字画时，这位在亚洲书法界里颇具声望的柴田先生，神态庄重地向李国桢深深鞠了一躬。从此，柴田先生便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盛赞当代中国竹笔书法的艺术成就，并送李国桢一个极气派的称谓：50亿人一支笔。50，是世界人口总和的数字。

最初的功劳该算在李国桢的叔祖父身上。老人家写得一手好字。6岁起，叔祖父就命李国桢每天练习120个小字、40个大字。李国桢在叔祖父的督导下拿起了笔，一写就写了40多个寒暑。

不过当初叔祖父教他练的是毛笔，而改用竹笔则是十多年前李国桢自己拿定的主意。儿时他曾见人写过“筷子书”，那奇特的书写工具与奇妙的书法效果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于是，李国桢走进竹器加工厂，在废料堆中挑选出一截粗细适中的竹筒头，略加裁减，便成为了一支令李国桢日后蜚声海内外的竹笔。笔者在李国桢的书房中欣赏了这支颇具历史意

义的竹笔，它在主人无数次的把握中，早已变得油光鉴人。笔头那里，墨汁浸出长长的一段黑色。

谁都能想像出竹笔书写的不易。那光溜溜的竹筒蘸墨后会很快流下来，必得运笔迅速，否则墨汁便会弄脏纸张。最不易的是还要熟练掌握笔与书写纸张之间的角度，角度大时写出的是粗笔划；角度小时写出的细笔划，甚至虚笔划。那如同水墨画般清秀的竹笔艺术，正是从这虚虚实实的笔划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十几年来，李国桢所有的努力其实就是在探询这个奇妙的“角度”问题。一次又一次提笔使他渐渐走到了那个目标跟前。

1983年10月，中日第一届硬笔书法友好交流展览在李国桢居住的安徽滁州举办。李国桢的名字与他的竹笔书法一起，征服了更多的书法爱好者。

李国桢的竹笔书法作品已被列为国家礼品。他的几百幅墨迹随着祖国友好使者的脚步，走进了世界20多个国家。

然而李国桢却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即便有外商以高价购卖，他也婉言谢绝。问其原委，大师回答：“我的字是艺术，不是商品。”

但向李国桢“求字”却极易。亲朋好友，远方来宾，抑或是某单位举办活动要他前去献字助兴，他也慨然应允；每年春节，前线士兵都会收到他寄来的贺春字联；亚运会集资，他两次将自己的许多字画捐赠给组委会；当地驻军补入新兵，李国桢即席为百余名新战士每人书写一张贺年卡片……

李国桢很为此骄傲。他目光熠熠地告诉笔者：“我的书法，覆盖面是最大的。”

(上接83页)在游行前后的一些日子里，英国各大报纸如泰晤士报、每日快报、每日电视报、每日镜报等，对中国代表队的活动，都作了醒目的报导。

6月8日下午，英国广播公司(B、B、C)通知，要对中国代表采访，队部我、伍耀洲(现侨居美国，从事银行业务)和曾扬盛(现侨居加拿大，从事水产事业，曾

返大陆访友)三人前往，谈了些什么，时隔整整45年，基本都忘了，不过，有两句话，现仍记得很清楚，我说：“China could be invaded, but Chinese can never be conquered.”(“中国可以被侵略，但是，中国人却永远不能被征服”)。我们的谈话录音，B、B、C、当时向全世界播放。中国代表队参加这次胜利大游行，荣誉要归功于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战胜日本军国义的中国人民。

苏松源和苏氏拱桥

□陈玉 杨国民

连接 1 和 2 的 弧线,跨越了 十三个世纪

当人类的祖先有意识地开始了对路的探索那一天起,也就开始了对桥的探索。垫石过河,攀藤过涧,这“石”和“藤”便是最原始的桥。我们中华民族的建桥历史亦和世界上其它优秀民族一样,悠久而辉煌。

“石杠谓之倚”,“倚者,步桥也,即聚石水中,以备步涉者”,这是古代文献《尔雅释宫》中关于桥的最早记载。几千年来,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国土上,桥,高悬低卧,千姿百态;有的雄跨山涧,有的飘逸水乡。每一座都凝聚着一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艰辛。被誉为千古奇迹的赵州桥,至今仍雄跨在汶河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其拱上叠加小拱的桥型,是我国有史记载以来在世界桥梁史上拥有的第一例首创,比西方出现这种形式的拱桥要早 1200 多年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在李春建造赵州桥以后直至公元 1964 年,双曲拱桥的诞生,终于使我国在世界建桥史上有了第二例首创。1989 年初夏,我国在莫斯科举办中国科技日活动,双曲拱桥的模型似一条彩虹架在展厅里,引起欧洲各国桥梁专家的赞赏。今年元月,我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中国市政及建筑工程展览会”,在双曲拱桥的图片集锦前,人头攒动。马尼拉桥梁公司的一位专家专程赶到展览会负责人的下榻处,商议在菲律宾合作建造双曲拱桥的事宜。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石拱桥》一文中,对我们首创的双曲拱桥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建桥史上的又一大奇迹。令

人难以置信的是,创造这一奇迹的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无锡县桥梁公司的普通工程师——苏松源,他的口袋里,仅揣着一张皱巴巴的初中毕业文凭。这样的反差,势必会引起人们思维定势上的错位。这位身材瘦小,朴实得似农民的桥梁专家,当步入云集着欧美大批专家的国际桥梁会议会场时,不少专家投在他身上的目光是惊疑的,然而他关于双曲拱桥理论和实践的演讲,却使这些惊疑目光演绎成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英国一位桥梁专家建议,将双曲拱桥命名为“苏氏拱桥”,不少国家的专业杂志都先后对“苏氏拱桥”进行了报导和评论,充满了褒扬之辞。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决定在其首都近郊建造各种风格的桥梁时,还指定要有“苏氏拱桥”。

这 1300 多年的历史空白竟让他去填补?有人说:是历史钟情于苏松源。是的,因为苏松源钟情于他的桥。

由桥化成的梦 到步入桥的 “迷宫”

连苏松源自己也惊讶:他的梦想竟然在一次偶然的机缘里变成了现实。

他家在绿水萦回的江南水乡,这里出门三步就是桥,桥便是他家乡的路。离他家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小时候,他经常在桥上玩耍,那高高的桥背就像一座小山,老人们爬过这座小山时,常常气喘得脸色发白。他奶奶年轻的时候,那粽子样的小脚就爬不上这座小山。要过桥去买东西时,奶奶总站在桥堍上发愁,常常自言自语:要是造一座平一点的桥就好了。

奶奶的愿望连同那座石拱桥,飘

飘逸逸进入了他的梦乡:高高的脊背竟被他理想化的力量熨平了,变成一条平展展的彩带,奶奶笑盈盈地踮着小脚在彩带上,轻轻抚着他的头,夸他有出息。

一次,他跟着母亲走亲戚,途中有一座木桥,久经风雨剥蚀,桥栏断了,桥墩也“瘸”了,人走上去,桥面就晃悠悠地颤,待母亲牵着他走到中心时,一块桥板“啪嗒”断了,吓得他们险些掉进河里。后半座桥,母子俩是爬过去的。这一幕,亦化入了他的梦景。梦中,他总是在走小木桥,走着走着,那木桥突然断了,他“哇——”地大叫起来,梦醒了,冷汗却从脸上滚落下来,连续几夜,他都做着这个噩梦。母亲急了,差人打着灯笼到小木桥那里去招魂……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让他出远门了。

然而,命运又偏偏将他和桥扭在一起。1947 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失业了,家里人口多,父亲为他在一家汽车公司谋了一份职业,这家公司又将他分在路桥处供职,从此就开始了他的修桥和造桥的生涯。也许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抑或是先辈们的愿望已在他纯真的心田上萌了芽,从那时起,他便暗暗地下了决心:要在家乡的河流上架起最漂亮的桥。

新中国成立后,苏松源分配在苏南行署交通处无锡公路管理站工作,当时他 23 岁,理想的彩带上又播上了芳馨,可饱尝战争创伤的古老大地,百废待兴,党和政府有多少大事需要干,国家给无锡公路管理站的钱少得可怜,每年只能修 1—2 座危桥。可无锡县有 3500 多座危桥亟需修建,而照现在的速度,就是把这些桥重修一遍,也要花 1700 多年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

无锡县每次开人代会,代表们

60%以上的提案都涉及到修桥铺路的问题。这是同人民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事情啊,作为一位桥梁工作者,他深深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他的心灼痛了,寝不安席了。不断有危桥断塌、人牛淹死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一次,距无锡市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失火,呼啸而去的消防车却被一座木桥挡住了去路,消防人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农家的财产。还有一次,无锡西面陆塘桥有一位农民的儿子得了急病,市区的救护车因路途上的桥不能通车只好折回,农户只得撑着船将孩子送到医院抢救,可船速太慢,小孩没到医院就死了。他心里充满了歉疚,可造桥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没有钱,他许多美好的设想都落空了。

他又何尝没有作过努力!1959年,苏松源终于在他自己的建桥史上树起了第一座丰碑:在无锡至宜兴的直湖港上建起了一座长72米,宽8米的乱石拱桥。建这种桥,只需用木料搭好拱架后,就地采石,不用凿磨就堆砌而成,省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桥建成后,他作为江苏省代表参加了1960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桥梁工作会议,引起与会者的瞩目,苏松源的名字亦和这座乱石拱桥一起传开了。然而,造这种乱石拱桥,因花费的石料太多,在没有山的地方,运输量太大。加上拱架需用去大量的木材,推广价值不大。

6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把国民经济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轨道上来。为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无锡县将改建农用小桥提上了议事日程。1963年,国家在遭受3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创痛后刚刚开始复苏时,无锡县财政就拿出了2万元钱给苏松源主持工作的县桥梁工程队,用于修建乡村的农用小桥。这对当时无锡县财政来讲,2万元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对3500座农用小桥的修建的工程来说,仅是杯水车薪。

苏松源简直闯入了一个数字堆叠而成的“迷宫”。他用这2万多元钱,只修了近20座木桥,而全县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这就是说,每年将有700多座危桥出现,大大超过了他修桥的速度,他苏松源就是子子孙孙修下去,也修不完这些危桥啊。

第2年,无锡县将财政拨款增加

到8万元。这是苏松源从来没见过的巨大数字,他的心动了。他想:光修不造好像贴膏药,贴了还要掉下来,干脆造新桥。什么桥?最简单的是“梁桥”,只要先预制两根水泥桥梁,然后平行地搁到桥台上,再铺上水泥板,桥便成了。要造一座10米跨径需走牛的负载量的“梁桥”,至少需要资金5至8千元。一年下来,那8万拨款加上部分民间集资,只造了20多座小跨径的梁桥。照这样造下去,要想改变无锡交通状况,也要170多年时间啊!

苏松源迷惑、彷徨、忧虑、焦躁,经过一阵苦痛的酝酿后,他渐渐省悟到:要走出这样一座“迷宫”,需要有勇气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要自己创造出一座新的桥型。

世界桥梁史上的一大奇迹竟是一座9米跨径的小桥

在传说当年风流才子唐伯虎卖身为奴,演下一段“点秋香”的风流韵事的无锡县东亭乡,在一条窄窄的河流上,至今横跨着一座9米长的小桥,尽管桥上早无行人,桥台上簇生着杂草,可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地位,就像1300多年前李春建造的赵州桥一样,闪烁着眩人的光芒,它就是我国第一座双曲拱桥。它对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1978年春天,当苏松源走上全国科学大会的领奖台时,他两眼湿润了,对仅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桥梁工作者来说,摘取这项桂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1964年,当人们还沉浸在闹元宵的欢乐气氛中时,苏松源却身背简单的行囊,告别妻子儿女和他的伙伴冯泉钧一起,下乡穿村走巷,餐风露宿,详细考察了无锡地区20多座各具特色的古代石拱桥。从构造、用料、选基及下沉的幅度、速度都作了详尽的记录,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回,他们发现有一座建造300多年的石拱桥保存完好,而且几乎没有下沉迹象,便借来把铁锹,循着桥台挖下去,一层一层地研究土质。无锡县甘露乡有一位老石匠叫邓水根,一生建造了近10座石拱桥,苏松源步行30多

公里路,拜访了他。

苏松源设想:新型桥既要像古代石拱桥那么美观、坚固,桥面又要平坦,宜于人牛行走;还要省工省料,施工方便。他在心里构筑着这种新型的桥梁,造好了,又推倒,推倒了,再重新构造,一次又一次。桥身清晰了,又模糊了,模糊了,又清晰了,渐渐的,直到那桥型终于静静地映在他澄澈的心泉上。他搞模型试验了。他在平地上挖个小沟作河道,河边折根柳条为桥梁,沿上放两块砖头作桥台。桥架上去后,他就让大家来参观,大家说桥身太弓了,他就拉平点儿;大家说太平了,他就按弓一点儿,直到大家齐声说好。参观的人走了,苏松源却依然坐在地上揣摩着桥的模型。他想:弓形能承受压力,何不将桥面做成弓形呢!这样弓上加弓,受的压力不是更大吗?他将整个桥身设想成一张弯曲的竹梯,拱肋便是梯子竖梁,加在拱肋上的拱波便是梯子的“踏级”。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伙伴冯泉钧和其他造桥工人,大家都认为可以试一试。

苏松源很快在桥梁工程队附近一条9米宽的河道上选定了桥址。砌桥台和浇拱肋同时进行。为了施工方便,他又吸收了古代造石拱桥的施工技术,将一根拱肋分为三截,先化整为零,架桥时再聚零为整,采取了预制装配的方法。

半个月后,桥台砌好了,架桥开始了,先用木头搭好桥架,然后架好拱肋,三根平行的拱肋,就像塑料大棚的三道竹环,拱肋间,采用筑坟圈的方法,用砖头搭砌出两道拱波,最后再用砖头砌平,浇上混凝土水泥。整个架桥过程只花了两天时间,一时间引来几千村民围观,人们仿佛在观看魔术师的表演。

桥架好了,可谁也不敢走。那样儿仿佛像展厅里的一具桥模。单薄得令人提心吊胆。苏松源就当众表演,他大摇大摆在桥上走了几个来回,桥身纹丝不动。围观的人怕苏松源施了轻身法,便推出一个胆大者跟在他身后蹑手蹑脚地走了几个来回,桥依然纹丝不动,人群中便发出了一阵啧啧的赞叹。苏松源为了解除人的疑虑,又叫来几个造桥工人一起跟在他身后又走了几个来回,再叫他们一起在桥上乱蹦乱跳,桥身只有微微的颤动。人们终于

相信了，这桥能走人。

能不能过耕牛呢？村民们心里还存疑虑。事有凑巧，桥刚造好三天。桥南死了人，要到桥北下葬，12个抬棺木人加上棺木本身的重量，能过桥么？死者家属找苏松源询问，苏松源拍着胸脯担保：“能过。”可棺木抬到桥前，丧家又犹豫了，苏松源便从桥梁工程队中挑选出12个青壮年换下了抬棺木的人，轻松地通过了小桥。这一下，人们彻底信服了。

1964年4月17日，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由中国首创的一种崭新桥型——双曲拱桥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的建桥水平已跨上了新的台阶，过了几个月，江苏省专家组又对这座桥做了静压试验，结果表明：它不仅能走人和牛，还能通过5吨重的卡车。比建造一座同样负载量的钢筋混凝土“梁桥”节省资金三分之二以上，这一结果，超出了苏松源原先的设想。

苏氏拱桥的效应

和世界上许多发明创造一样，它

东拱桥：1964年4月创建的第一座双曲拱桥



新虹桥：1973年建成，跨径80米，宽7米。



往往最初并非是理论的宠儿，而在实践的温床上却抽出了一瓣理论的新芽。成功的尝试和赢得的赞誉并没有使苏松源陶醉，相反，他在双曲拱桥的探索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同年，他又建造了跨径为25米的双曲拱桥；第二年，又在无锡县吴埭乡设计建造了一座宽8米，跨径为55米的双曲拱桥，从设计到完工仅花了4个月时间，整个工程仅花了3万元，这在当时国内外桥梁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奇迹。

苏松源在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后，对这位实践型的专家来说，建立双曲拱桥的理论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双曲拱桥才具备推广的意义。

这是一条曲线，大概可称“苏氏拱桥位移曲线”了。双曲拱桥负载后，通过拱肋的传递和分解，便将压力变成了推力，在不同的土质上，桥台都要发生不同程度的位移。能不能通过一条曲线将它清晰而直观地显示出来呢？苏松源选择建造在不同土质上的5座双曲拱桥作为观察点，在桥台后面竖一根竹竿，标上刻度，每天观察一次，记下数据。每座桥之间都间隔着好几里路，苏松源就靠两条腿来回地跑，一

天十几里，风雨不避。终于，在他以艰辛和认真建立的坐标系上，一条条曲线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双曲拱桥的拱肋曲线是弧形好呢？还是抛物线和悬链线好呢（即将一根链条固定两端后自然下垂所形成的曲线），苏松源用相同的材料做成三座桥的模型，一座弧形，一座抛物线形，还有一座悬链线形，然后做静压试验，结果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悬链线的双曲拱桥可负载的重量最大。而这条悬链线又可根据桥的跨径和所需负载的

重量推求其轨迹。为了这条曲线，他又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结论的简单并不意味着推求的轻松，凝注在公式里的心血到底有多少，只有苏松源自己知道了，1982年他主持写的《公路双曲拱桥上部构造设计计算》一书荣获1977—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正当苏松源对双曲拱桥的探索正顺利进行时，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开始了，没有任何技术职称的苏松源，因为造出了双曲拱桥而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于是游行、批斗、挂牌，忍受了一系列委屈和凌辱。也许造反派们忽然从最实际的现实生活中悟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最“革命”也需要踩在土地上行走，没有桥就没有路，造桥还需要人才。悟出这个简单哲理的结果，倒会使造双曲拱桥的苏松源获得了自由，造反派将他发配到一个建桥工地进行劳动改造。他白天和工人们一起劳动，晚上钻进工棚秉烛夜书，将自己几年来在双曲拱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整理成书稿，《双曲拱桥技术手册》一书就是他和助手冯泉钧一起在这时写成的。

《双曲拱桥技术手册》一书一版再版。一座座双曲拱桥似雨后春笋般在江南水乡的一条条清流上耸立起来。无锡县改建桥的速度也从原先的每年二三十座猛增到每年二三百座。

各地建造双曲拱桥的成功典例频频传来，举世瞩目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引桥采用双曲拱桥的建造技术，760多米的桥身只用69天就告捷。总长1530多米的湖南长沙湘江大桥，全都采用双曲拱桥，做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通车。河南嵩县建起的前河大桥跨径达150米，是目前国内跨径最大的双曲拱桥。

他不愿画上这个完美的句号

在30多个春秋里，苏松源在河流上已建造了3900多座双曲拱桥，净跨总长度达67400米，平均每公里河道上有2.01米座桥梁，至此，无锡县的旧桥改建工程已全部完成，比原计划提前近100年，1986年，这个县在全国3000多个县中第一个实现了乡村



1978年邮电部为彩虹桥发行的纪念邮票

通公路，这个村全国闻名的财神县经济发展之快，自有他苏松源的一份贡献哪！

自山区到平原，自高原到洼

区，从北国到南疆，从帕米尔高原到江南水乡，凡是有河流的地方，就有他“苏氏拱桥”的情影。有人说：天上星星数不清，苏氏拱桥走不完。这虽然含有一点夸张的成份，但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底有多少苏氏拱桥，现在还无法统计。

1988年，他60寿辰，无锡市副市长薛成志登门拜访来了，按“七五”规划，无锡市要拓宽市内的京杭大运河，并在上面建三座百米跨径的大桥，可交通厅的拨款加上市里的集资，整个工程的耗资数只能以2000万元为极限，而按省、市桥梁工程队的预算，这点钱够不了建三座桥。这位副市长急了，他用希望的目光盯在苏松源身上，苏松源沉默了片刻，郑重告诉这位副市长，他将用其它工程队预算的一半资金承建这三座桥。这位副市长一下子懵了，目光中满含着惊异，而苏松源的眼眸里却充满了自信和坦然的神色。

苏松源的这一举动引来了一双双诧异的目光，他们劝他说：“老苏，你还要图啥哩，你要是有个闪失，要留终身遗憾啦，你何必去冒这个险呢？”

苏松源就这么自信和固执，他干了，也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三座大桥一年之内全部完工、通车。有将这种取名为“钢架拱桥”的新型桥型称作“第二代苏氏拱桥”。它们的诞生，标志着苏氏拱桥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样大跨径的桥梁耸立在软土基上，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建造这种桥比建造同样跨度和同样负载量的“T型钢钩桥”要节约50%的资金。这三座桥的出现，像当年第一代苏氏拱桥诞生一样，引起了国内外桥梁专家更大的关注和兴趣，来此参观者络绎不绝。

提起北京天安门，早已成中国的标志与象征。然而，天安门是谁设计的呢？他就是我国明代的杰出建筑大师蒯祥。他出生在江苏吴县香山一个远近闻名的木匠家里。明永乐4年（公元1406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30多岁风华正茂的蒯祥被选召入京，授权他设计并领导营造宫殿建筑群。明永乐15年（1417年），由蒯祥担任主要设计建起承天门。清顺治8年（1651年）重修，改称天安门。

继承天门之后，蒯祥又奉命负责营造乾清、坤宁两宫和重建三大殿，并领导营建了北京城池、九门，以及王府、六部衙署等工程，从而，奠定了明清两代宫殿建筑的基础。因此，在明代故宫的鸟瞰图上，特别绘有蒯祥的画像。蒯祥还负责设计、营建了明十三陵中的裕陵，就是英宗朱祁镇的陵寝。

蒯祥技艺高超，“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中上意。”他精通建筑结构，并善于创新，宫殿建筑中的“金刚腿”活络门坎，就是他发明的。相传在重建故宫的三大殿时，缅甸国向明朝进贡了一根巨木，皇帝下令把它用作大殿门框。施工时，有个木匠不慎将木头锯短了一尺，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个木匠吓得跑去报告蒯祥，蒯祥来到现场看，索性叫那个木匠再锯短一尺。此举惊呆了众工匠。其后，蒯祥在门框两端雕琢了两个龙头，再在边上各镶一颗大珠，用活榫头装卸。“金刚腿”就这样问世了。蒯

祥还具有特殊的绘画本领，能双手握笔同时在一根柱上绘双龙，画成合之，双龙如一，出神入化。蒯祥的建筑技艺受到高度赞誉和评价，同行叹为“鬼斧神工”，皇帝称他“蒯鲁班”。据传，一次，蒯祥酒后骑马误闯宫苑，按照宫禁当判死罪，皇帝听说是“蒯鲁班”，立即予以特赦。由此可见，皇上多么器重蒯祥。

蒯祥执技供奉，官居工部侍郎，享受一品俸禄。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工匠，获得如此显赫地位，在我国古代是屈指可数的。北京旧有蒯侍郎胡同，是蒯祥在京城的一处住处，也是当年的营造业工匠聚集的地方。明天顺二年，英宗朱祁镇赐蒯祥的祖父蒯明思、祖母蒯顾氏“奉天诏命碑”。蒯祥以八十有余之高龄寿终后，被安葬在他的祖坟地，即今江苏吴县胥口镇渔帆村南。

蒯祥的后裔蒯钢、蒯义并至侍郎，蒯诚官至少卿，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蒯祥的工匠建筑技艺，使香山工匠建筑技术世代相传，人才辈出，久盛不衰。后辈“香山帮”匠人皆公认蒯祥为其师祖。

现代的香山古建筑技艺，有了新的的发展和突破。南京的夫子庙，大庆的庆诸园等建筑技艺，都深受国内外的赞誉。吴县的承建工程及水木劳务已经扩展到国际市场。如，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椋星门、美国的明轩、新加坡的唐城和裕华园等，使香山工匠的建筑技艺走向了世界。

天安门是谁设计的

朱诺



话说陈佩斯他爹

——陈强艺术生涯片断

郑 晋

王 恂



辛未上元刚过，北京饭店西厅，灯光璀璨，笑语充盈。延安大学校友春节联谊会上，快节奏的华尔兹乐曲声中，表演艺术家陈强正和舞伴飞速旋转，摄影机的聚光灯集中照射着这对飘逸的身影。谁能相信他那矫健的身姿竟是年过古稀70有4呢？

笔者来到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之畔陈强同志的新居。在这套四室一厅的住宅里，与陈老师 and 夫人进行了愉快的晤谈。

揭开红色的帷幕

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上，往往是某个契机奠定了一个人的终生事业。

陈强原籍河北，父母逃难到山西太原做工，在艰难中供他从小学上了中学。1936年他在并州中学开始搞戏。先是搞抗战宣传，参加救亡戏剧运动，得以同进步人士交往，进入地下党员杜任之组织的职业剧团——新生剧院。1937年到晋西北，与新生剧院的同志一起集体参加革命。1938年4月，党组织派陈强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在这革命圣地的第一座艺术学府里（尽管是在土窑洞和一幢破旧的教堂里），造就出第一代红色艺术家。陈强便是这条红色星河中耀眼的一颗奇星。他在鲁艺戏剧系。在一次歌剧活报剧的演出中，洗星海同志看中了陈强的音乐天才，就动员他：“你乐感很强，到音乐系来吧，这样咱们排歌剧自己系里就解决了。”于是，陈强又经考试转入音乐系。

他一搞戏就自学舞蹈，注意形体锻炼。新生剧院院长的爱人是在留法专攻舞蹈的，所以他学舞蹈有方便条件。这回他又专门学了音乐，还作过曲，搞起歌剧就比别人更优越了。恰恰那时演出的大多是歌剧，他如鱼得水。

从巍峨耸立的宝塔山，到抗日烽

火熊熊的太行山，从奔腾咆哮的黄河之滨，到莽莽无垠的白山黑水，都留下陈强的足迹。他曾在华北联大文工团搞敌后文艺宣传；还曾在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他才由戏剧界转入电影界。进城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至今。

在敌人眼皮底下演戏

在抗日战争前线，陈强所在的武装宣传队常以游击战的方式活动。白天分散在老百姓家，事先化好妆，然后在夜幕掩护下，突然出现在几十里外的日伪军炮楼前。宣传队故意敲得叮叮当当响，甚至还给日伪军送去“请柬”，“请”他们出来看戏。敌人以为是八路军来了大兵团要端他们的炮楼，吓得不敢出来看戏，只是偷偷听戏。其实，这一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战，只有一个班的战士来掩护。当敌人惊魂稍定，回过味来的时候，宣传队早已撤得无影无踪了。

在一座破庙里，点起大麻籽油灯，这支宣传队又在为敌占区的老百姓演戏。还是由一个班在周围警戒，手榴弹拉出了弦，随时准备敌人来了就拉响，掩护群众撤退。陈强他们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的战斗环境里，为老百姓演出了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剧中，凌子风饰演老大，陈强饰演老二。这出戏在群众中引起很大轰动，人们看到，只有坚决抗战才能图生存，求解放；人们看到，共产党、八路军时刻没有忘记敌占区的老百姓，竟能在那样残酷的战争中把戏送上门来。

老生泰斗变成反派黄世仁

陈强演过很多古今中外名剧，如高尔基的《母亲》、《仇敌》，果戈理的

《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前线》，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话剧《钢铁与泥土》等。他创造了众多的光彩焕发的正面人物，尤其擅长演老头，曾被誉为“老生泰斗”。

1945年春，鲁艺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当时陈强满以为叫他演杨白劳，没想到要他演黄世仁，于是大闹情绪，坚决不演。戏没法排下去，停了两天。张庚等领导同志做他的工作，连批评带哄劝，动员他演。他拗不过，只好遵命排演。

刚开始，陈强随意把练就的优美形体动作赋予黄世仁，当穆仁智打着灯笼，黄世仁穿着绸缎长袍，醉醺醺喜滋滋地唱道：“八月里桂花满院香，筹办喜事全家忙……”载歌载舞，把黄世仁演得挺帅，博得一些女孩子的喜欢。这下可坏了，在座谈会上受到陈荒煤等同志的批评，说陈强美化地主阶级。陈强重新从世界观上挖掘黄世仁的灵魂深处，从化妆、形体以及声音的塑造等各方面改变黄世仁的表演，直演得看戏的战士向台上的黄世仁开枪，差点真把他崩了。

那时，笔者之一的王恂正在延安中学学习，与鲁艺同住桥儿沟。每逢下课或做完作业，同学们总爱跑到鲁艺那座“教堂”里，兴致勃勃地观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排演《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张守维演的杨白劳、王昆演的喜儿，在同学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仇恨的种子。而陈强演的黄世仁，尽管是地主恶霸，却也在同学们眼前活灵活现。不少男同学总爱在窑洞外面学陈强演黄世仁，“八月桂花（那个）满院香……”还有的同学用手比划成手枪，“砰！”枪毙黄

世仁。

1950年拍摄电影《白毛女》之后，他又拍了《画中人》等11部片子，到1961年拍《红色娘子军》，他又创造了第二个著名的反面人物：南霸天。无论是黄世仁还是南霸天，陈强饰演的反派角色不脸谱化或漫画式，而是有性格有血肉，深刻流露其内在的灵魂。他塑造的南霸天，可以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以此夺得国际国内两项大奖。

六个第一与外一

章

具有55年表演艺术实践的陈强，以辛勤的劳动和独具异彩的艺术创造，前后共演出了大大小小几百部戏。拍摄电影有33部，影视加一起共40多部。他占了新中国的六个第一：

1947年，陈强参加拍摄了解放区的第一部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他饰演父亲。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片《魔术师的奇遇》于1962年拍摄，他饰演魔术师。

他因在《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南霸天，于1962年荣获新中国第一届百花奖男配角奖。

同时又以南霸天这一角色，成为新中国电影界第一位国际奖获得者——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1958年，他饰演了新中国第一部喜剧片《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

1951年，陈强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组织文艺团体到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这次带去了歌剧《白毛女》，还有京剧、歌舞、杂技等节目，历经东欧9个国家。

“这6个第一之外，还有一个‘第一’也让我占了。”陈强的语气幽默诙谐，却内含深深的苦涩与辛酸。

“文革”开始，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夏衍、陈荒煤、孙维世、崔嵬、田方、陈强等，被集中到某学院。每顿饭吃八菜一汤，他们还暗自高兴，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被“保护”起来。不料，突然如轰雷击顶，北影的“造反派”第一个揪斗陈强。那天正下着大雨，“造反派”给他戴上大高帽，挂上“三反分子”大牌子，到处贴着“打倒三反分子陈强”、“打倒南霸天”、“打倒黄世仁”的标语和大

字报。霎时间，他好像真的变成了黄世仁和南霸天！

陈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受此侮辱，回到“牛棚”，越思越想越无法接受：“我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演革命戏，唱革命歌，怎么会变成‘反革命’？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他用几块手帕连结起来，打算在床栏杆上吊了一生。挽好了扣，忽听后窗外一声小女儿喊妈妈的声音，原来这间“牛棚”的后窗正对着他们家，小女儿喊妈妈替她打开公用的水龙头好接水。陈强听到小女儿的声音，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不能死，孩子还都小，我如果一死，他们就成‘反革命家属’，不行，得活下去！”

于是，他经受住这“史无前例”的磨炼，这6个第一的外一章，没能迫使他放弃终生为之献身的艺术生涯！

喜剧的力量

五十年代后期《三年早知道》放映后，没过多久就批判“中间人物论”。在生活中，中间人物总是占大多数，喜剧中的主角也大多是中间人物。那么一批判，也就没人敢搞喜剧了。这一摆就是20来年。

直到1979年陈强和儿子佩斯合作拍了《瞧这一家子》，喜剧片又重新以她独特的魅力放出光彩。之后，又拍了《夕照街》、《天生我才必有用》喜剧系列：《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冒经理》、《父子老爷车》等。

提起喜剧，陈强谈锋甚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思想解放，干劲很大，都工作得很紧张，生活得比较累。我感到应当让人们轻松些，愉快些。这样，我就立志搞起喜剧来。开始也有人写信给我：‘你这个大明星，

为什么搞这些胡闹的玩艺儿？’这些好心的朋友还不习惯喜剧这种形式，还不理解寓教于乐的真正含义。我的喜剧不是光叫大家乐一乐，不能是‘胳肢人’。喜剧也是挺难搞的，每

个情节都要有喜剧因子，也就是相声的所谓‘包袱’。要用喜剧因子拉住观众，让你看一遍还想看。这不仅是一种艺术欣赏，里面还有哲理。比如‘望子成龙’，其实不一定非得当官、当博士才叫龙，不管做什么，只要对社会有利就是‘龙’，不是‘虫’。如果生活中最广大的普通人都能从喜剧中受到启迪，都争着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不就是喜剧的力量吗？”

在《父子老爷车》中，尽管老奎父子被那个经理当成“二百五”，但是，当老奎发现儿子穿着当年日本侵华时的军服，异常气愤，激起圣洁的民族自感。他打了儿子，儿子跑到海边，躲闪中与日本人对打起来。老奎在旁大声说：“这一拳给你爷爷报仇了”，“这一拳给你奶奶报仇了”，三个人直打得鼻青脸肿。这下不是捅娄子了吗？妙就妙在镜头一转，日本人和老奎父子坐在工棚里喝酒；气氛融洽亲密，日本朋友承认他祖父侵华有罪。三人大醉，各唱各的，二子唱流行歌曲，日本友人唱日本歌，老奎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陈强如是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过去，改革开放中也要提防上当受骗；人际关系不能只是金钱至上。”影片最后，本为赚钱而来的老奎父子，在将要离去的火车上，把那个经理为挽留他们而送上的钱，又大把大把地扔回站台上，这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艺术之家盛开艺术之花

陈强是个富于喜剧色彩的明星，他的家也是一个充满喜剧因子的家庭。

(下转77页)





于右任和 《标准草书》

刘作忠



于右任书法功底深厚，自成一派，人尊称为“草圣”。其致力于标准草书的研究，更是为国人称道。

于右任在十一二岁时，受其太老师毛彦苍先生的影响，开始对草书产生了兴趣。他曾回忆说：“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僵、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

于右任中年学草书，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在学书中，他有感于中国字笔画过繁，而各家草法不同，遂产生了统一标准草书以适应现代生活的意念。1931年，于右任在上海寓所开始认真练习草字。1932年，又联络上海草书爱好者，成立了“标准草书研究社”，每晚在其寓所集合研讨如何使行草书，“易识、易认、美丽、准确”。对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书，进行定型归类，统一造型，整理规范工作。1934年，于右任在上海各报刊公开征集各家草书字帖、善本的启事，一时求售者络绎不

绝。一天，有人持太和馆本急就章草及其它字帖前来求售。他仔细审视，发现这本草帖首尾皆有宋宣和宝玺，认定此系宋代宣和书谱中吴象所书之急就草，是一种极有价值的珍品。包括王国维在内文学士久觅不得，如今却偶尔重现人间，于右任欣喜若狂。由此更增加了他改革草书的兴趣。

1936年7月，于右任与标准草书社同仁完成了“草圣千字文”，名《标准草书》，并著释例，详加说明，刊印500册分赠同好。其序文为于右任所撰，文中说：

“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遗余力。传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事虽细，可以喻大。且今之所谓器者，乃挟之以与各国各族竞其优劣，观夫古民族之强弱，国家之存亡，天演公例，良可畏也！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

这篇序文把古今草书，自草篆草隶之后发展归纳为“章草”、“今草”和“狂草”，并认为狂草是草书之美术品。由此可见于右任对我国草书演变的研究之深且透。

1937年，《标准草书》第二次修订完成，正交付印刷之际，日军占领了上海。于右任多年搜集、包括宣和宝藏之太和馆急就章帖在内的一些草书资料，大多在战火中散失。于终生为之痛心不已。这次修订本后交香港中华书局印800本，除少数分赠友人，绝大部分毁于太平洋之战的战火。1942年春，于右任与研究社同仁将草书重新选校后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草圣千字文》，下卷为《标准草书释例》。为什么称“草圣千字文”呢？他解释道：“圣千云者，字皆选之历代草圣，慎为摹形，并疏出处。”为什么称“释例”呢？他又解释道：“释例云者，归纳古今草书之变化而释例，标举符号，分制表志。圣千释例，互为注证，前者备草法便转之妙，后者明史书不传之秘！”此次修订，较前几次更为精密，更为科学化，于右任修订中孜孜不倦，殚精竭虑。

张衡地动仪再现于世

□张玉峰

(见封底)

公元132年（东汉阳嘉元年），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张衡明了世界上第一架青铜地震仪——张衡候风地动仪。公元138年，地动仪成功地探测到远在854公里外的一次地震，被世界科学界称为“地震仪鼻祖”和“不可思议的奇迹”。

张衡的贡献已被充分肯定，国际天文组织已将月球上的一座山和一颗行星以张衡名字命名，但张衡地动仪却由于历史战乱而失传于世。多少世纪以来，古今中外诸多学

者曾致力于其复原研究，但均未能满意地再现张衡地动仪原貌。

最近，古青铜张衡地动仪在张衡故乡河南省新乡市新辉工艺品厂历经2年复原研制成功并在北京通过国家级鉴定。完成品用纯古青铜制成，气魄宏伟、造型华贵、工艺精美，为典型的中华东汉风格，内部结构及造型均严格按照古籍文献记载复制。本品仪体如遇某方向震动，即刻出现同方向之龙吐朝丸报震示警的壮观景象，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中华

文化瑰宝的历史风貌。

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有4种规格，可用于馈赠、陈列教学、收藏，本品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礼宾部门推荐为国家元首级贵宾礼品。对弘扬我中华民族炎黄文化、开拓国际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中国河南新乡市新辉工艺品厂厂长）

厂址：新乡市新辉路15号 邮编：453002 电话：53879 电挂：3995

《鲁迅的世界》

画选 裘沙、王伟君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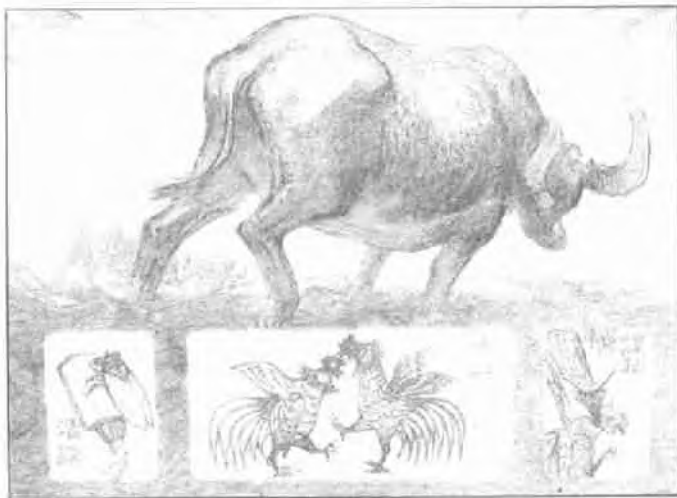
（《三闲集·铲共大观》1928. 4. 10）



不耻最后的竞技者▲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华盖集·这个和那个》1925. 12. 20）



切实的奋斗和目下的危机▲

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缥缈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现今觉悟的青年，至少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危机，目下就有三样。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1925. 6. 16）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中国的文章调子是最老的，但是，那些老调子，还没有唱完。因为中国人没记性，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老调子。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 2. 19）



世界第一架地震儀——仿古青銅張衡地動儀

MODEL OF THE FIRST ANCIENT BRONZE SEISMOSCOPE OF THE WORLD

公元132年，漢代中國河南著名科學家張衡製造了聞名世界的「地動儀」。它是世界上出現的有史人類觀測地震的科學儀器。



精儀揭天地
科聖著千秋

嚴澤廷 題

The famous Chinese scholar, Zhang Heng of Henan Province, invented the world famous seismoscope as early as 132 A. D. in the Han Dynasty.

圖文攝一刊第(199) 1999 定價：1.00元